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ISSN 1000—7326

总第105期

1991·2



欣欣向荣的中山市城区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FLOURISHING CITY PROPER OF ZHONGS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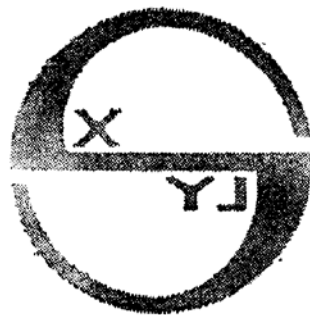


市委領導在交換工作意見

齊心合力
精心籌劃
建設未來新中山



市領導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工作經驗



学 术 研 究

主 编：梁 钊

副主编：张硕城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东 省 报 刊 发 行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 外 总 发 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 外 代 号 BN268 北 京 399 信 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1.5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ISSN 1000—7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粤工商广字01044号

本刊每逢双月25日出版

学术研究(双月刊)一九九一年第二期(总第105期)目 录

· 政 治 · 哲 学 ·

- 试论制度变迁.....贺培育(6)
- 时代与哲学.....钟阳胜(12)
- 我国社会稳定、改革、发展三者结合的度.....孔庆榕(15)
- 从程朱学派的“异端之学”看理学与释道的关系.....严书翔(20)
- 对现代新儒学几个问题的论争
——“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观点简介.....庄 严(24)

· 精神文明建设 ·

经济特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模式与基本途径

-吴群策 严建强(26)
-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一门学科.....刘兆权(33)
- 围绕经济工作中心,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陈献侃(36)

· 经 济 ·

- 论证券投资计划.....何小锋(38)
-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现实选择.....刘品安(45)
-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六大制约因素.....王 敏(50)
- 广东所有制结构目标模式与产业产权政策设计
.....郑炎潮 刘文通(53)
- 略论发展集团化骨干企业对市级经济成长的意义
.....崔 河(58)

责任编辑 黄荣显

· 历 史 ·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 兼论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 张 磊 (61)
- 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 赵立人 (69)
- 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 罗一星 (75)
- 对中国工运史的两个问题考证 卢 权 (80)

· 语言 · 文学 ·

- 汉语各方言的关系和特点 李新魁 (87)
- 在语法研究中运用一点数学 沈开木 (94)
- 论中国古典风格学的形成及特色 吴承学 (98)
- 论宫体诗的“出位之思” 李希跃 (104)
- 读《赋话六种》札记 何新文 (109)

· 企业之窗 ·

启动市场与企业对策

- 广东真空设备厂的实践与思考 王建明 (113)

· 书 评 ·

- 读《法国所藏甲骨录》 陈炜湛 (116)
- 《当代中国商品经济理论流派》评介 孙泽军 (120)

ACADEMIC RESEARCH

No.2, 1991

CONTENTS

- A Tentative Approach to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System
..... He Peiyu (6)
- The Times and Philosophy.....Zhong Yangsheng (12)
- The Extent of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Kong Qingrong (15)
- Look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Buddhism as well as Taoism,
through the 'Heresy' of Cheng-and-Zhu's School
..... Yan Shuxiang (20)
- The Argument about Several Problems of the Modern Neo-Con-
fucianism---A summarized account of the viewpoints put forward
on the symposium of "The Modern Neo-Confucianism and Cu-
rrent China"..... Zhuang Yan (24)
- The Target Patterns and Basic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Ethic-
al Construction in the Economic Special Areas
..... Wu Qunce and Yan Jianqiang (26)
- A Discipline Dealing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Must
Be Set Up..... Liu Zhaoquan (33)
- Perfec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round the Center
of Economic Work in the Enterprises.....Chen Xiankan (36)
- On the Planning of Dock Investments..... He Xiaofeng (38)
- The Realistic Choices in Shifting the Extral Labour Force of
Agriculture to the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 Liu Pinan (45)

On the Six Main Elements Restricting the Transference of the Rural Labour Force in our Country	Wang Min (50)
The Design for the Target Patterns of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Policies of Industrial Property Right in Guangdong	Zheng Yanchao and Liu Wentong (53)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the Grouped Backbone Enterprises in the Economic Growth at City Level	Cui He (58)
Some Ideas concerning the Research upo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Simultaneously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Zhang Lei (61)
Sever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Zhao Liren (69)
The Commodity Circulation in the Market of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uo Yixing (75)
A Textual Research on Two Problem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s.....	Lu Quan (80)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nd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Dialects	Li Xinkui (87)
Applying a Little Math in the Approach to Grammar	Shen Kaimu (94)
On the Evolv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Stylistics and Its Characters.....	Wu Chengxue (98)
On "the Thinking beyond a Peom" Appearing in the Palace-Verses	Li Xiyue (104)
The Reading Notes of "Six Notes on Descriptive Proses (Fu)"	He Xinwen (109)
Starting the Market, as a Tactics of an Enterprise---The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Guangdong Vacuum Equipment Plant	Wang Jianming (113)
Readi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Kept in France".....	Chen Weizhan (116)
A Comment on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chools of the Current Chinese Commodity Economy"	Sun Zejun (120)

试论制度变迁

贺培育

制度变迁在社会或文化变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其加以深入的研究，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建设。

一、制度变迁的内容

“变迁”作为一个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是从西方引入我国的，而在西方，变迁这一概念最初又是从“进化”这一概念演变而来的。变迁主要是指社会或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事实上不仅仅是一种进化过程，有时也可能是一种社会文化转移、混合、融化（甚至倒退或循环）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变迁概念代替进化概念本身就更科学一些。

所谓社会变迁也就是指社会各方面的要素和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各种改变。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社会变迁无疑也包括制度变迁，由之而推，制度变迁是指社会制度各要素或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改变。而制度变迁的内容则可以从制度的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两个方面加以阐释。

从横向结构看，社会制度作为一个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制度三大类。因此，制度变迁的内容从横向结构看则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包括：生

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迁，劳动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变迁和社会产品分配制度的变迁。

2. 政治制度的变迁，主要指：①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变迁，它从历史的发展上看有君主制、共和制、议会制、总统制、苏维埃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多种形式，由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以上这些政权的组织形式往往会发生更替和转换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一种变迁现象；②国家政治结构形式的变迁，这种形式一般有单一制和复合制之分，它们的相互转换或替代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变迁现象；③国家管理形式的变迁，指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这两种形式由于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发生相互转换的现象，历史上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含有此意，如我国战国前的诸侯分据到秦汉的中央集权就是一种管理形式的转化和变迁。此外，从政治活动的角度看，政治制度的变迁也可以分为干部制度、政治决策体制、政治权力参与、政治权力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的变迁。

3. 社会文化制度的变迁，主要包括：①文化生产（出版）制度的变迁，如新闻出版权利的呼吁，新闻出版法的出现等皆是现代文化生产制度变迁发展的产

物；②教育制度的变迁，如普及教育、义务教育制度、高考制度的实行，都是当今社会教育制度变迁发展的产物；③婚姻生育制度的变迁，如婚姻自由自主的合法化，以及计划生育的法制化也都是当今世界文化制度变迁的重要成果。

以上三个方面社会制度的变迁，虽然各自具有独立性，但它们并不是相提并论处于相同地位的，其中经济制度的变迁是其它社会制度变迁的基础，它规定并制约着其它社会制度的变迁。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马克思也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是故，当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代替了奴隶占有制的经济基础之后，随之奴隶制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制度或慢或快地也就被以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政治、社会文化制度所取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盖莫例外。当然，其它社会制度（政治、社会文化制度）也不是完全被动的，经济制度的变迁也必然要受到它们反作用力的影响。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变迁有利于强化和促进经济制度的变迁，如果经济制度的变迁得不到政治和社会文化制度变迁的配合，最终也会阻碍甚至破坏经济制度变迁的顺利发展。因此，在今后的社会制度变迁中，我们应当充分重视以上三方

面社会制度的协调发展和变革。

从纵向结构看，一定健全和完善的制度体系又包括制度意识系统、制度的规范系统、制度的组织系统和制度的设备系统几个方面。因此，制度变迁的内容从纵向结构上看，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制度意识系统的变迁。人类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任何活动都是受一定意识支配的，因此，一定社会制度的建立和改造就不可能脱离人类意识的指导。人们关于建立、健全各种社会制度的方案、思想、理论、学说都堪称制度意识，这种意识是一定社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构成一定完整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不能离开卢梭、孟德斯鸠的理论学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学说一样。制度的变迁也就不能不包含制度意识的变迁。具体而言，制度意识的变迁又包括转换性和调整性变迁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导致旧有的社会制度全面性失控，为适应彻底改变旧制度的需要，社会必然产生新的系统的社会制度意识（制度的理论学说），这种意识最终必将被新的统治阶级所接受并付诸实践，这种情况即是制度意识的转换性变迁；另一种情况是，现有的制度体系中，原有制度意识由于其中部分内容已过时，影响了整个制度体系的运行，这样在基本或根本的制度意识不变的情况下，部分制度意识发生更新，这种情况即是制度意识的调整性变迁。

2. 制度规范系统的变迁。一定完善的制度体系必定在制度意识或制度理论的

指导下，建立一套完整而具体的规则和规定，它包括各种法律、章程、条例、准则、守则、程序等具体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规范系统是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其变迁也可分为转换性和调整性变迁两种情况：一是与制度意识变迁的第一种情况相对应，原有的整套规范由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而丧失了真正的规范功能，只好被新的制度意识指导下的新的规范系统所取代，这就是一种转换性变迁。另一种情况与制度意识变迁的第二种情况相对应，由于原有规范体系中某些规则或规定不完全适合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改，这即是一种调整性变迁。

3. 制度组织系统的变迁。完善的制度体系都应有自己的执行机构和组织系统，它包括首脑、职能机关、具体的工作人员。根据规范系统的变迁，制度的组织系统往往也会出现转换性和调整性两种变迁。如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完全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系统（更换首脑和工作人员，改造职能机关等），这就是一种转换性变迁。但象我国近几年来所进行的机构改革、干部人事调整，就是组织系统的一种调整性变迁。

4. 制度设备系统的变迁。制度的设备系统按其作用可分为实用性和象征性两种，前者一般具有很大的历史继承性，不随着制度前面几个系统的变迁而变迁，最多也只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更新，如校园、军队、法庭、监狱、信息传播设备等。但后者则不同，其某些象征性设备往往是一种反映制度特性的标志，因此有时也随着制度意识、规范、

组织系统的变迁而发生变迁，如国旗、军旗、党旗的改换等。

以上四个方面，由于在整个制度体系中，制度意识决定整个制度的目标和性质，因此，制度意识的变迁决定制度规范系统变迁的方向和范围；制度规范系统给制度的组织系统提出不同的任务和要求，因此，制度规范系统的变迁决定制度组织系统变迁的历史使命；制度的设备系统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设备系统的现代化和快速更新，有时也会引起制度组织系统（主要是人事方面）的巨大震动，从而导致制度意识和规范系统的变迁。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二、制度变迁的方式

制度变迁的方式根据西方社会变迁理论，有许多分类方法，如自愿变迁、强制变迁；有限变迁、无限变迁；横向变迁、纵向变迁；进步变迁，退化变迁；有利变迁和不利变迁等。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思想，以上变迁方式又可以集中归结为渐进性变迁（即渐变）和突发性变迁（即突变）两种形式，以下着重对这两种形式加以剖析。

1. 制度的渐进性变迁。这是一种缓慢地改变制度特质或制度体系结构的变迁，由于这种变迁是缓慢进行的，人们并不感到生活本身的剧烈震荡，也并不感到付出了什么特别的代价，而只觉得它是一种寻常的事，所以人们又称制度的渐变为寻常变迁。

寻常变迁又可以分为自然变迁和计划变迁两种方式。自然变迁其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变迁前人们并没有自觉意识到，也没

有充分地研究、考察变迁的必然性、可行性和明确的发展目标，变迁只是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完成的。如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从战国时期的“养士”、“军功”到汉代的“察举”、“征辟”再到晋时的“九品中正”最后发展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这一变化过程从总体上看就是一种自然变迁。

制度的有计划变迁与自然变迁不同，它是人们自觉地有计划地发展或改革社会制度的一种发展过程。例如，目前我国进行的经济、政治等体制的改革就是这样。这种计划变迁由于是属于人们自觉的有计划的行动，因而在发展过程中也比较容易控制。

当然，自然变迁与计划变迁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自然变迁从局部或从微观上讲也不一定都是盲目、无计划的，象资本主义社会前，社会制度发展的历史虽然从总体上基本是自然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但在某一具体制度上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一定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更新则也可以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例如宋代王安石变法，就首先设“经义局”，重新训释儒家经典，为变法寻找理论根据，制造社会舆论；然后制定新法，进行推广，这些本身都是一种有计划的活动。但这种有计划变迁是十分有限的，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社会制度变迁的计划性远不如其自然的无计划性那么广泛和普遍。不过，现代社会中的有计划性变迁，虽经反复考虑，周密计划，但也仍然会有某些非计划的因素出乎意料地打乱计划，造成制度变迁失控的现象。如我国前些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有计划有目标，但因为配套措施和其它观念因素跟不上，也

曾一度导致过失控现象。

2. 制度的突发性变迁，往往是通过一些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来实现或完成的。如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在较短的时期推翻了已存在成百上千年的旧社会制度，建立了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了社会制度的突发性变迁。

制度的突变是一定社会制度结构整体的变迁，它是一种全局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牵涉到社会制度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因此，在制度的突变中，一切旧的制度内容都面临着更新，面临着理性的选择。正如恩格斯在谈及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由于制度突变是社会制度体系深层的内在结构的全局性变迁，因此，这种变迁往往会给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带来极大的震荡，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要完全适应这个变化，往往也有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因为新的制度、新的组织、新的规范必然使一部分人感到新奇而无所适从，如辛亥革命一些人被剪掉辫子后便惶惶不可终日。只有经过一段历程，新的制度结构健全起来了，适应了整个社会的内在结构，人们对它慢慢适应并按其要求正常生活了，这样新制度才能渐渐形成新的风格、新的模式。这就是制度变迁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最终完成的标志。

三、制度变迁的动因

十九、二十世纪在西方逐渐形成的各

种各样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学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义上阐述了自己关于社会制度变迁动因的思想。这里我们简单介绍几种社会变迁理论及其对社会制度变迁动因的认识。

第一种是地理环境因素说，这种理论把地理环境的变化当作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因。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拉策尔，他的《土地与生活》详尽地研究了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自然地理环境不仅决定着社会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的形式和内容。政治集团的大小、社会组织的形式、人民的精神面貌无不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因此，社会制度的变迁也就毫不例外。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英国的伯特兰·罗素，在谈到工业革命时，曾论述了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从而充分表达了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制度的思想。他说：“工业制度是由近代科学而产生，近代科学是由于伽利略，伽利略是由于哥白尼，哥白尼是由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土耳其人的迁徙，土耳其人的迁徙则是由于中亚细亚的干旱。因此，在探索历史因果关系时，基本的研究乃是水文地理学。”（罗素：《自由与组织》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诚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早期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中，它曾给不同民族制度文化的发展以重要影响。但是，把制度发展仅仅看作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产物，是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制度现象的。因此，不能把自然地理环境当作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

的或唯一的决定因素。

第二种是心理因素说，这种理论把心理素质看作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因。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盛行以心理的作用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如德国的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它认为社会是人类心理连续不断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形式或关系，而社会制度则是它的客观化。美国的爱尔伍德等人也用人类心理的交互作用解释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乔·赫·半德的个体心理学与符号学、语言学相结合，产生了许多现代心理学派的社会变迁理论，如符号相互作用论、现象主义社会学、“理解着”的社会学等，皆从相互主观性方面解释社会的发展变迁，他们把个人心理作为出发点，把心理交互作用及其反思看作社会制度建设的变化的基础，在他们看来不仅一切社会制度也包括风俗、观念价值等等都产生于此。

心理互动说虽然看到了社会及其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的复杂性，但它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即人类心理乃是各种社会制度发生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心理互动说虽然也承认社会环境的作用，但它从人类的交互心理中寻求社会及其制度变迁的根源，无疑是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主观心理的能动作用的。

第三种是生物因素说，这种理论把生物因素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动因，持这种观点的首推英国的斯宾塞，他的《社会学原理》的中心思想是，包括制度在内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其变迁（进化）是一个生物有机进化过程，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此外，象德国的李林弗、法国的华牧斯等也都具有同样的观点。他们的著作《社会

病理学》、《有机体社会》都从不同角度,将社会及其制度的发展变化看作是生物有机体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看作是生物有机体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把生物因素看作是 社会变迁根本动因的最极端的学派,是种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法国戈比诺和英国的张伯伦,他们分别著有《试论人类种族的 不平等》和《十九世纪的原理》,他们认为希腊、罗马、犹太等社会文明及社会制度的衰落和变迁的原因不是由于其宗教、政治等因素造成的,而是其种族特质变化的产物。这种离开社会环境,把种族特质的变化看作社会及其制度变迁的根源,显然是荒谬的。

以上几种社会变迁理论,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制度变迁的动因作了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真正抓住制度变迁动因的根本和实质。对此真正做出了科学的合理的解释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425页)

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观察人类历史上复杂纷纭的社会制度变迁现象,就会发现,一切社会制度变迁都有一

个现实的基础,即由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与它不相适应所发生的变革。例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变,它首先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发展起来,出现商品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差别,出现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正是基于这种新的发展,才造成了封建势力的扩张和贵族奴隶制的衰亡,造成了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的崛起,造成了世卿世禄等级制度的打破和“以德配天”的宗法观念的动摇,于是出现了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演化和大变迁。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并不是象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歪曲的那样是“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制度变迁只有根据它们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历史结构才能理解,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抽象或刻板对立的两极;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事变和社会制度变迁都是复杂的,经济虽然是基础,但是科学、文化、技术、政治、哲学以及人们的传统观念等都是交互发生作用的。“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7页)因此,我们研究任何制度变迁问题,都必须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加以具体分析。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冯生

时代与哲学

钟阳胜

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历史性学习任务。

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进行一系列伟大的社会改革活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过渡；政治体制方面，党的领导在不断地改善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已经引起重视并逐步加强；科学、文化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体制，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总之，我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一方面给我们思想领域的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土壤；另一方面，大变革的实践和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又为思想领域提出了巨大的认识任务。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社会目标，给我们提出了认识社会的重大课题。在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

有一系列的社会规律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掌握、去运用。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总是做两篇文章：它的上篇是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我们经过解放前二十八年浴血奋斗，不仅已经做完了，而且做得很好，为世人公认是一篇好文章。它的下篇，是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篇文章我们已经做了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这篇文章做得更快更好了，但是还没有做完，今天还在做，而且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做完这篇文章。与上篇文章比较，这篇文章更难做，更难做好。因此需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共同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

在过去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三十年，我们有过不少失误，究其原因，从主观上看，就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出了问题。诚然，这些偏差和失误不仅仅在于主观上的原因，在客观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原因。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有一个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样，就不可能避免地给我们认识和运用这些规律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现在的任务，就

是要认真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在新的时期新的条件下，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在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三大基本问题：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是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都与党的基本路线密切相联系。解决好这三个基本问题，我们才能够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实现我们党为自己确立的社会目标。然而，这三个基本问题本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必须首先认识它们各自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比如，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孤立进行。因为整个社会结构是相互联系的，单独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很难获得成功。这本身就是一个规律。又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们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事物，曾经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过程。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莫尔在1516年写的《乌托邦》这本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的产品经济。后来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时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商品货币论进行了批判，认为杜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货币是不可思议的，杜林的这个观点是一种倒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也是一种产品经济。到了列宁，起初他完全继承了马恩的思想，直至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之后，他才感到这样不行，

后来才提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要保留商品货币。斯大林又进了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一种特殊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起作用，但同时又认为，价值规律仅在流通领域起作用，在生产领域不起作用。这表明，在斯大林那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还是一种有限的商品经济论，或者说还是一种特殊商品经济论。直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践，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全面的商品经济论。可见，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及人们对它的认识，是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和逐步成熟的，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如党的建设，也是有规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党的建设，与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建设比较，不但环境改变了，条件也改变了。如果我们把战争年代的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全盘硬套到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随着环境的改变、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改变，党的建设理论和方法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因而，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规律的问题。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奋斗的社会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都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认识课题。我们要完成这些认识课题，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认识和了解这些课题，实际上是一个认识社会

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起码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认识的主体，即谁去认识；二是认识的客体，即认识什么；三是认识的过程，即如何去认识；四是认识产生的形式，即认识的结果。这四个方面，都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弄清认识过程中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把握认识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全过程，进而正确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规律，完成新时期提出的一系列认识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高度的紧迫感。

从历史来看，凡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认识的任务都特别繁重，认识的活动也特别活跃。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起，思想界非常活跃。正是这个时期的奴隶造反、地主夺权的社会变革，向思想界提出了大量的认识课题，从而才推动一大批哲学家去研究和认识社会。欧洲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的整个思想界、哲学界也特别活跃，涌现了一大批哲学家去研究社会的认识问题，帮助人们去认识和掌握社会规律。世界历史发展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由上升时期逐渐转到没落时期，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明显暴露出来，资本主义发展本身要求进行社会变革。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应运而生。社会史和思想史表明，凡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提出重大的认识课题，因而需要人们去学习、研究和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学习和研究哲学，进而帮助人们去认识、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社会大变革大发展。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要

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这就需要正确的认识方法。黑格尔曾经讲过：方法是一切科学的灵魂。只有解决正确的认识方法，才能够完成我们的认识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方法论，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要很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掌握科学的正确的认识方法，进而正确地认识我们当前的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以推动我们的改革事业，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一是其党性，一是其实践性。它的社会功能，一是认识方法的功能，一是社会意识的功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及其功能，我认为要注意如下四点：

第一，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大精深，才能够充分认识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是无产阶级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的 and 建设的科学。由此，决定了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一定要紧密联系实际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联系社会实践，联系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才能够学好，才

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和力量。不然，即使将其结论、原理背得滚瓜烂熟，也不可能在现实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它来有效地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

第三，一定要注意不要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客观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揭示其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列宁所说是“一块整钢”，是关于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的系统的科学方法。这就决定我们不仅要逐章逐节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具体结论和原理，而且要把它们统一起来，融会贯通，从整体上学好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系统的方法论，并在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正确地发挥其方法论功能的作用。

第四，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意识功能出发，努力地实践，认真地总结和缜密地思考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意识问题的理论原理的指导下，使社会存在的客观事物在我们的头脑中得到比较正确的反映，从而获得比较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作者单位：河源市人民政府

责任编辑：范英

我国社会稳定、改革、发展三者结合的度

孔庆榕

四十一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正如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的：“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教训。”我国经济的马鞍形发展，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巨大损失，贻误了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的不够稳定。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即使我们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出现失

误的时候，主观上也出于这一追求。为什么往往事与愿违呢？看来，还是我们对自已的国情了解不透，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深，特别是未能把握好我国社会稳定、改革、发展三者结合的度。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探索，以求教于读者。

一、既把握住事物的质又把握住事物的度才是真正认识该事物

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不同的质是以量的不同为基础的。质和量的统一就是该事物的度。列宁说：“度是特殊的规定量。”（《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社1956年版，第100页）正是这一“特殊的规定量”，使事物的质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并把同一性质的不同事物区分开来。度一旦被突破，就出现“渐进过程的中断以及和先前的存在有质的不同他物。”（同上书第101页）因此，要真正认识事物，不能只认识它的质，还要认识它“特殊的规定量”，从二者的统一去把握事物。

首先，要认识事物的质都是“特殊的规定量”的质，事物的“特殊的规定量”都是一定质的量。拿稳定、改革、发展来说，我们讲的稳定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极平衡状态。为了实现这种状态，离不开制定并实行有关的各种政策和措施，而这些政策和措施应当正确反映事物的质，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极平衡状态的要求。我们讲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离不开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除弊兴利，破旧立新，而一切改革的措施，都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起来。我们讲的发展，是指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它离不开在各个领域里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的进步，而这些方面的进步，又都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事物的质和“特殊的规定量”是统一的。但人们往往只一般地承认事物的质离不开量和事物的量离不开质，却忽视了列宁关于“特殊的规定量”这一重要提法，因而在实践中把二者割裂起来。比如，讲社会主义，只讲社会主义制度质的规定性，而忽略了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等“特殊的规定量”决定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导致了“左”的政策产生；讲经

济建设，只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却不注意研究一定时期里所能容纳的“特殊的规定量”，导致了多次过热失控、经济效益差；讲改革，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十分必要的，但对现阶段改革的“特殊的规定量”研究得不够，使改革的步伐显得太慢。这就说明，在把握事物的质的同时正确把握事物“特殊的规定量”确实很重要。

其次，要通过对质的研究，认识它对量的要求。事物在保持其质的前提下量的活动范围、变化幅度、数量多寡，一句话，“特殊的规定量”，首先取决于该事物的质。水温和的幅度（在正常情况下）是 0°C 至 100°C ，这因为它是水而不是水蒸汽，也不是冰块。健康的人的体温是 37°C 左右，如果较大地低于或高于这个温度，那就是病人了。社会现象的度虽然往往不象身体现象那样精确地表明出来，但它同样首先决定于事物的质。拿我国经济发展来说，为什么多次出现膨胀与超高速增长，前几年又再次出现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现象，关键就在于我们尚未全面地认识我们国家的质，即脱离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靠打赤字和大量发票子，靠举借内债和动用结存外汇等等做法人为地冲破“特殊的规定量”，于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恶果。我国改革的量的变化同样受我国社会性质的制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还存在许多不完善，我国社会这一质的状况，决定了我国改革量的发展方向、范围、幅度以及整个进程。离开了这个质来谈改革，要吗就走错方向，

要吗就消极保守或者欲速不达。

事物的质决定着事物的度，反过来，事物的度又制约着事物的质。列宁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某物由于其内在的界限而作为自身的矛盾（通过这个矛盾，某物就超出自己并被赶出自己），它就是有限的。”（同上书，第86页）如何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利用度对于质的制约关系，加速旧质的灭亡，支持新生事物的迅速成长和完善，是我们保障社会稳定，深化改革，确保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需要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再次，要从动态上把握度的临界点。事物的度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变化的。一方面是因为事物在量变的过程中会出现部分质变，从而使度相应地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事物由于经常受到各种外在条件的影响，使其度的临界点发生变化。

度的临界点即事物在保持其度的前提下量变的极限。只有从动态上去把握度的临界点，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例如经济的适度增长，固然受国家的性质所决定，但与不同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国际环境等有密切关系。我国过去多次出现的经济过热，说明我们还未有真正从动态上把握好经济发展度的临界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从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出发，特别是八十年代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提出九十年代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6%左右的要求，是适度的。6%是今后十年的平均增长率，至于每年应增长多少，每个省、地区每年应增多少，这个临界点，就

应从动态上去把握。

二、在实践中把握稳定、改革、发展的度

稳定、改革、发展各自的度，如同其他社会现象那样，只有在作用于它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认识它、把握它。稳定作为一种积极的平衡状态，它的度的临界点——稳定与不稳定的分水岭、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的分水岭，离开实践是把握不到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了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并且在反复的实践中方能摸索到如何改革才符合完善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如何才合理，才符合国力，同样离开实践便无从谈起。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要正确认识 and 把握稳定、改革、发展的度，是很不容易的，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从失误中汲取教训，使主观符合客观。

稳定、改革、发展各自的度，只有在联系中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度，它是否越出了其临界点，仅从某个事物本身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由于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某一事物的量变和质变，对其相互联系着的事物存在一种“交叉效应”，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彼方的反映中去认识此方是否适度。例如改革是否适度，它会在社会的稳定状况和社会的发展状况里作出反映。经济发展是否适度，会从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比例关系，各部类的比例关系，从市场和物价等方面作出反映。因此，研究一事物的度，不仅要研究该事物自身，还应很好地研究与该事物相互联系、存在交

又效应的有关事物。不能象前几年那样，许多社会现象已经反映出经济发展速度过高了，然而仍在继续追求更高的速度，赞扬超高速增长。

在实践中，我们还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研究稳定、改革、发展各自的度。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改革、发展的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的。一方面是因为系统的发展使到组成该系统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必然随之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稳定、改革、发展本身的变化，及其相互间的交叉效应，使其度处于动态之中。例如社会稳定，五十年代的稳定与今天的稳定在度上就有差别。从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不同时期差别更加明显。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目标是为工业化打下初步的基础，根据当时的国力，把主要力量放在搞好苏联援助的156项建设项目上，其他小规模的建设也只有700项。这样发展的度，不仅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把经济的发展限制在这样的规模，就不可能给社会带来积极的稳定。拿改革的度来说，由于四十一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事业的巨大发展，观念上也有很大的改变，我国人民今天对改革的承受力与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比较，自然相差甚远，承受力大得多了。我们只有用发展的观点而不是僵化的观点去认识稳定、改革、发展的度，才能适应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

三、改革的度就是把稳定与发展恰当地统一起来的度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稳定、改革、发

展中前进的。稳定、改革、发展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稳定是顺利进行改革的前提和发展的必要保证，它也制约着改革的展开和发展。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而没有发展的社会，也不可能出现积极的、持久的稳定。

既然稳定、改革、发展不是一个东西，彼此又有着“交叉效应”，因此就存在着这三者结合的度。在这个结合的度的范围内，彼此能够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否则，就会出现顾此失彼、此起彼伏的种种问题。这个度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就是改革的度。换句话说，改革的度就是把稳定与发展恰当地统一起来的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稳定作为一种积极平衡状态，关键问题是要善于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关系。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从经济方面讲，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除了由于近几年经济过热和经济秩序混乱至今仍遗留的问题外，分配不公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从政治方面讲，我们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如何创造一个正如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的政治局面，无疑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越深化、越成功，社会就越稳定。可见，改革制约了稳定，促进了稳定。

第二，我国经济是否能够走出一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关键在于

改革。前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上一度失控，微观上一些老大难问题，如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重要支柱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缺乏活力，许多企业效益尚低，不少企业亏损等等，至今尚未获得解决。以上问题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尚未建立起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还很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别无他途。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制约着发展，改革的深度制约着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既然稳定、改革、发展三者结合的度在于改革的度，那么应当怎样去把握改革的度呢？看来，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首先，是该改与不该改的关系。社会主义改革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而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发展。因此该改的和不该改的，只能从社会主义社会质的要求来考虑。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绝对不能抛弃的；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方面是应当改和必需改的。可以说这就是在改革的度上两条最重要的临界线。如果超越了这些临界线，改革就会失败。前一种超越会导致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后一种超越会使社会主义停滞、倒退，倒退也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局部改与全局改的关系。改革只能从主要矛盾入手逐步展开。然而由于社会是一个大系统，每一项改革都会产生

一定的交叉效应，因此要处理好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应当是从系统着眼，从局部着手，进而解决全局存在的问题。改革不能孤军深入，各方面要配套进行。我国当前的改革是以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是正确的，但也需重视农村改革的深化，并且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重要领域的改革同步进行，否则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深化。

第三，改革的程度、程序、时机等的关系。客观上必须改的自然要改，但是改革的程度如何？程序如何？时机是否合适？这些是属于量变的东西，也是要掌握好的。这里要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尤其要充分估计由于这项改革将会引起的交叉效应以及对此项改革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第四，破与立的关系。改革是破与立的统一。人们常说，不破不立。然而，不立，破也不可能。因此，改革中要坚持破与立的统一。由于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在改革中，不宜破了再立，而应当先立后破，立中去破。无论破与立，都需要注意分寸和适度。这样，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有利。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范英

从程朱学派的“异端之学”看理学 与释道的关系

严书翔

宋明理学与释道的关系问题，历来有许多争议。本文试从程朱学派的“异端之学”入手，谈谈我的看法。

一、异端的确立

朱熹在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中，首辟“异端之学”这个栏目，搜集了理学诸大师们关于异端的言论，独成一卷。由此可以看出理学家对异端学说的重视。那么，何谓异端，哪些学派和人物属于异端？

古代中国就有“异端”之说如儒家称儒家以外的学说、学派为异端。《论语·为政》说：“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释为：“攻，专治也，……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①在朱熹看来，所谓异端，就是与儒家圣人之道相对抗，思想学说和立场观点不合圣人之道而别立一端者。那么，宋儒所指的异端有哪些呢？

从《近思录》看，宋儒确立的异端有杨墨、申韩、佛老，而主要是佛老。“明道先生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之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为害尤甚。”^②朱熹在注释孔子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

句话时说：“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③接着又引程氏的话说：“佛代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④朱熹十分赞同程氏把杨墨、佛老判为异端的说法，只是他认为，程氏在考察杨墨的源流时说得不准确，但把儒学看成正统，把佛老判为异端则是十分准确的，故他说：“程子论杨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若曰佛氏之害甚于杨墨，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则皆至论也。”^⑤

在宋儒看来，这些异端学派的学说，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深度上去毒害人心，扰乱儒家道统，相比之下，佛老的毒害最深，因为佛老之学，“其言近理”，然毕竟与儒家主旨不合，它在深层的意义上毒害人心，以思辩的方式，隐蔽地对抗儒学，其害不易被察觉，故其毒害最深。唐代韩愈早就看出了异端学说的危害，他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佛，则入于老。”^⑥这反映了当时佛老盛行，儒学衰微的情况，于是他力排佛老，举起儒家旗帜，力图恢复儒家道统。宋儒

接过韩愈的旗帜，操戈入室，直接以儒学正统自居，把佛老判立为异端邪说，加以批判和扬弃。按照宋儒的判立，异端可按其毒害的深浅排列为：佛老>杨墨>申韩，由此足见宋儒对佛老的痛恨之深。

宋儒判立异端的参照系是儒家道统，他们认为儒者潜心正道，相对于儒家道统来讲，佛老之说为异端邪说。既然以儒家为正宗、正统，站在儒学道统的立场上去把佛老贬为异端邪说，那么我们就必须肯定理学是儒家哲学的新形态，是儒学道统的发扬光大，它的立场是儒家的，而不是道教和道家的，更不是佛教的。

二、对异端的态度

宋明理学从儒家道统出发，把佛老贬为异端邪说，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们用以抵制佛老异端邪说的武器是儒家道统，即“三纲五常”、“内圣外王”等价值标准。在宋儒看来，佛老之说，与儒家的这套价值标准是相抵触、相冲突的。

首先，儒家讲“内圣外王”之道，它是积极入世的，不仅要人修身养性，做内圣功夫，而且要求能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发挥外在的功用。而佛氏则寂灭无为，不可以察理以应事，它主张断除一切外相、欲望，归于虚寂，复归真如（真性），这种真性只是个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并非儒家所说的天地本然全体之性。

其次，儒家主张动静兼顾、动静不离，然释氏习定，将心收敛于虚静，好象是敬以直内，然则“有体无用”，不合儒家“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主张，所以被宋儒指责为“离器以为道”，何有于义？儒家的“率性之道”，是动静各正的，它既有直内的修养工夫，又有方外之功用，“直

内方外，时止时行，体用本末”，无不兼顾，它“既不病于拘，亦不至于肆”，而释氏专走极端，只求静寂，离器言道，故或拘或肆，这皆为病症，“名为大自在，而实则隘陋。”这与儒家讲的义的原则是根本相违的。

第三，佛教讲“顿悟”，主张“出家独善”，讲“轮回”，设“天堂地狱”之说，在宋儒看来，都是违背儒学原则，与儒家的价值观念不符的，不可以轻信之。程氏认为，释氏立地狱之类的说教，是用来恐吓“下根之人”，使其为善的，但这实为“伪教”、异端邪说，是欺人的鬼话。因而，要求人们把这种“伪教”当做“淫声美色”而远之，不可糊里糊涂的走进去。“天堂地狱，若果有之，当与天地俱生。自佛法入中国之前，人死而生者亦有之矣，何故无一人误入地狱，见阎罗等十五者耶？不学者固不足与言，读书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①这表现出宋儒对佛教学说的一种理智的批判态度。

第四，佛教“以耳、目、口、鼻、身、意为六根，以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其说谓幻尘灭，故幻根亦灭；幻根灭，故幻心亦灭。”^②在宋儒看来，这是不懂得“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不懂得这个天理，只于自己身上去灭六根、逐六尘、求解脱，实际上说得再多也是妄言。佛教把现实世界看成一个苦海，认为人只有灭掉六根，去掉六尘，抛弃世俗的一切价值，如枯木死灰般去修炼成佛，才能获得解脱，进入快乐的天国。这与儒家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是大异其趣的。儒家认为，现实世界就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快活林，只要你积极上进，用纲常伦理来规范自己，

努力去履行做人的责任，承担做人的义务，那你就从现实、现世的人生实践中获得人生的乐趣，实现做人的价值。总之，现实的人生中，纲常伦理的践履中、温情脉脉的血缘亲情中自有乐趣，不必离开现实的人生，脱离现世的生活，去追求什么天国、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之类的虚无缥缈的妄境。正如西晋玄学家乐广说的那样：“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称也。”^⑨

第五，佛教把阴阳昼夜古今死生说成是轮回，是妄幻，把宇宙、人生、现实等都说成是不真实的、虚假的、空的。在宋儒看来，这与儒家的形上之道即“理”的流行变化的学说不同，与儒家积极的、实实在在的人生追求和道德践履是背道而驰的。对此，宋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朱熹明白地断言说：佛教“从劈头便错了，如天命之谓性，他把做空虚说了。吾儒见得都是实，他底从头到尾都是空”。^⑩

总之，在理学家们看来，佛教的说教，佛教那种消极出世的价值追求，佛教对整个宇宙、人生、现实的看法以及所抱的人生态度，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相冲突的。对此，他们从维护儒家道统出发，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作为标准，对佛教提出了上述的批判和责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佛教的错误所在。他们还认为，作为异端邪说的佛教，自传入中国后，风靡一时，产生了恶毒的影响，它毒害了人心，破坏了儒家道统的纯洁性，造成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局面，因而深恶痛绝之。

以上是对佛教的批判，那么，对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 and 道教又是如何贬之为异端的呢？《近思录》的“异端之学”对此谈得比较简单，仅指出两点：

其一，老庄讲“有无”的学说，与圣学不符。张载说：“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⑪这里的“诸子”指老庄。《近思录》江水注转引朱熹的话说：“朱子曰：无者无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则有矣。老氏乃云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理也物，便错了。”又加按语说：“老子云：‘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又推言之曰：‘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者也’。诸子之言陋如此。”^⑫

其二，道教神仙学说，有些纯粹是无稽之谈。“问神仙之说有诸？曰：若说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言居山林间，保形练气，以延年益寿，则有之。”^⑬这里虽然没有把道教神仙学说统统斥为异端邪说，但在宋儒看来，这是与圣人之道不符的，故言曰：“圣人能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间一贼’。”^⑭

以上是宋儒对佛老异端学说的检讨，可以看出，他们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佛教。他们批判佛老的目的，在于澄清异端学说的流毒，矫正人心，纯洁儒家道统，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照程伊川的说法，明道先生是有感于秦汉以后圣学不传，“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藜莠，圣门之蔽塞。”^⑮即佛老泛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局面，才首辟异端之学，去“辩异端似是之非”，以“开百代未明之惑”，从而重建儒家道统的。

对于佛老异端邪说，理学家们主张应持“不为异端所却”、“异端不必攻”（张载）的态度，不去学习它（“异端不与

焉”)，更不要去专门研究它(朱熹)，不仅要把它当作“淫声美色以远之”，而且还要善于鉴别它，要划清它与圣学的界限(程氏)，不可“翼翼然入其中”，去受它的毒害。而对于儒家圣人之学说，则不可须臾离弃，“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⑧

三、“异端之学”反映了什么倾向、说明了什么问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程朱理学的“异端之学”是以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纯洁儒家道统为目的的，理学家们以儒家学说为武器，把佛老贬为异端，表现出了尊儒贬佛、崇儒抑道的倾向。这说明，宋明理学的立场是儒家的，而不是佛教的，也不是道家和道教的，宋明理学是儒家哲学的发展，而不是佛学的变种，也不是道家和道教学说的翻版。

从程朱学派的“异端之学”来看，理学之所以为儒学，首先在于理学家们是以重建儒家道统为己任，以维护儒学的尊严和纯洁性为目的的，他们打的是儒家的旗帜，标榜的是儒家的立场，呼喊的是重振儒学的口号。理学家尊崇的是儒家的至圣先师，依据的经典是《论语》、《孟子》等。其次，理学之所以为儒学，其内在的、本质的根据在于，理学家们在判立异端、批判异端学说时，须臾不离儒家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他们是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内圣外王”之道为标准去确立异端，又是以此为武器去批判和抵制异端邪说的。而这正是决定理学之所以为儒学的内在的和本质的依据。可以说，理学之所以为儒学，不仅因为它标榜儒家立场，维护儒家道统，而且因为它始终贯彻儒家的“一贯之道”。林安梧先生在论述儒学之所以为儒学

的内在根据时说：“儒学之为儒学乃是实学，他所著重的是人伦的实践，政治的实践，任何的儒学理论都必得关联实践。”^⑨人伦的实践属“内圣”，政治的实践属“外王”，“内圣外王”就是儒学的“一贯之道”。确切地说，儒学之所以为儒学乃在于它自觉的以“内圣”统贯全体，用“内圣”驾驭“外王”。而程朱派理学家们正是以儒家这个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主要的依据和武器，去评判异端，指斥佛老的。

因此，我认为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不论其外在的框架和内在的精神都是儒学的，它所立的是儒家的骨，长的是儒家的皮和肉，流淌的同样是儒家的血！它的遗传基因是儒家的，它的血型同样是儒家的。我不同意胡适的所谓理学为“道学”论，^⑩也不同意蔡尚思的“外表为儒，而内容为佛老。”“前门是儒家，中进是道家道教，后堂是佛教禅宗。”“佛是骨，道是肉，儒是皮；或佛是根，道是枝、儒是叶”这种理学为“佛学”论。^⑪蔡尚思认为，理学“形式是纯儒而非佛老；内容是佛老并重而非纯儒。”^⑫这是割裂形式与内容，离开形式谈内容，离开内容谈形式的二元论。我认为，理学作为儒学，它的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它的内容是儒家的，形式也是儒家的，理学在形式上吸取了佛老的一些范畴概念，但这些概念与范畴已作了儒学化的解释，被注入了儒学的内容，而内容决定形式。理学虽吸取了佛老的概念范畴，但这并不足以改变它的儒学性质(关于这个观点，笔者拟作另文详细讨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程朱理学派的“异端之学”反映出了另外一种倾向：它判佛老为异端，主要是针对佛老的宗教邪说

而言的，而且他们以佛教作为主要批判的对象，而对道家 and 道教则只略加批驳。这说明，理学家们对道家 and 道教学说更有好感些，而对外来佛教的批驳和所持的态度，则给人一种深恶痛绝之感。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依据程朱派的“异端之学”去否定佛老对理学的影响和在理学家重构儒学中所起的作用，但我认为，“异端之学”至少可以证明理学家们吸收的是佛老的哲理，即作为哲学层面的佛老，而不是吸收佛老的宗教即作为宗教的佛老。因此，与其说佛教与道教给理学的产生施加了影响，不如说佛学与道学在理学的建构中起了作用。但无论是佛学或道学的影响都不足以改变理学的儒学性质。

- ① 朱熹：《四书集注》
- ② 《近思录》卷十三
- ③④ 同①《论语·为政》注
- ⑤ 同②江永注本
- ⑥ 韩愈：《原道》
- ⑦ 转引自《近思录》卷十三，江永注
- ⑧ 同②江永注引叶氏语
- ⑨ 《世说新语·德行》
- ⑩ 同②
- ⑪⑫⑬ 同②
- ⑭ 同②
- ⑮ 《近思录》卷十四
- ⑯ 《近思录》卷二
- ⑰ 林安梧：《现代儒学论衡》第20页
- ⑱ 参阅《胡适文存》三集卷二
- ⑲⑳ 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范英

对现代新儒学几个问题的论争

——“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观点简介

庄 严

最近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锦全教授和南开大学哲学系方克立教授共同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与广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在中山大学联合举办了“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安徽社会科学院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研究》和《哲学动态》编辑部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数十人。会议围绕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关的若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一、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定位

与会者各抒己见，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现

代新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如何定位的看法。¹从纵横两个方面去定位。汤一介教授认为，从纵的方面看，儒学受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古代受佛教的冲击，在宋明时期形成了形而上的道德人文主义体系，即宋明新儒学；另一次是近代受西学的冲击，形成了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家力图弥补传统哲学中道德与认识不分、缺乏知性认识论的缺陷，试图从传统儒学中开出独立的认知系统和科学与民主政治。因此，现代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从横的方面看，现代新儒学是当代全球意识中的一元，它是与分析哲学、现象学、现代心理学等并存的另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定位。方立天教授认为，现代新儒家自觉地提出了一种社会理想和历史使命，他们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

关注民族的命运，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总之，他们牵涉的面很广，不能把现代新儒学仅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来对待。³从文化圈与文化构成要素的角度去定位。周立升教授认为，现代中国文化似应划分为大陆文化和港台文化，二者构成华夏文化的整体。现代新儒学是中国文化这个整体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⁴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定位。田文军等同志认为，现代新儒学是近现代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或一家之说，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理论，要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对待。⁵从学术思潮史的角度去定位。郭齐勇等同志认为，现代新儒学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一股重要的学术思潮，主要应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来对待。王守常同志则认为，现代新儒学主要是一股哲学思潮，应把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来对待和定位。⁶李锦全、方克立两教授在总结这一问题的争论时认为，几个方面都应兼顾到，即要从世界思潮、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哲学史、文化思潮等不同的方位和角度出发，才能把现代新儒学搞清楚，使它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二、关于现代新儒学的价值

与会者认为，现代新儒学思潮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与马列主义和西化思潮同时并存和发生影响的一股独立的思潮。但在对于新儒学思潮如何估价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¹郑文林同志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包括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如何现代化？这个问题早在鸦片战争以后就逐渐提出来了，现代新儒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出现的。现代新儒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相对地讲比较成功，比较具有现代气息。他们的时代现实感很强，他们自觉地关心中国的现代化和未来发展，关注民族的命运；他们提出了一种理想，一套理论，这种理想和理论都关联现代化；他们的学说既连接传统文化，又大量地汲取和消化了西学，并且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其哲学思维的水平较高。因此，现代新儒学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值得认真研究。²方立天等同志认为，现代新儒家提出的问题是近现代比较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过程问题。现代新儒家所关涉的问题是极为广泛的，既有个人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也有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远大理想；既讲“内圣”之学，也讲“外王”

之道；既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收、消化和包融了大量西学。它涉及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尽管它不能作为指导思想，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方面，它有其积极的贡献。³周立升同志认为，儒家从原始儒学开始所提出的理想就没有完全实现过，但不管实现和没有实现，他们都提出了一种主张、一种见解，都是在作一种精神的再生产。现代新儒家提倡的“返本开新”说，从方法上讲，是用现代西学（主要是解释学）的方法去对儒学作引伸，去对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的转换和综合创新，这同样是在进行一种精神的再生产，是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表现。他们主张的“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见解也是值得提倡的，现在我们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实就是这个意思。⁴郑家栋同志认为，儒学作为一种超越的东西，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体验、一种道德宗教，现代新儒家所追求的圣人境界是有价值的，儒学在现代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信仰的基础。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对现代新儒学不宜估价过高。¹郭齐勇同志认为，现代新儒家与传统儒家一样，“内圣”、“外王”一锅煮，结果什么都煮不熟，“内圣”有问题，“外王”也有问题。²杨宪邦教授认为，现代新儒家主张“返本开新”，死守道统，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超过西方，这太过于保守，太过于感情化，新儒家对西学的吸收和对传统的改造是不成功的。

三、关于现代新儒学与马列和西化的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现代新儒学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综合创造。作为一股与马列主义和西化思潮并存的独立的思潮，它是基于对二者的抗衡而出现的，但它既不是西化思潮的对立面，也不是马列主义的对立面。¹李锦全教授认为，尽管新儒家中的个别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持排斥的态度，但从总的情况和发展趋势来讲，现代新儒家是容忍马列主义的。²施忠连同志认为，现代新儒学与马列主义和西化思潮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现代新儒家所发挥的心性之学，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性、主体性等方面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

（下转第60页）

经济特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模式 与基本途径

吴群策 严建强

我国的经济特区能不能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结构中“三资”企业占很大的比重，经济运行又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特区这样的社会存在，会给人们的社会意识带来什么影响？这是人们在探讨经济特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模式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这里，先要澄清一种误解，即以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必然意味着社会上各种经济成分占多大的比重，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数占多大的比例，他们的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在社会上占据相应的地位。其实，历史唯物论所讲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任何社会，劳动群众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可是在以往的阶级社会里，劳动者阶级的意识，却从来不能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

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这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说的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统治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处于支配的地位，就依仗他们所掌握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包括报纸、电台、电视、书刊、学校、讲坛等宣传舆论工具和教育阵地，有意识地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使之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这显然不是从各种经济成分和人数在数量上的比例来说的。

按照这样来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就会清楚地看到，特区的经济环境恰恰是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这和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的：愈是实行改革开放，愈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经济特区十年建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确定特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模式时，一方面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保持先进性；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对不同层次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注意广泛性。

事实上，特区的环境和它所面临的任务，在许多方面都对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对外更加开放、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竞相发展的特殊环境中，要保持党员、干部的廉洁和高效率，使他们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没有全体成员的特别高的思想素质，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政策上要“特”，但在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上却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搞特权，不能当特殊党员。尤其是在“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情况下，各级干部的职权加大了，责任也加重了，要做到既在改革开放中学到本领，又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中央和省的领导同志一再强调，在特区要纪律更严、执法更严、管理更严。特区的党员、干部要有特别高的觉悟、特别好的作风、特别严的纪律、特别高的工作效率。又如，特区的社会风气，要在对外频繁交往、境外书刊、音像制品、电视广播不断渗入的情况下，既保持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又使之健康有序，如果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分明的指导思想，没有广大群众思想素质和辨别能力的提高，是不可能做好的。

可见，特区的思想道德建设不仅不应降低标准，而且应当坚持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那种认为特区只应当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明”、“爱国主义文明”，或者只能笼统地提“现代文明”等想法，是不符合经济特区的情况的。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特区必须坚持建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区的思想建设，要旗帜鲜明地把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宣传放到突出的位置上。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是无法抵御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思想和落后思想的侵蚀的。诚然，马克思主义需要新的发展才能科学地回答特区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而这正需要全党共同努力。没有认真的学习和切实的应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将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由于特区经济结构的复杂性，特区的人员结构是多层次的，我们不能不加区别地同等要求。例如，对于党员、干部和先进分子，应当要求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群众的表率；对于广大劳动群众，主要要求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作出自己的贡献，走劳动兴家、劳动致富的正路；对于外商和外宾，则要求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法令和特区的管理规定，通过合法经营取得合法收入。总之，要促使不同思想觉悟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特区建设的强大精神推动力和凝聚力。

特别是由于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境界、觉悟水平呈现复杂的多层性。在总体上说特区仍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既要大力倡导为满足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辛勤劳动的奉献精神，又要承认人们讲究等量劳动交换、劳动致富的较低层次的价值观。在这里，重要的是不要把人们不同层次的思想境界绝对对立起来，而应当在思想道德建设中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并且在实践中因势利导，逐步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不断扩大先进分子的队伍，培育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

总之，经济特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坚持建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适应特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包括开拓、创新、奉献精神和社会主义商品意识等多层次内容的，积极、向上、进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二

在经济特区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特别要注意紧紧地围绕着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来进行，这也是实现特区的思想道德建设目标的基本途径。

首先，特区的思想道德建设，要着眼于调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精神文明建设是为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服务的。特区的思想道德建设必须为特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精神的动力。尽管人们在接触特区的精神生活领域时，往往首先遇到的是摆在面前的反腐蚀的尖锐问题，但是，从更宽阔一些视野来看，破和立是辩证的统一，不调动起健康的、积极的因素，是无法克服腐朽的、消极的东西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所强调的“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完全适用于特区的思想道德建设。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经济特区迫切地需要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积极性的新的精神面貌。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说的：“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

惰、惧怕改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

深圳特区创办之初，罗湖区的同志就深有感触地说：“大锅饭的体制是腐蚀人的”。因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其本质是：不干活或少干活的人，无偿地占有了那些多干活、干好活的人的劳动。这种僵化的旧体制并不能产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而只能助长同社会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懒汉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旧体制下的人，要适应特区紧张、高效的经济生活，必须经历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转变。特区的思想建设，要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势和要求，充分发挥劳动者的潜质，激励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

着眼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要善于因势利导，把人们对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要求，化为努力进行生产建设的积极性。特区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发达国家的一些高级消费品如彩电、冰箱、空调机、摩托车、音响组合等很快就传到特区市场上来，对一些人有很大的诱惑力。如果我们注意加强劳动教育，使人们懂得社会的生活水平必须也只能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个人的生活水平必须也只能同自己的劳动收入相适应，把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化为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动力。反之，如果忽视了教育和引导，一些人盲目追求超过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自己正当收入水平的物质享受，就会走到不劳而获以至违法犯罪的邪路上去。

着眼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还要适

应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要求，在特区大力倡导“开拓、创新、奉献”的精神，培植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不当离开对社会的贡献，去抽象地评价人们道德观念和思想境界的高低，那些不求对社会有贡献而只是一味强调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和清教徒，对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是社会所不需要的。只有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的奉献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在全社会形成生气勃勃的、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深圳特区的实践经验表明，有“立”才能“破”，培育起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进取的精神，才能为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特区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既要排“外污”，又要排“内污”。

任仲夷同志在回顾广东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对外开放要排污，既要排“外污”，更要排“内污”。这不仅完全切合特区的情况，而且也是对特区经验的深刻总结。

从深圳特区的情况看，“外污”的突出问题，一是政治思想方面，通过境外的电视、广播和流入的报纸、刊物，散布资产阶级的民主观、自由观，对干部群众起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经济活动中，送礼行贿以至走私贩私，拉拢腐蚀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干部；三是黄色的书刊和音像制品流入，毒化着社会风气。对这些“外污”，一手要抓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活动；一手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深圳有关部门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还提出要处理好以下

五个关系：有所吸收与有所抵制的关系，放与管的关系，宽与严的关系，堵与导的关系，防御与进攻的关系。这就从政策界限上回答了如何排“外污”的问题。

大量的事实表明，“外污”是通过“内污”才会泛滥成灾的。无论是政治观点上的摇摆、经济上的贪污受贿、生活上的腐化堕落，都是同这些人自身所固有的思想弱点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必须对排“内污”给予高度的重视。更何况，特区中许多丑恶现象，诸如以权谋私、以权代法、官僚主义、任人唯亲、平均主义等，是同外来影响没有直接关系的，如果我们仅仅注意排“外污”这一方面，是不可能搞好特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

从深圳特区的情况看，“内污”的突出问题，一是封建主义特权思想的残余，表现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至发生一系列违背廉政建设的腐败现象；二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各种“僵化半僵化”的观念，平均主义、害怕商品经济，障碍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从广义上看，清理“内污”，是应当包括清理一切阻碍我们社会进步的旧观念和种种落后现象的。

总之，思想道德建设，无疑要为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创造精神条件。着眼于调动积极性是直接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而既排“外污”又排“内污”，才能全面地清理各种自由化思想和僵化半僵化的观念，克服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以及落后保守的思想，保证四项基本原则的贯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执行。

三

在经济特区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应当

同自觉地培育社会主义的商品意识统一起来，这是因势利导、逐步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的现实途径。

特区发展十年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人们的思想道德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促使效益、时间、平等、竞争、信息等现代观念的强化，增强自主、民主的意识；另一方面，它又诱发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思潮，腐蚀一些人的灵魂。全面地分析这种情况，对指导特区以至全国的思想道德建设无疑是很重要的。

然而，作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按其趋向和本性来说，是能够同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相一致的，而不是注定要发生“二律背反”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为不断解决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为建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商品意识奠定了基础。

商品生产是为了满足他人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由于必须要通过产品的交换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价值），这就迫使每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把各种产品加以比较，对自己从事生产取得的成果加以衡量，这就产生了盈利的观点，讲求经济效益的观点。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必须盈利，必须讲求经济效益。但是，讲求经济效益却有不同途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它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生产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只是手段。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择手段地赚钱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尽管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能顺利运转，资本主义道德规范也要提倡以顾客为上帝，讲求信誉，以产品

质量取胜，反对坑害社会、欺诈顾客和同行的行为，等等。但这些都只能具有虚伪的性质。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商品生产追求利润、讲求经济效益的实质，就是如何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使商品生产的直接目的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统一起来，从而为不断解决商品经济内在的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效益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和经营要讲求价值和利润，但必须是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降低产品成本、节约资金使用、保持合理价格、合理推销产品、讲求信誉的前提下进行。只有这种合理合法的价值和利润才和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相一致，否则，如果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追逐不义之财，那就与讲求经济效益背道而驰了。

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尽管矛盾始终存在，但却是可以不断解决的，并非不可避免地出现“二律背反”。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促进思想道德的建设，可以为不断解决这一矛盾提供思想条件。不是有人担心特区人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面前会“一切向钱看”吗？然而正是特区人提出了“信誉是宝贵的资本”的口号。他们认为，没有信誉，一不能贷款，二不能吸引外商进来投资，三不能推销产品，决不能为了眼前经济效益而丢掉信誉，导致负社会效益。这是社会主义效益观念的生动体现。因此，“一切向钱看”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意识，决不是发展

商品经济、讲求经济效益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关系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等价关系，所反映的本质上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等量劳动互换的关系，它同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关系也是相容的。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要求等价交换，这种交换，是根据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所决定的商品价值来进行交换的。尽管其中包含有生产条件不同、自然条件不同以至市场机遇不同等非劳动因素形成的差别，但在简单商品经济的交换中，其主要内容和实质还是人们之间的等量劳动交换。在这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等价关系就是劳动互换的平等关系。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家和工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双方在劳动力的买卖中固然是按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易的，但由于资本家阶级垄断一切生产资料而工人则一无所有，因此后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供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剥削。这种等价交换显然掩盖着阶级剥削的不平等关系，它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力总的来说已经不是商品，在商品等价交换中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者之间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的平等交换关系。尽管生产条件、自然条件、市场机遇等非劳动因素仍然存在，但国家通过税收、上缴利润等经济杠杆使这些因素形成的差别不致无限制扩大。这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等价交换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就基本上是相一致或者相接近的。因为在按劳分配中所包含的也是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

相交换的原则。

当然，作为一种价值观，等价交换的观念如同按劳取酬的观念一样，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较低层次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能只讲等价交换，也不能在一切领域都讲等价交换，它首先要讲理想，讲奉献，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才是社会主义较高层次的价值观。我们承认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观念有不同的层次，在实际工作中就不要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而应当通过教育、引导，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

总之，社会主义商品意识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把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的崭新观念。它同反映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观念，是根本对立的。

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商品意识显然不能够自发地形成。如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本身不是自发地运行一样，社会主义的商品意识更不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这是需要我们自觉地下大力气加以培育的。

四

把思想道德建设同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是使之能够自我启动的重要途径。

思想道德建设不能光靠行政手段，光讲外部的灌输，而应当从内部去把握它自我启动、自我运转的机制。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强调物质文明的发展对精神文明的要求，强调社会对个人的思想道德、思想境界的要求；而较少注意精神文明建设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拥有丰富、高尚的精神生活，使

自我的价值能够充分地、有意义地得到实现。这大概正是一些单位和地区搞精神文明建设缺乏主动性、推一推才动一动，以至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和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精神文明建设自我启动、自我激励的机制。

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马克思把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普遍性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我们党提出的建设“两个文明”、满足人民“两种需要”的根本任务，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人的需要发展的这种特点。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不是清一色的，单一层次的，而是多结构、多层次、多要素的需要体系。其中最基本的有两大层次：第一是物质需要，它是人们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第二是精神文化需要，即优质充足的“精神食粮”，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它是人们进行精神生产和精神发展的精神动因。单就后者来说。为了实现和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人们要求接受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和认识能力；要求有生动活泼的文娱活动，欣赏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以得到美的享受；要求在社会交往中得到别人的尊重，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声誉，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精

神境界，逐步臻于自我实现、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等等。正是为了满足人本身具有的上述由低而高的精神需要，才必须有各种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从最低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始，一步步地最终实现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

深圳的同志正是在充分考虑人们有各种层次精神需要的基础上，使思想政治工作“寓教于乐”，寓教于各种生动活泼的活动之中。由于把思想教育与满足精神需要结合起来，从而收到较好的实效。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思想道德教育还应当调动人们在精神上要求全面发展、要求自我完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毛泽东倡导大家要做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刘少奇强调共产党员要有很高的修养，这都是从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把自身的精神需要与思想道德建设统一起来。可见，人的精神需要是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因，是启动机制和激励机制，是决定人的精神状态即积极性、自觉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的原动力。抓住了这个机制，必将使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出现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讲师团

责任编辑：范 英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一门学科

刘兆权

在思想政治工作一度受冷遇之后，近一年多来，从中央到基层，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呼声又重新高涨起来。不少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提出，要为思想政治工作“正名定位”，包括把它摆到重要的地位上，树立起政工部门的权威，解决一系列具体的实际问题等。这些都是很必要的。此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探索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理论的概括，建立起一门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科，使之理论化、科学化、体系化。这也是为这项工作“正名定位”的基础性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革命实践活动。它从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产生了。在建党初期，这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启发劳动大众的阶级觉悟，发动和团结劳动大众投入阶级解放的斗争洪流。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建立了苏区和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也开始由初级形态转为较为稳定的一种制度。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革命军队实行“支部建在连队”，实行政治指导员制度，并发表了《关于纠正党内的

错误思想》一文，第一次从理论上确立了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方针、原则。此后，毛泽东又发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提出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不仅奠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也奠定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理论基础。后来，毛泽东同志陆续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青年运动的方向》、《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一系列文章，全面融汇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革命队伍建设、群众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思想精华，成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传统。建国后，这一优良传统不断继承和发扬，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又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条件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了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方针、原则、方法，为调动广大人民的社

会主义积极性,促进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证明,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科理论体系,是客观的要求,也具备了客观的条件,它对保证我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课题。

二

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科,必须遵循科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也就是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再回到实践之中,如此循环往复,直至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从学科体系的范围上说,它必须包括:一、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特点、学科形成历史、学科发展、学科任务和作用;二、思想政治工作学的基本概念、范畴;三、思想政治工作学的主要内容和内外部运作规律;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论原则;五、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及评估方法;六、思想政治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等等。由于是一门新的学科,所以如何建立起既符合学科规律又有本学科特点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新学科,应该不拘一格,进行探索。但我认为,这门学科的建立,有如下几个基本原则必须加以贯彻:

一是这门学科的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思想政治工作,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条件之中,是有不同的本质规定性的。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工作(尽管他们不屑这一概念),他们也要向群众做思想宣传、教育和灌输工作,为资本主

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理论基础,以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为根本目标,通过各种方式,正面教育、疏导、宣传,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因此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宗旨、内容,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宗旨、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它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体现和贯彻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和渠道;也是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它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长期求解放、求发展的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全新的形式。所以,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明确地公开申明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

二是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扎根于群众的革命实践,服务于群众的革命实践,融汇于群众的革命实践。它不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对群众的“布道”,也不是强迫式的思想专制,而是在实践中依靠群众,实行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一种实践活动。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而且明确申明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因此,它强调要贯彻群众路线,要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原则,关心人、尊重人、教育人、培养人。由于这样的特点,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科始终贯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论述为主线,研究

人的利益和阶级利益、人的心理、人的需求、人的活动以及人际关系等规律，探讨如何才能更有利于做好人的思想工作，达到思想政治工作预定目标的原则、方法途径，确定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进行评价的科学方法、尺度等等。

三是学科的综合性和应用性。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学科，无论从理论基础，还是从实际方法上，都是综合性的。它以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为主要理论基础，同时，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行为学、人际关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同时它还广泛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优秀成果融汇到自己的体系之中来。对于我国古代的优秀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如爱国主义精神，强调自我修养，主张兼济天下的积极参与精神等，就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又如西方行

为科学理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学科的一些概念、方法，也是可以借鉴和汲取的。

四是实践性和应用性。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作为它的学科理论，也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因此，在学科建设中，既要讲求理论概念、体系框架、逻辑联系的科学性，又要十分注意它的实用性。要尽可能把我党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上升到理论层次，总结到思想政治工作学之中去，要注意学科内容在运用中的可操作性，等等，使这门学科成为指导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实际工作的科学。

总之，一个学科的确立，是在长期实践和研究中才能完成的，笔者所述，也就是作为提出问题，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广大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和讨论。

围绕经济工作中心,做好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

陈献侃

企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好生产,抓好经济效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这一中心去做,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在具体的实践中,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中心工作结合得更紧密,互相协调、配合得更好,则并不是那么简单。这里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关系处理的问题。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生产经营去做,这是我党一贯的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点更显得重要。思想政治工作历来都是服从于党的中心任务的。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总是结合“打仗”去做的,从而使党的政治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创造了革命胜利的辉煌业绩。建国以后,毛主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企业既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任务,又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任务。这是我们企业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标志之一。一个企业经济效益不高,不仅取决于有无科学技术、先进管理制度,而且取决于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是否最大限度地激发起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应针对职工的实际思想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而职工的思想又往往通过各项生产活动表现出来的。只有结合这些具体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去做,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才能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一、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既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又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者。国家、集体、个人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三者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我们要对

职工进行“三兼顾”教育,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在当前,企业实行厂长(经理)承包负责制,厂长承包年限是三至五年,较容易滋长企业短期行为。有些工厂分光吃尽,不留积累;或片面地照顾个人利益,忽视了集体、国家利益,这当然是错误的,必须引起注意。例如我们海南化学纤维厂,抓住“短期行为”的苗头,开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教育。工人要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生产好了不能忘记对国家的贡献,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先公后私,先集体后个人。经过教育,除超额上缴完成国家任务外,还积极筹集资金扩大再生产,全厂八百多职工共集资人民币四十万多元,厂出资人民币五十万元,扩建一间纸箱厂,目前已投产。这表明,广大职工是热爱社会主义的,只要思想工作做到家,他们是会顾全大局,以主人翁的精神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企业、国家利益的。

二、经营者积极性与劳动者 积极性相结合

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只有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企业领导者的积极性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光有经营者的积极性而没有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不行的。有了群众的积极性,党的方针政策、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领导者的主意和办法,就能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取得实际的效果。前段时期,在资金紧缺和能源紧缺的情况下,我厂仍然完成了国家任务,上缴税利1200万元,如果没有职工的积极性,这是不可能的。

三、大道理与个别访问相结合

说理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很重要的方法。所谓说理教育是指用科学的正确的道理去启发人、说服人，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职工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说得有理，又身体力行，就能为人们所信服。实践证明，不耐心讲道理，仅靠手中的权力，搞我压你服，我打你逼那一套，不但无助于职工思想的转化和提高，反而还会引起职工的反感，是不会获得好结果的。

说理的核心是个“理”字，理直气才壮。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要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有较高的政策水平，有较完备的知识结构。如果我们自己理论水平不高，政策界限不明确，怎么可能使受教育者明白道理呢？道理分为大道理和小道理。所谓大道理是指那些能够驾驭、制约其他道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等等。大道理是我们说服人、教育人的理论基础，但是懂得大道理还不能解决所有的思想问题，要求我们还要懂得受大道理制约，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各种各样具体问题的小道理。如企业中的提倡团结协作、讲求信誉、风格道德以及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各种人情事理等，都属于小道理的范畴。这就要求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说理教育要有针对性，根据不同对象不同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教育的对象是千差万别的，他们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家庭状况不同，思想水平不同，心理特点不同，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因人施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决不能千篇一律。例如我厂动力车间一个工人，平时工作表现不好，经常请别人代班，自己到外边开小汽车赚钱，车间领导多次批评无效果，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找他个别谈心，并到他家进行访问，了解到他父

亲身亡，母亲年老不能参加劳动，妹妹在家无业可就，全家的生活靠他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活很困难。据此，除严肃批评他工作上的缺点外，还努力帮助他解决家庭中的一些具体困难，鼓励他搞好团结，把工作搞好。经教育后，他进步较明显，在工作上表现很好。从这事例中我们认识到，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首先要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据不同对象“对症下药”，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四、思想政治工作与办实事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是搞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关心群众的疾苦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如果离开群众的切身利益去搞思想政治工作是不会取得好效果的。群众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遇到实际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而一时又无法解决时，难免会产生思想波动，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厂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切切实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融汇到为职工办实事之中。例如，美化厂容厂貌，为职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增建职工宿舍，解决居住条件差的问题，使职工安居乐业；根据市场物价、职工生活的实际，及时发放福利补助，有实际困难的职工能得到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积极赞助厂区附近学校，以解决职工子弟入学难问题；举办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树新风，破旧俗，寓教于乐，等等。

从办实事中，职工与干部、与企业的联系更密切了，他们切实感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温暖，生产的积极性也激发出来，企业生产效益一直较稳定地发展。

作者单位：海南化学纤维厂

责任编辑：有能

论证券投资计划

何小锋

证券投资，正在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从1981年至1989年末，我国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已达1540亿元人民币。证券品种已有：国库券、国家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国家建设债券、重点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地方企业债券和股票。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至1989年10月底，我国已有6000多家企业发行股票，数量已达35亿元。在深圳、上海等城市，股票交易所已具初步规模。证券市场的发展不仅使企业机制发生变革，而且使社会公众的货币收入逐步转化为投资。可以预料，将有更多的机构和个人成为证券投资者。

如何认识证券这类对我们仍很陌生的投资工具，跃跃欲试的投资者如何制订一个切合实际的投资计划。这需要研究、借鉴国外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找出一套适合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和投资者的特点的具体策略和方法。

二

证券投资计划包括投资的目标、策略、方法和步骤。一般而言，证券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具体而言，证券投资的动机可以有很多种，例如掌握股权以控制企业，投入闲钱以寻求保值，长期持有以备未来升学、养老之需，满足业余涉猎经济之爱好，等等。必须指出，证券投资是具有风险的，上述动机并不一定能如愿实现。

在讨论证券投资计划之前，有必要对国外较流行的证券投资计划作一个总结和评价。

（一）趋势投资计划（Trend plan）

趋势投资计划所关心的，是股票市场上升或下降的主要趋势或长期趋势，这种趋势一旦出现，会保持在相当稳定的一段时期。投资者可凭借某种信息判断趋势的出现和转变，决定自己购买或出售的时机。在趋势投资计划中，最受人注意的是道氏理论。

1. 道氏理论（Dow theory）

道氏理论开始由华尔街日报编辑查尔斯·道（Charles H. Dow）提出片断思想，经过该报记者纳尔逊初步总结，由汉弥尔顿（William P. Hamilton）补充发展，成为股票投资的最有权威性的理论，其最充分的解释表现在罗素（Richard Russell）所著《道氏理论书简》（Dow Theory Letters）之中。

道氏理论认为：股票市场的趋势有三种：（1）主要趋势，指长期的上升或下降趋势；（2）次要趋势，指长期上升趋势中所发生的暂时回落，或者是长期下降趋势中所发生的暂时回升；（3）日常趋势，指股票价格的日常波动。道氏认为，三种趋势的重要性也按上述次序排列，因而他把注意力放在第一、二种趋势上。

主要趋势和次要趋势，可以依据铁路股票价格平均数和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数作出预测。前者反映铁路未来业务和收益，代表工商业产品的移动；后者反映全国的生产水平和收益，代表全国商品产量的水平。股票的主要趋势，只能在两种平均数的互证下，才能确定出来。这可以分为三种情形：（1）一旦两种平均数经过一段牛皮状态的波动后，突然向上发展，便产生一个肯定上升趋势的信号；如果突然发生暴跌，便表示市场的趋势下降。（2）有时没有牛皮状态，两种平均数会在很短的时期产生相反的趋势，只要两种平均数的高点在同一时期内超过了过去的高点，便有繁荣市场的产生；一旦两种平均数的新低点同时低于以前的低点，便有不景气市场的产生。（3）如果一种平均数上升，另一种平均数下降，则不能反映出主要趋势。

道氏理论能够预测市场的转折点，使投资者能够在一种趋势告一段落之前，获得一定的利润，或者少受损失。但随着时过境迁，这种理论的实用性越来越小，其缺陷有：（1）欠准确性，仅以长期趋势为讨论主题，无法指出盘旋时期的买卖策略；（2）依据不当，几十年来，美国股市中铁路股占比渐轻，已不宜作为预测股市的基础；（3）过于笼统，仅对于整个股市作出预测，但不能指出哪些股票会涨、跌，因而无法帮助投资者选择股票；（4）初期偏差，对长期趋势的初期的预测，因变化刚开始，尚未明朗，常有误判。

2. 哈奇计划 (Hatch plan)

该计划的创始人哈奇从1882年至1936年，因施行此计划而使他的资产由10万美元增至1440万美元。直到他逝世后，此计划才被伦敦金融新闻界公布。

哈奇将所购买的股票，在每个周末计算价格平均数，在月底再将各周的价格平均数相加，求出一月的平均数。如果本月的平均数，较上次的最高点，下降了10%，他便出售全部股票，不再购买。等到他所卖股票的平均数，由最低点回升到10%，再行买进。哈奇采用此计划53年中，改变了44次投资地位，所保持股票的期限，短者为三个月，长者为六年。

这个计划的好处是可能使投资者从上升趋势中以较低价格买进股票，并保证损失在一个有限的、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而收益则不受限制。但此方法也有过于机械之嫌。特别是在熊市时期，股市长期处于下降趋势，但中间可能有几次反弹回升，如果在回升超过10%时买进，接着在下跌时又卖出，反复几次，投资者可能遭受连续损失。因此，此法不适宜股市下跌趋势的情形。

（二）公式投资计划 (Formula plan)

所谓公式投资计划，是指投资者按照一种程式来进行投资，它不要求事先预测股票

市场价格的变化，而是在变化出现以后，及时利用以获得利润。

公式的种类繁多，公开的只是少数。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股价等级来拟订，第二类是根据平均资金来拟订，第三类是根据股票与债券的比例关系拟订。总原则是价格下降时买进，价格上升时抛出。

1. 等级投资计划 (Scale plan)

以普通股为投资对象，首先确定股价升降的某一幅度为等级标准，例如以1%或一元为一级。然后，每次股票下降一级时买进一定数量的股票，股价上升一级时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这样，会使卖出时的价格，大于买进的价格，即平均购买价格低于平均销售价格，以获取差额利润。

这种方法特点是较为简单易行，但适用性也有限，它只适用于股票价格有升有降的持续波动时期，如果是长期下降或长期上升时期则不适用。因为长期下降时，投资者只是购买股票，没有机会出售股票，此时需要及时停止购买，调整计划。而在长期上升时期，分次出售会丧失可能得到的更大收益，一旦出售完毕，难以再次进入股市。因此，投资者需要对股市大趋势预测准确，并且有雄厚现金作后盾。

2. 资金平均计划 (Dollar averaging plan)

即投放同样数额的资金（例如500元）在同种股票之中，不管股票价格如何变动，维持定期定额投放，经过一段长时期后，投资者帐面上有可能获利。这种投资方法有点类似于储蓄中“零存整取”的方法。

此计划的特点在于：连续投入，一次收回，便于投资于为未来某一目的而增殖资金，管理也简单。但它的适用性也是有限的：（1）长期投入，需有固定的资金来源；（2）适用于股价上升趋势，不排除暂时下跌，如果股价呈持续下降趋势时不宜采用。

3. 常数投资计划 (Constant dollar fund)

即经常保持所拥有股票价值的常数，股价上升时将相当于溢值总值的股票卖出，再用来买进债券；股价下降时，出售一部分债券，买进相当于缺口价值的股票，使股票的投资金额固定在一个数量上。利用这个方法时，要确定何时开始买进最恰当，应避开在股价最高点进入。至于如何确定买卖的界限问题，有的分析家依据经验分析认为，在股票增值25%时就应出售，股价下降20%时应该买进。这种投资方法多为银行和机构投资者所使用。

4. 固定比例计划 (Fixed proportion plan)

这种方法由法沙学院基金会创立，所以也称为法沙投资计划，其含义是将投资金额分别投放于股票和债券，并使股票金额和债券金额维持在一个固定比例水平。这个比例如何确定，是四六开还是三七开，有赖于投资者的预测分析能力，但比例一经确定则不轻易改变。如果股票升值或贬值一定百分比（例如20%），即通过卖出股票、买入债券，或买入股票、卖出债券来调整，以保持不变的股票与债券比例。

这种方法使高、低风险证券搭配，把增值与得值适当结合，立足于在长期持有中得

到好处，但不够灵活，有时会牺牲短期的盈利机会。

5. 变动比例计划 (Variable proportion plan)

指投资者随着股票价格平均数的上升或下降，而相应变动投资总额中股票和债券之间的比例，以获取利润的投资方法。利用这个方法需事先确定中央价值(Central value)，通常以过去十年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中央水准，且以每季为单位来计算平均数。例如，美国曾有投资者以1968—1977年道·琼斯30家工业股平均数800点为准，开始以总金额的50%投资于股票，50%投资于债券。若该平均数上涨50点，则股票基金的比例降低到45%，债券的比例上升到55%；若平均数再上升到100点，股票与债券之比则为4比6，余此类推。相反，若该平均数下降，则应投资一定百分比购买股票而出售债券。

也有的专家以价盈率作为中央水准，例如过去十年(1968—1977年)道·琼斯工业股平均价格盈余比率是12比1，当该比率下降时，投资者买进部分股票从而增加股票比例；当该比率上升时，出售部分股票从而减少股票比例。

6. 耶鲁计划 (Yale plan)

这种计划由耶鲁大学于1938年采用。当时投资金额为8500万美元，以70%购买高级的公司债券，30%购买普通股，该计划规定，一旦股票价格上升，使购买者的股票与公司债券的比例变为4:6，则卖出股票，从而使股票与债券比率降为3.5:6.5；一旦股票下跌，使原有比率变为2:8，则购进股票，使股票债券比例上升为2.5:7.5。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上述变动比例计划的一种特例，没有以中央价值作水准。

(三) 投资组合计划 (Portfolio plan)

投资组合计划立足于分散证券投资的风险。证券风险分为两种。一种为系统性风险，这是由于政治、经济的变化对整个证券市场的影响，它给市场上所有的股份企业都会带来损失。这种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利息风险和购买力风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难分散的。另一种为非系统性风险，是指个别企业独有的风险，包括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这种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组合来分散从而减少。一般经验证明只要投资于10种以上的证券就可使风险减少到极小。

1. 投资组合策略

投资组合分析的理论告诉我们，在制订证券投资计划时，应采取下面的策略。

(1) 证券品种的多样化。各种证券的风险不同，这些风险常用统计学上的标准差概念来衡量。一般来说，标准差越大，说明风险也越大。投资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资金的特点，把投资分散于不同的证券品种中。

(2) 证券所属行业的分散，如工业股、金融股、公用事业股的分布。如果把“鸡蛋”只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该行业不景气，难免遭到损失。

(3) 期限的分散。资金要陆续投入，收益也要陆续收回。期限长的证券，收益与风险都大，因此要搭配好长短期证券。

(4) 多种证券之间关系的淡化。两种证券收益之间的关系，从避险的角度考虑应是

负相关关系，起码是很小的相关程度，这样可收“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果，以免一旦市场不利，受到连串打击。

2. 有效投资组合。

所谓有效投资组合，是多种投资组合方案中，预期收益相同，风险较低的组合，或者是风险相同，预期收益较高的证券组合。有效投资组合对制订投资计划，或者事后检查以前计划的效果，都是有用的方法。

假设投资者有一笔资金要投放于两种证券之中。首先，他分别预测未来各种可能状况出现时收益率的概率，设有下表：

可能状况	概率 $f(x_i)$	证券 1 的收益率(%) x_{1i}	证券 2 的收益率(%) x_{2i}
a	0.1	5	-1
b	0.4	7	4
c	0.3	-2	2
d	0.2	10	12

其次，他根据上述资料，对两种证券的预期收益作出评估。预期收益就是所有可能的收益的加权平均，其权数是每种可能收益的概率。

$$\begin{aligned} \text{证券 1 的期望收益率 } E(X_1) &= \sum X_{1i} \cdot f(X_i) \\ &= (5 \times 0.1) + (7 \times 0.4) + (-2 \times 0.3) + (10 \times 0.2) \\ &= 4.7\%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证券 2 的期望收益率 } E(X_2) &= \sum X_{2i} \cdot f(X_i) \\ &= (-1 \times 0.1) + (4 \times 0.4) + (2 \times 0.3) + (12 \times 0.2) \\ &= 4.5\% \end{aligned}$$

第三，作出风险评估。设以标准差来衡量风险，据公式分别计算出两种证券的标准差。

$$\begin{aligned} \text{证券 1 的标准差 } \sigma_1 &= \{\sum [X_{1i} - E(X_1)]^2 \cdot f(X_i)\}^{\frac{1}{2}} \\ &= [(5 - 4.7)^2 \times 0.1 + (7 - 4.7)^2 \times 0.4 + (-2 - 4.7)^2 \times 0.3 \\ &\quad + (10 - 4.7)^2 \times 0.2]^{\frac{1}{2}} \\ &= 4.6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证券 2 的标准差 } \sigma_2 &= \{\sum [X_{2i} - E(X_2)]^2 \cdot f(X_i)\}^{\frac{1}{2}} \\ &= [(-1 - 4.5)^2 \times 0.1 + (4 - 4.5)^2 \times 0.4 + (2 - 4.5)^2 \times 0.3 \\ &\quad + (12 - 4.5)^2 \times 0.2]^{\frac{1}{2}} \\ &= \sqrt{16.25} = 4.03 \end{aligned}$$

第四，考虑投资组合。设有两种可行方案，A方案按6：4投资于证券1和证券2，

B方案的投资比例为4:6。可分别计算两种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begin{aligned} \text{A方案预期收益率}\mu_A &= (4.7\% \times 0.6) + (4.5\% \times 0.4) \\ &= 4.62\%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B方案预期收益率}\mu_B &= (4.7\% \times 0.4) + (4.5\% \times 0.6) \\ &= 4.58\% \end{aligned}$$

第五，对A、B两方案算出投资组合的风险。这里不考虑两种证券收益之间的相关关系，仅计算其组合的标准差。

$$\begin{aligned} \text{A方案标准差}\sigma_A &= [\Sigma(0.6X_{1i} + 0.4X_{2i} - \mu_A)^2 \cdot f(X_i)]^{\frac{1}{2}} \\ &= \sqrt{16.16} = 4.02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B方案标准差}\sigma_B &= [\Sigma(0.4X_{1i} + 0.6X_{2i} - \mu_B)^2 \cdot f(X_i)]^{\frac{1}{2}} \\ &= \sqrt{15.17} = 3.9 \end{aligned}$$

第六，计算两种证券的相对风险、两种组合方案的相对风险。采用风险对预期收益的比例来代表相对风险(CV)。相对风险可用来比较投资方案，相对风险指数较大，说明该方案的风险相对大，方案较差。

$$\text{证券1的相对风险} CV_1 = \frac{\sigma_1}{E(X_1)} = \frac{4.6}{4.7\%} = 97.9$$

$$\text{证券2的相对风险} CV_2 = \frac{\sigma_2}{E(X_2)} = \frac{4.03}{4.5\%} = 89.6$$

$$\text{方案A的相对风险} CV_A = \frac{\sigma_A}{\mu_A} = \frac{4.02}{4.62\%} = 87.0$$

$$\text{方案B的相对风险} CV_B = \frac{\sigma_B}{\mu_B} = \frac{3.9}{4.58\%} = 85.2$$

将上述数字列表，比较四种方案：

序号	策略	收益率(%)	风险(σ)	相对风险
1	全投证券1	4.7	4.6	97.9
2	全投证券2	4.5	4.03	89.6
3	60%证券1, 40%证券2	4.62	4.02	87.0
4	40%证券1, 60%证券2	4.58	3.9	85.2

第七，作出分析结论。

(1) 投资组合的两种方案与没有投资组合的两种方案比较，收益率居中，但风险较小，综合二者考虑的相对风险较小，因而是较佳的。

(2) 在投资组合的两种计划中, B方案(40%证券1, 60%证券2)的相对风险更小, 因此是有效的投资组合。

(3) 结合考虑证券市场的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和投资者的条件以后, 可按照上述思路, 通过计算逐步逼近, 找出最佳的投资组合。

(4) 假设采取了某种投资组合方案, 上述方法可在事后检验该种组合是否比以前的方案更有效, 从而作出总结和评价。

必须指出, 投资风险不会因投资组合而完全消失, 而且投资组合也可能失去潜在的盈利机会。至于有效投资组合的分析, 没有考虑到证券间相关关系和证券买卖差价带来的升水或贴水。此外, 投资组合方法更适宜拥有巨资的长期投资者。

三

上面所分析的只是五花八门的投资计划的一部分, 实际上, 并没有一种完美的计划。证券市场上也没有常胜将军, 投资者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 选择或搭配使用较好的投资计划。特别在中国刚刚创办的证券市场中, 国外的证券投资方法与策略并不完全适用, 需要根据自己的特点, 因地制宜, 寻找出一个市场初兴时期的特殊计划。对此, 本人提出一些参考意见。

1. 做好准备工作。包括: (1)掌握证券投资的知识, 研究初兴市场的特点。(2)检查自己投资资金的来源和稳定性, 必须要有一笔相当数量的闲置现金, 才考虑投资证券, 且不能一次全部投入。(3)检查自己的投资对收益的依赖程度, 如果依赖于资金的保值, 且随时可能兑现用钱, 不妨投资于收益稳定、变现性易的国库券等证券。如果依赖于增值, 则应以收益稳定、发展前景良好的高级公司债券和股票为投资对象。(4)检查自己的能力和时间, 如果对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不懂行, 或者没有时间处理变化多端的市场风波, 则最好委托信誉好的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管理, 或聘请投资顾问。

2. 以小额投资抢先进入市场。在人们对股票市场了解不多时, 果断投入试探性资金, 一方面积累经验, 另一方面竞争小, 有利机会多, 待投资需求起来后, 手中已掌握一部分经验, 处于主动地位, 先着之利是多方面的。

3. 分期分批以发行价买入股票。在一个新建的市场里, 为刺激股市发展, 发行时一般不定价太高, 因此股票发行价很可能比流通价低, 从而取得溢价收益。

4. 买进成长前景好的股票并长期持有。投资者需有长期持有的准备, 不贪图小利, 相信随着上市企业和股票市场的成长, 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者会获得更大的收益。

5. 待市场基本发育起来后, 再适当调整策略, 借鉴国外的投资计划。此时市场已进入正常发展的初步成熟时期, 各种避险工具不断涌现, 各种资料已积累起来, 才有借鉴和选择国外的投资计划的条件。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

责任编辑: 郑英隆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现实选择

刘品安

(一)

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

劳动力与其它生产要素一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时刻流动的。但导致劳动力产业分布及空间区位的流动，却有着特定的发生原因和特定的实现方式。

(1)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劳动力的流向不同。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研究了1950—1970年世界人均国民总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典型变化基础上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初级产品生产所占用的劳动力比例下降，工业生产的比例会提高，服务业所占用的比例会以更大的速度提高。发达国家迄今实现的两次劳动力流动高潮也表明：发生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两次劳动力流动高潮有着不同的流向。第一次流动高潮是社会劳动力从古老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空间地域上从乡村向城镇集聚。第二次流动高潮是在第一次流动高潮基础上实现的，社会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劳动力、人口出现“非集中化”趋势，向郊外、中小城市回流。

(2)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劳动力的流转速度。如果仅从劳动力变化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过程又表现为第一产业释放劳动力的过程和第二、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过程。

首先考察第一产业劳动力的释放速度。根据收集到的美国、德国、挪威、瑞典、丹麦、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等12个国家在各自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42个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数据，以最小二乘法得回归方程：

$$Y = -1.86P + 982.30 \quad \text{相关系数} \\ = -0.884$$

(其中Y为年份，P为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

就劳动力比例P对回归方程求导，得出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的变化速度率($Y'P$)为：

$$Y'P = -1.86$$

由此得知，12个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每下降1%，需要时间约1.86年。

其次分析经济水平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看下表：

表1 各产业劳动力在总劳动中的比例

单位: 1958年美元

产业	人均 GDP	变动差	人均 GDP	变动差	人均 GDP	变动差	人均 GDP	变动差	人均 GDP
	70~150 (1)	(2) = (3) - (1)	150~300 (3)	(4) = (5) - (3)	300~500 (5)	(6) = (7) - (5)	500~1000 (7)	(8) = (9) - (7)	1000 + (9)
第一产业	69.4%	9.8	59.6%	21.8	37.8%	17.4	20.4%	8.8	11.6%
第二产业	13.9%	6.2	20.1%	10.1	30.2%	13.9	44.1%	4.0	48.1%
第三产业	16.7%	3.6	20.3%	11.7	32.0%	3.6	35.6%	4.7	40.3%
变动差积值	19.6	43.6	35.2	17.5

资料来源: 联合国《1964年人口统计年鉴》,《1960年国民帐户统计年鉴》。

从变动差的积值来看, 人均GDP为150~1000美元(以1958年美元计)时各产业劳动力分布变化最快, 变动差的积值为43.6和35.2个百分点, 说明这一经济水平下是劳动力转移最活跃期。到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时, 劳动力的各部门转化才

逐渐缓慢下来。此时三个产业劳动力的分布比例基本是2:4:3。

再看第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从能反映二、三产业内部情况的表2来看, 可以发现二、三产业内部各行业间吸收能力十分不同(见表2)。

表2 第二、第三产业主要部门劳动力在总劳动中的比例 单位: 1985年美元

产业	人均 GDP	变动差	人均 GDP	变动差	人均 GDP	变动差	人均 GDP	变动差	人均 GDP	
	70~150 (1)	(2) = (3) - (1)	150~300 (3)	(4) = (5) - (3)	300~500 (5)	(6) = (7) - (5)	500~1000 (7)	(8) = (9) - (7)	1000 + (9)	
第二产业	矿业采掘业	1.1%	0	1.1%	0.1	1.2%	0	1.2%	-0.2	1.0%
	制造业	7.5%	4.1	11.6%	5.8	17.4%	0.4	26.8%	2.3	29.1%
	建筑业	2.4%	1.5	3.9%	2.1	6.0%	2.4	8.4%	0.1	8.5%
	电、煤气、水 运输、仓储	0.4%	0	0.4%	0.5	0.9%	0.2	1.1%	0.3	1.4%
	通讯	2.5%	0.6	3.1%	1.6	4.7%	2.0	6.7%	0.6	7.3%
第三产业	商业	6.8%	0.6	7.4%	4.4	11.8%	2.3	14.1%	3.7	17.8%
	服务业	5.8%	7.1	12.9%	7.3	20.2%	1.3	21.5%	1.0	22.5%

资料来源同表1。

如果把人均GDP70~500美元称为发展早期,那么这一时期吸收劳动力的速度从快到慢的行业依次为:服务业、制造业、商业(在人均GDP达到150美元之后)、建筑业、运输、仓储、通讯、电、煤气、水、矿业、采掘业。总的来看,在经济发展早期,受资源制约度大的、技术装备水平较高的行业,劳动力流入的程度较低;而利用人力资源较多的行业则是社会劳动力的主要流入领域。在人均GDP达到500美元以后,吸收劳动力速度从快到慢的行业依次为:制造业、商业、运输、仓储、通讯业、建筑业(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服务业、电、煤气、水业、矿业、采掘业。在这一时期,劳动力主要流向与商品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流通、信息部门。建筑业开始尚能较多地吸收劳动力,但到了人均GDP1000美元之后,吸收能力开始走下坡路,而提供基础原材料的行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则处于萎缩状态,这一现象一方面是高机械化带来的;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发达国家主要依靠从不发达国家进口原材料。从而使本国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数绝对减少所致。^①

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以1965年美元计,我国1980年的人均GDP只有120美元左右,低于以同样价格计算的12个发达国家发端期人均GDP366.6美元的水平,只略高于日本和瑞典当时的数字。所以,我国是一个现代经济增长起始点低,发端期迟的国家,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不仅要遵守“人口的增长速度不能高于GNP的增长速度”这一戒律,同时还必须把二个增大率间的差距拉得更大些,才能保证经济有足够的余力向前发展。

(二)

回顾建国以来,我国曾有过4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加速期:1956~1958年,1970~1972年,1976~1978年,1983~1985年。

1956~1958年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最快的时期。1956年非农产业劳动力比上年猛增了19.6%,1958年又比1957年猛增了149%,3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43.7%。同期,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5年的18592万人骤降至15490万人,下降了20%,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由1955年的83.3%降至1958年的58.2%。

1970~1972年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第2个加速时期。1970年非农产业劳动力比上年增长了8.4%,1971年比上年增长了7.5%,1972年又比上年增长了4.8%,3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为6.9%,同期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由1969年的81.6%下降到1972年的78.9%。

1976~1978年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3个加速时期,这一时期中非农产业劳动力共增加了3067万人,农业劳动力则减少了1083万人。三年中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增长率平均为10.3%,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下降了6.5个百分点。

1983年~1985年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4个加速时期。这三年非农产业劳动力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1%,非农劳动力就业比重由31.7%上升到37.5%,而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则由68.3%下降到62.5%。^②

由于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崛起,从1978年到1986年,农村非农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共达4400万人,由此使农业劳动

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73.8%下降到61.1%，9年间下降了12.7个百分点，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其中乡镇企业1978~1984年平均年吸收农村劳动力140万人，1984~1986年吸纳近2000万人。但是从1987年开始，乡镇企业发展失去了上场势头，因而1988年乡镇企业由上年吸收800万左右降至650万，到1989年则进一步下滑，吸收的从业人员减少到只有350万了。大部分被精简人员不得不涌入流动大军。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通过农村积累发展城市重工业的道路，重工业的规模依靠农业资金积累程度而扩张。但在生产循环方面又脱离农业自我发展的，这种发展方式，虽然重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但它的扶摇直上并没有强有力地促进和装备农业，尤其是没有相应地带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更没有实现象发达国家一样工业文明的发展摧拉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兴盛。^③1987年我国工业产值所占总比重高达72.2%，却只容纳了劳动力26.2%，农业产值虽只占27.8%，占用劳动力的比重高达73.8%。

值得注意的是，已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仍与农业保持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即采取“务农求稳，务商务工求富”稳一块活一块的兼业化经营，用一条腿踏进二、三产业。这种转移的不彻底性，严重限制了产业分工的大气候形成，将使农村长期陷入小规模，非专业化和低效率的困境中徘徊不前。

我国40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直是在一种大起大落的情况下实现的。当短期内大量农业劳力突发性地转出农业后，

现代生产要素的加入滞后于剩余劳力转移，加之管理机制不完善，结果短期内农业产业水平的下降和徘徊就不可避免。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下降又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收缩和下降。对此，我们务必引起高度警觉，寻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相协调的新思路。

（三）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思想宜确立为：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以协调的城乡利益机制为基础，建立要素的合理流动体系；优化城乡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全方位拓展就业门路；通过城乡互补、内外分流，实现劳动力流动的良性循环。

具体实施方略与途径：

——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把工业发展从牺牲农业型转轨到工农共同发展型，建立协调的城乡利益机制。一是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建立合理的工农产品价格，改变初次分配机制。可以分二步走：第一步，继续改变现有农产品市场格局，缩小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部分的比例。特别是要缩小国家定价部分的比例，扩大市场调节部分的比例。国家定价和指导价部分的价格要继续提高，并反映成本和供求状况的变化，使这两部分的价格向市场价逼近。第二步，从根本上转换国家干预农产品市场的目的和方式，把现在以压低工业品成本，保护消费者利益为目的的干预转到以保护农业发展，维护生产者利益为目的的干预上来，把非经济手段为主的干预机制转到用经济手段为主的干预机制上来。二是增加国家对农村投资，改变农业

资本存量过低状况，同时引导农民增加投资意识，改变再分配机制。三是改变脱离效率原则用行政手段在城乡间进行资源分配的体制，使资源的分配建立在公平竞争和效率的基础上。四是鼓励农民在国家统筹计划内离土离乡，提高农村人均资本占有量。

——遵循产业发展规律，适当压缩工业的发展，调整工业的资金存量结构，压缩工业的无效增长速度，腾出一定资金和其它要素加快农业的发展，使工农结构逐步趋于协调，争取工业年增长率9—12%，农业年增长率3—5%，发展速度之比控制在3：1为宜。

——调整政府的投资结构，逐步把工农投资比例稳定在4：1左右，确保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不低于国家基建总投资的10%。在近中期，政府投资农村，应主要安排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于农业基础和农业开发。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始水利、电力、道路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开发荒山、荒坡、丘陵、荒滩、荒水和庭院经济，发展大农业的各个产业，使农业向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消化一部分劳动力。二是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农村非农产业。以家庭经济为生长点，鼓励户办、联户办、村办、乡办，几个轮子一齐转的方式，因地制宜，实现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或数品，群体连片发展，形成专业生产加工的农村工业区，同时相应建立各种类型的专业市场，使广大农民进入非农产业，这可吸收一大批农村劳动力。三是投资于农村的公共服务事业，如学校、医院、娱乐场所、服务中心等，这既可直接吸收一部分劳动力，又可造福于民。

——制定引导农业人口流动的宏观政策，统筹安排，调节城乡劳动力供给。

(1) 农业人口有自由流动、自由择业的基本权力，在政策范围内流动，国家应给转至非农产业农民社会身份以合于情理的认定。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要以适应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商品经济发展为出发点，按照从业内容、定居时间以及本人的意愿给予合法认定，使之享受与其他非农业人们同等的社会权力和利益。(2) 制定《劳动工资法》，保障农业人口在实行新的岗位就业后的基本生活水准和劳动收入。(3) 对城市实行强制性计划就业政策，尽快解决有的人没活干，有的活没人干的局面。对因工种选择不接受政府就业计划者可在一定年限内不予考虑就业安排。城市招收长期性合同工也应有相应的计划约束。(4) 制定合理的农业用地政策，农业流动人口的土地资源应随人口流动而流转，促进土地集中，促进农业专业化生产。

——城乡互补，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城乡互补主要是指先进的城市文明向农村传播，对农村实行精神与意识的输入和改造；城市生产力向农村辐射，使农业人口、农村资源及农村产业合理配置，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加强市场交流，使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工农产品双向流通中实现就业转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在稳定农业发展的同时，应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协调一致，既要在农村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促使大量的剩余劳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又应逐步使农村的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和转移劳力向在农村发展或新建的城镇集聚，使农业转移劳力转变

为市民。

——内外分流，积极开拓劳务国际输出门路。“内外分流”即指通过国内吸纳和国外输出双向分流劳动力剩余量，缓解就业压力。近中期宜以国内吸纳为主，国外输出为辅，长期则宜以国外输出为主，国内吸纳为辅。

——努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人口就业素质。为了提高农村人口流动后就业的多向选择能力，同时避免人口流动后农业受到冲击和削弱，应围绕以下目标抓好农村教育：（1）普及农村初级教育，有能力的农村应普及中级教育；（2）优

先培养农村“乡土人才”；（3）因地制宜地创办好各行各业的农民专业学校。

- ① 见徐雅：《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起飞期人口运动规律比较研究》，《经济科学》1989年第3期。
- ② 见郭庆：《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改革》1990年第3期；
- ③ 见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课题组：《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及发展情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1989年第7期。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阳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责任编辑：谭湛明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六大制约因素

王 敏

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批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然而，事实上，我国广大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流动转移相当困难。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

一是历史传统文化的积淀。

我国以小农耕作为主要经济特征的社会制度的长期延续，在国民中积淀着两种民族文化心理：一是对土地的高度依恋，农民不愿轻易离开耕地，放弃耕地。不仅古代游牧民、传统手工业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后不完全放弃土地，就是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也不轻易放弃土地，他们

一旦有了资本还要积极投资到农村购买土地，经营一定数量的土地。二是农民对主动或被迫弃地离乡从事二、三产业有一种自卑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害怕失去土地，很不情愿弃地离乡从事二、三产业，即使离农离乡的农民，也不愿放弃原来经营的耕地。两种传统文化心理积淀，构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的巨大心理屏障。

二是土地、农村劳动力的逆向流动转移机制。

土地逐步向种田大户流动集中，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以及农村劳动

力逐步放弃土地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我国历史上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却在“均贫富”的政治口号召唤下，反土地兼并集中；“杀富济贫”，往往伴随着大批城乡工商业主失去土地和财产而倒闭破产，使已经流转到城乡二、三产业就业的大批农村劳动力被迫重新返回农村进行“均田”。历史上这种逆向土地制度和就业制度变迁的重复，形成了反土地兼并集中，反城乡二、三产业发展，反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移转的强大抗衡机制。这是中国农耕社会源远流长，中国民族工商业十分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十年前从我国贫瘠农村开始，以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为目的，把耕地、山林、牲畜、草场等农村生产资料按人口平均分包到户的“均包制”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转移的问题，而实际上起着抵制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作用。这既使农村劳动力难以获得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的物质基础和应有的动力、压力与机会，也不利于鼓励已经流动转移到城乡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及时放弃原来占有的农村生产资料使用权，实现根本性转移。

三是先天理论缺陷和后天理论误导。

我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经济占主导地位，目前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趋向还不明显，这种实践上的欠缺，影响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而理论上欠缺，又进一步障碍了我国商品经济发展

和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们错误地照搬外国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存在，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下劳动者劳动能力商品化的客观存在，否认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使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存在，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才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践才刚刚开始，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商品买卖交换关系该如何把握及其与作为国家或社会的主人的身份相矛盾现象该如何处理等等，还没有搞清，对商品经济本质特征的认识还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一般认识上，这势必影响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的转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流动的实践，切望尽早清除这些理论障碍，实现理论突破和创新，用科学、正确的理论，指导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

四是扭曲的产业结构与国民经济结构。

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民族工业十分薄弱，又缺乏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加之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孤立封锁，为了生存发展，国家只得牺牲农业利益，放弃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打算，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子，建立起保证重工业畸型超前发展的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50年

代末、60年代、70年代，世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进行了几次重大调整，按理，我国完全可能借助这些难得的机会，把建国初期形成的偏重工业型的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结构逐步调整过来。遗憾的是我们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次、二次、再次错过了这些良好的机会。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推动下，国内，人整人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人际关系紧张，人们无暇顾及周围世界发生着的巨大变化。国际，意识形态的论战、分歧，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国家日益陷入自我孤立封闭的困境。国际政治意识形态论战，国际关系紧张，导致战争空气升级，为了“准备打仗”，又不得不进一步强化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国防重工业的发展和建设。结果，使得本来就已经扭曲、畸型发展的国民经济结构更加畸型、扭曲，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更加难于调整矫治。重工业超前发展和农业、轻工业发展滞后，从客观上形成一道高墙，阻碍或制约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

五是封闭落后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

与国民经济畸型扭曲发展相对应，我国形成了一整套奇特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这套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通过户籍制度，严格控制并决定城乡的社会再分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社会身份制度。严格控制的户籍制度造成我国城乡从产业到人口更加隔绝和封闭，它不仅对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正常合理的流动转移构成巨大障碍，而且对城镇劳动力正常合理的部门间流动

转移也构成巨大障碍。由于我国城市居民社会福利保障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很大，占城镇户籍居民家庭生活中的比重也很大，凭城市户口就可获得的诸多优惠特权，吸引着许多即使无城镇就业机会和条件的非城市户籍人口，也想千方百计挤入城镇户籍行列。结果，招致城市户籍人口数量恶性膨胀，国家负担无限加大。每当城镇人口负担过重时，国家就采取多种措施，强制性地压缩疏散城市人口到农村，同时进一步严格控制城镇户籍人口，在产业结构失调的高墙之外，再筑一道户籍制度的高墙，来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的流动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使封闭落后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在整个旧体制下，几十年形成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社会身份制度等等仍然严重地障碍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

六是日益增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

旧中国，农耕社会、战乱、小农经济、贫困落后四位一体，从国家宏观到家庭微观，都存在着一种强烈刺激人口盲目增长的机制。劳动体力型和频繁的民族战争冲突，使人口多少成为劳动力强弱、财富多少、民族兴衰以及战斗力强弱、战争胜负的主要标志。只有疾病、饥饿和战死等人口非正常死亡，才是控制减少人口增长的唯一有效办法。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存发展欲望，给新中国诞生奠定了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在人口政策上的长期失误，人口增长失控，过快的人口增长，使国家不得不拿出大量

的国民收入用于赡养人口,减少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投资。相当部份地区长期陷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越穷越愚,越愚越穷;越垦(荒)越穷,越穷越垦,三个互为因果的经济社会恶性循环发展之中。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与大量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农业密切相关。城乡过快的人口增长和就业压力,严重地阻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

面对着严重的困难与严峻的现实,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成长,有必要对我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形成一种全新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对流动的障碍因素的科学分析,研究和制定相应的措施与对策,加快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流动转移的步伐。

作者单位:云南省楚雄州政府经济研究室
责任编辑:郑英隆

广东所有制结构目标模式 与产业产权政策设计

郑炎潮 刘文通

(一)现状与趋势

八十年代广东的改革成果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在坚持和发展公有制主体的前提下,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格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公私合营经济、中外合作合营经济并存的多元混合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正在形成和发展。

(1)广东现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较80年代初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0年,广东的工业总产值为217.21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为147.92亿元,占68%;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为64.79亿元,占29.8%。1980年,全省社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总网点和总人数分别为144,152个和630,151人,其中,国营网点及人员分别为17488个和222497人,占总数比例分别为12%和35.3%;供销合作社为18,923个和116,611

人,占总数比例为13%和18.5%;其他集体所有制为36,350个和196,782人,占总数比例为25.2%和31.2%;合营为31个和506人,占总数比例为0.02%和0.08%;个体为71,380个和93,755人,占总数比例分别为49.5%和14.9%。1989年,工业总产值为1018.81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为458.82亿元,占45%;集体所有制工业为349.41亿元,占34.3%;个体、私营、合作、合营、独资等其他经济成份为210.58亿元,占20.7%。1989年,全省社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总网点及总人员分别为7,765,771个和2,263,396人,其中国营网点及人员分别为33,222个和476,994人,占总数比例分别为4.2%和21%;供销合作社为34,510个和156,288人,占总数比例为4.5%和6.9%;其他集体所有制为66,014个和495,640人,占总数比例分别为8.5%和21.9%;

合营为1,166个和96,337人,占总数比例分别为0.15%和4.25%;个体为638,473个和1,033,516人,总数比例分别为82%和45%。

(2)广东省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在80年代和90年代呈现以下大趋势:国营经济的产值总量继续增长,但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减少,正在由主体地位逐渐变成主导地位;集体(合作)经济的产值总量迅速增长;“三资”企业从无到有,处于大发展之中;个体经济恢复发展,迅速扩大,其中相当一部份已发展和将进一步发展为规模较大的私营经济;股份制企业虽然处于试点阶段,但一个股份热潮正在兴起,股份化将成为90年代中后期的主要趋势之一;跨国所有制经济(跨国公司)正在萌芽发展中;投资主体已由国家主体变为和将进一步变为国家、集体、个体、外商的多元主体;产权交易市场已开始形成,一个产权证券化、市场化的趋势已涌现。具体分析如下:

a) 国营经济将由主体逐渐变成主导。国营企业总产值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例,1980年为68%,1985年为59.89%,1989年为45%。国营企业在全省社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和人员中占的比例,1980年为12%和35.3%;1985年为3.8%和20.46%;1988年为3.7%和20.1%。

b) 集体经济在工业中将逐渐变成主体。集体企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例,1980年约29.8%,1985年为34.85%,1988年为36.76%。在珠江三角洲,1988年已上升至60%以上。以中山市为例,中山市集体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1980年为40%左右,1987年就上升为68.37%。

c) 在社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和人员中,公有制企业已由主体变成主导,其他经济成份已经和将要变成主体。公有制企业在全省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和人员中的比例,1980年为50.2%和79%,1985年为17.2%和53%,1988年为14.6%和45.9%;其他非公有制的比例,1980年为49.5%和14.9%,1985年为82.6%和43.75%,1988年为82%和45%。

d) 合资、合作、独资的“三资”企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全省(不含海南,下同)三资企业,1981年共59家,投资总额7781万元人民币,其中合资企业15家,投资总额3735万元,合作企业43家,投资总额3546万元,独资企业1家,投

资总额500万元;1987年共4929家,投资总额3,562,946万元,其中合资企业1809家,投资总额2,217,904万元,合作企业2976家,投资总额1,185,895.6万元,独资企业144家,投资总额159,146.7万元;1989年共9508家,投资总额6884435万元,其中合资企业4496家,投资总额3901382万元,合作企业4479家,投资总额2,477,037万元,独资企业533家,投资总额506,016万元。

e) 个体经济恢复发展,迅速扩大。其中相当一部份已发展和将进一步发展为规模较大的私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广东省城乡个体工商业,1980年只有102,489家,从业人员数125,028人(占全省人口0.2%),营业额13,650.6万元;1985年发展至646,647家,从业人员923,189人(占全省人口1.6%),营业额488,306.7万元;1988年为949,246家,从业人员1,519,523人(占全省人口2.6%),营业额1,159,718万元。自1988年颁布《私营企业法》以来,有相当一部份个体户转为私营企业。1989年,广东省私营企业总数为16,226家,职工206,223人。其中,独资企业7,135家、职工86,692人;合伙企业7,940家、职工97,866人;有限责任公司13家、职工16人。其中,城镇私营企业7,732户、职工16543人;农村私营企业8,494家、职工106,447。此外,相当一部份符合私营企业条件的个体、集体企业仍未转为私营企业。

f) 股份制经济将从试点阶段转向推广阶段。80年代,随着广东的对外开放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省各地、尤其是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各行各业实践中已产生和发展着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并且各地政府都在进行股份制试点。深圳特区的农村60%以上的乡镇企业都已经和准备实行股份制。深圳市已有近100家企业推行股份制,并已有5家企业的股票正式上市。深圳的股票热潮已推向广州,并进一步向全省扩展。股份制由试点转向推广,这是广东九十年代的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又一趋势。

g) 与上述股份化趋势相适应,一个产权交易证券化、市场化趋势又将深刻地影响着广东90年代的产权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近年,广东省的深圳市与广州市都已立了证券公司及证券交易所。深圳已有三家证券公司:深圳证券公司、中行信托公司、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共发行股

票总额约为5亿元。深圳证券交易(债券、股票)日交易量1990年已达百万元。广州市已有大小经营证券的机构30家,1987年全年交易量为37.44万元,1988年为359.77万元,1989年为9590.77万元,而1990年上半年就突破10,000万元。债券、股票除了在交易机构公开交易外,民间交易也大量进行着。产权已从政府单元主体向着政府、企业、居民、外商多元主体过渡,并且,各种产权主体进行着公开的、平等的、合法的产权交易和产权转让。

80年代广东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预示,到2000年将会有更深刻的变化。对本世纪末广东所有制结构目标模式和产业产权政策,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创造新的理论,进行相应的预测和设计,以适应广东全面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

(二) 所有制结构目标模式

广东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广东走了一条公私混合的,多元体制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到2000年,这条新型的道路,将使广东走向更富裕、更繁荣。

(1) 在未来十多年里广东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新理论模式是:公私混合结构模式。这种理论模式不是西方的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结构,而是具有中国和广东特色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长期并存、互相渗透的新型混合结构。

这种新理论模式的特征如下:第一,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不是你消灭我、我消灭你的完全对立关系,而是长期并存、互补长短、互相促进的协调统一关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当代开放型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与私有制都是发展生产力的两个主体,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而应将两者统一起来。第二,无论是公有制经济系统还是私有制经济系统,都是开放的经济系统,因而两者相互渗透,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公私混合。这种公私混合,形成公私统一,以公为主的新社会经济结构。第三,公有制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经济。这种新型公有制经济将朝两个方向重组:其一,形成一种多层次、多元化的新型公有制模式;其二,将公有制与股份制有机结合,重组新型公有制——股份公有制。股份公有制的含义主要是指各级政府(中央、省、市、

县、镇)、企业集体、职工个人共同投资,以股东身份构成公有制的主体结构。第四,这种公私混合结构的主要组织形式是股份所有制。股份所有制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使构成社会的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各种团体、社会家庭及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购买股票。将各类公股、私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又通过证券交易所,让各类公股、私股自由交易,相互替代。

(2) 以这种新理论模式为指导,结合广东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可将2000年广东的所有制结构目标模式分为总目标模式和具体目标模式,其预测和设计如下:

a) 总目标模式。以政府经济为主导,以股份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公私混合经济长期并存、协调发展和形成财产社会化、多元化的混合经济结构。到本世纪末,广东各种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将是:政府(包括各级政府)经济占25%左右;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占45%左右;个体、私营经济占10%左右;合作、合资、独资“三资”经济占20%左右。

以政府经济为主导,首先要将传统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国营经济改为政府经济,即通过产权改革将其分解为中央政府经济和省、市、县、镇政府经济,这主要指社会性的公共经济。其实,就是要大大减少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它主要用于非竞争性的公共设施、大型骨干企业以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使其由现在的主体作用变成主导作用——即使其在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例从1989年的45%减少到2000年的20%左右。

以股份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就是要大力发展股份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尤其是要大力发展政府、企业、职工共有的股份公有制经济,使其成为新型的公有制经济,并逐渐与集体经济一起成为国民经济主体——即使它们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89年的35%左右上升至55%左右。

财产社会化,就是让组成社会系统的各级政府、各类大中小企业、各种社会团体、所有的家庭、个人都能平等地成为财产所有者,共同拥有社会财产。

多元混合结构,就是让政府、集体、股份、合作、中外合资、中外合营、外资独资、私营、

个体等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企业都成为独立的自由企业，以平等的地位存在、竞争、发展。

(b) 产业结构目标模式。第一产业(农业、种养殖业)以股份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导，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为主体，以私营经济和“三资”经济为辅助。在本世纪末，各种经济成份的比例约为：股份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占25%，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占60%，私营和“三资”经济占15%。第二产业(工业)，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以国营经济为主体，以股份公有制经济，集体经济和“三资”经济为辅助。在本世纪末，其比重约是：国营经济占60%，其他占40%；轻工业和加工工业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以股份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三资”经济和私营经济为辅助、补充。在本世纪末，其比重约是：政府经济占15%，股份公有制和集体经济占60%，“三资”经济和私营经济占25%。第三产业，包括金融、邮电、航空、航海、铁路运输业以国营经济为主体，股份公有制经济和“三资”经济为辅助；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为主导，以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经济为主体。到本世纪末，其比重大概是：国营、股份、集体经济占30%，个体、私营和“三资”经济占70%。

上述的所有制结构总体目标模式和具体目标模式，都是一种预测性的设想。经济结构尤其是产权结构将会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而发生人们难以预测的变化，所以，不应该将设计的模式一成不变地指导实践，相反，应随实践的变化不断地修改设计的模式，以使其更接近现实，更符合实际。我们还必须设计出使这种目标模式具体实施可行的产业产权政策。

(三) 产业产权政策

产业产权模糊，产业产权改革滞后，是广东80年代改革存在的最大问题。这已严重地障碍着广东的市场改革、企业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和整个综合改革试验。为此，90年代，广东的综合改革试验应将产权改革、明确产权作为最主要的问题，制订出合理的产业产权政策。

(1) 产业产权政策设计的理论依据。产权是所有制具体化过程的法律反映，是从法律上反映所有制关系，因而它是以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言的所有制关系的硬件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之

所以长期存在着财政预算软约束，近几年之所以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我国的企业以及劳动者之所以对经营好坏以致盈利、亏损没有具体的法律责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缺乏科学合理的产权理论与产权政策。为了从根本上治理这弊病，广东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必须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产权理论，新型的公有产权理论和私有产权理论，以作为产业产权改革和产业产权改革设计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产权应当是多元化、法人化的。社会主义产权的多元化主要是产权主体多元化。传统的社会主义产权之所以模糊就在于产权主体模糊、产权主体单一，将社会主义产权统称为全民财产或集体财产。以全民财产的代表国家为主体，这种传统的产权理论已不适合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90年代，广东应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化、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县政府、镇政府、乡、村、街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社会团体、个人、外商等多元主体。这些产权主体都以平等的自然人和法人身份拥有社会财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任何产权主体不得任意侵占或非法占有其他产权主体的财产，否则，应受到法律制裁。各个产权主体的产权转让，必须是自愿的、合法的。

(2) 产权的界定。我们对财产社会化、多元化的产权主体确定以后，必须对各产权主体的产权进行重新界定，这是90年代广东产业产权改革的重要内容。产权的界定就是财产权利在法律上归属的规定，它使某一主体拥有一系列有限制性活动的权利。产权界定，既是从产权模糊转向产权清晰的重要前提，也是企业实行股份制的重要前提。产权界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a) 各级政府产权界定。政府产权由中央政府(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县政府、镇政府共同构成，各自拥有法律保证的产权。应将现有的全民所有制产权(国营和地方国营)界定为中央政府产权、省政府产权、市政府产权、区政府产权、县政府产权、镇政府产权。各级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和各级政府的税利留成都应构成各级政府的财产，并相应成立政府资产管理机构或公共资产管理机构。应将原有国营企业(包括地方国营)产权相应地转变为各级政府企业产权，如果是各级政府产权共存的企

业，将其改为各级股份所有制企业。各级政府共同投资办的企业，应以股份制来组织企业，使各级政府以股东身份出现来参与企业的投资、管理、分配。

b) 国营企业的产权界定。国营企业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企业产权界定，而其中最难的又是承认不承认企业拥有财产产权。毫无疑问，国营企业初建时，其投资都是或者基本上是国家（政府）的，所以，其原始产权是国家（政府）的。但是，实行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等项改革以来，企业一般或多或少地形成自有资金，故中央有关文件规定，这部分自有资金从1988年起实行分帐管理，以区别于原有资产。应当指出，如果根据企业的利润是企业劳动者创造这一原理，企业职工集体应对企业自留资金拥有一部分所有权。所以，对国营企业产权界定时，应将其产权起码划分为中央政府产权、各级地方政府产权和企业职工集体产权。对企业职工集体产权，又可以再进行界定：其一，作为生产发展基金、公积金、公益金的产权应界定为企业职工集体所有。其二，作为职工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或积累基金的，可按职工的年岁、工龄、职务等具体划到职工份上，作为职工个人产权。

c) 集体企业的产权界定。现有的集体企业无非是以下几类：其一，是二轻系统的大集体企业；其二，是区、街道集体企业；其三，是镇、乡、村集体企业；其四，是劳动者的集体企业。前三种，都不同情况地存在严重的产权不清，也就是说，将主管部门（二轻局）、区街、镇政府与企业职工集体的产权混在一起。在产权改革和产权界定中，同样要对集体企业的产权进行界定，主要是将主管部门、区街、镇政府的产权与企业职工集体的产权逐渐地区分开来。

d) 股份制企业的股权界定。可以讲，将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产权进行界定的目的，是为了将大多数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逐渐地转变为各

类不同形式的股份制公司（企业），尤其是要创造一种新型的股份公有制公司（企业）。我们将要建立的股份公有制公司（企业）起码有四类：第一类，股份有限公司，可将两个以上的公有主体产权（如中央政府产权、各级地方政府产权、企业集体产权）转为股份股权出资组织，对公司债务负连带和无限责任。第二类，股份两合公司，将几个公有主体产权转化为无限责任股份股东，再将公司部分产权转化为有限责任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有限责任）。第三类，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将企业各主体产权转化为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不在市场上转让的股份产权。第四类，股份有限公司，将现有的国营和集体企业产权全部划分为股份股权。从社会的广泛领域进行集资，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发行和转让股票。“八·五”期间，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改为股份公有制（企业）公司，主要是先改为前三种公司，其中，又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

(3) 产业产权交易与调整。当我们对产权主体确定、产权界定后，便可以进行产权证券化和产业产权的交易调整。政府的投资主要是进行基础工业、重化工业、重点工程的建设。所以，这些行业的产权应主要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这些行业的企业，主要由各级政府投资和经营管理，或者各级政府的产权或股权要维持控股、控权的地位和作用。政府没有必要对大量的轻纺工业、加工工业、机械工业进行直接的经营管理和控股，所以，应将政府在这些行业企业的产权，先证券化，通过租赁、拍卖、转股等方式转让出去，收回资金，投入基础工业、重化工业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并逐渐让这些行业企业的产权主要掌握在企业、职工、集体手中，变政府产权主体为企业和职工居民产权主体。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黄振荣

略论发展集团化骨干企业对市级经济成长的意义

崔 河

经过10余年的改革开放，广东经济已经初步走过了启动阶段，完成了中央所要求的第一个翻番的任务。同时，广东各市经济也发展很快，广东中南沿海市级经济基本上已走过了启动期，开始进入持续、稳定发展期。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对企业组织方式和运作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90年代开始萌发的企业集团化。对市级经济来说，一批集团式的骨干企业的崛起，很可能将是进一步促进市级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

企业集团的兴起，反映了我国的企业经济由单一的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和规模效益方向发展。企业集团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联合体。它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它是多元化所有制相互渗透的复合体。企业集团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合资合作企业、股份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多元化的经济结构。

第二，它是具有辐射力和凝聚力的有机联合体。企业集团一般都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主体，名、优、特产品为龙头，发挥集团的优势，增强集团内部的联系，促进了规模的合理性。

第三，它是大跨度、多层次的网状组合体。参加集团的企业一般都是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由核心企业、基本企业、卫星企业、协作企业四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的核心成员失去自身的法人资格，改变原来的行政隶属关系，在资金、经营、管理、技术、劳动等方面实行统负盈亏形成紧密型；第二层次的基本企业是联合投资，联合经营共有的财产，在联合经营的业务范围承担责任，形成半紧密型。第三、四层次的卫星企业和协作企业，不改变它原来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利税渠道，形成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控制与控股关系，构成环状结构与系列结构呈现松散型。

第四，它是具有多功能的综合体。企业集团在生产科研、技术开发、资金运用、内外贸易等方面具有多元化的综合功能，比一般经济联合体有更强的产品开发能力和网络服务能力。

第五，其执行“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各企业成员都有自主权，享有经济权利，承担经济责任，实行责权利相结合。

第六，它是多角化经营、竞争力强的共同体。企业集团一般都是由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产供销经营实行一体化，产品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从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和形成过程来考察，大致分三种类型：一是以骨干企业为依托，以名优拳头产品为龙头，不断向外辐射，联合扩张，形成多层次配套网络的单体辐射型企业集团；二是由同行业若干个产供销有关联的企业组成主体，逐步扩大合作面发展而成的行业组合型企业集团；三是以工业产业为主，与相关的商业、科研单位联合，实行多角化经营的产业混合型企业集团。以清远市纺织工业总公司为例，它是属于第二类型的企业集团，于1988年成立，3年来由一片空地，通过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发展为有十余家产、销企业联合的集团化企业雏形，1989年实现产值1167万元，实现利润230万元；1990年实现产值2800多万元，比1989年增长231%。其中棉纱、牛仔布、青年布、灯芯绒、针织布等产品的产量、质量、消耗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初步显示了集团公司的强大生命力。

清远市纺织工业总公司的实践已初步显示，组建企业集团对进一步促进市级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利于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优化企业结构，变个别优势为群体优势，发挥企业规模效应。企业集团建立后，大都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原则，重新调整生产布局，优化组合工艺流程，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清远市纺织工业集团公司于

1988年将原来的四间分散的企业裁并、改组，成立集团公司后，集“船小好掉头，船大能冲浪”的优势于一身，统一计划、统一调度，实行纺纱、织布、针织、印染、制衣一条龙的生产体制，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在1990年全国市场疲软、产品积压、纺织工业全国大滑坡的情况下，该集团公司全年实现产值2800万元，比1989年增长231%。

——有利于促进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增加社会有效供给。盲目布点，重复建设，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是纺织工业生产上存在的突出问题。纺织工业的特点，就是内部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关系。如纺纱、织布、印染、制衣是环环紧扣，相互依存的，各自是上工序的用户，又为下工序服务，如按以往的体制，独立经营、各自为战，就会使企业的品种、质量都得不到保证，从而使效益大受影响。清远市成立纺织集团公司后，使纺、织、印染、成衣配套成龙，增加了市场供给，走出了一条渐进式的平稳改组产业、产品结构的路子，并收到“投资少、产出多、见效快”的效果。

——有利于统筹资金，引进技术设备，加快企业技术进步。企业集团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较易赢得外商和金融等部门的信赖，较为顺利地引进资金和技术设备；对内实行资金融通，集中优势的资金、技术力量联合攻关，大大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清远市纺织集团在短短的二三年间，筹集了2000多万元流动资金，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

——企业集团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和抗风险能力，使产品销售取得最优成果。在市场疲软，产品大量积压、售价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清远市纺织公司依靠企业集团的力量，在深圳建立了办事处，在香港成立了公司，广泛收集信息，挖掘新的销售渠道，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按国际市场需要组织生产，提高了企业的应变能力，扩大了市场占有率。通过香港公司，直接把产品销往国外，使产品的销价普遍提高了5%~10%，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有利于合理安排使用各种人力，便于集中人力、物力搞销售攻关、技术攻关，创名优特产品，增强企业本身的造血功能和发展后劲。公司处于发展时期，各方面的人才都十分缺乏，由

于集团内部对现有的技术管理、经营人才实行统一调配，统一指挥，使公司的经营处于最佳的运动状态。集团下属企业基本做到“保证供应不断流，促进销售不积压”。尤其是1990年下半年，产量、销售额大幅度增长，货款及时回笼。发挥了单个企业发挥不了的作用，显示了集团公司的威力。

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传统管理体制仍在起作用，一个好的经济环境尚待形成。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组织的企业集团，在它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企业集团是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以骨干企业为主体组成的经济实体。因此，发展和巩固企业集团，实质上是增强骨干企业的向心力和辐射力的问题。为此，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1. 骨干企业要注意发展有广阔市场的龙头产品，这是增强向心力的关键。因为各种形式的联合，最终表现为产品的联合，这是联合的基础和前提。产品决定着联合的深度和牢度，产品既是联合的出发点，也是联合的落脚点，产品是企业的生命，同时又是效益的载体。企业集团的规模大小，有无发展前途，都取决于产品，取决于“龙头”产品。因此，集团企业必须实行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合理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2. 成员单位要以诚相待，并要扶上马，送一程。成员单位参加企业集团，目的就是要获得经济效益，希望背靠名优产品，有发展前途。骨干企业就要以诚相待，帮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这是增强向心力的重要手段。

3. 要确立平等互利，风险共担的精神。

集团的性质规定成员各方都是法人。都是平等地位的伙伴关系。大厂不能以大欺小，小厂也不能以小赖大。办事要相互协商相互尊重。其次是利益要均占。如果平等不互利，是抽象的平等。必要时，为了集团整体利益，还要相互让利，互助互谅，不能互相争利，只有这样，企业集团才能维护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4. 逐步建立和完善集团内部的管理体制。企业集团是一个整体，需要有一套统一的管理机制来协调相互的经济行为和经营策略。要参照国际惯例，结合本企业集团的具体情况，建立与企业集团相适应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1) 企业集团要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

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生产发展需要，按照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生产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提高集团一体化的运行能力，逐步建立和健全集团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加快集团发展建设。

(2) 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进行企业资产划转，并辅之以股权转换、兼并、承包、租赁等方式，促进企业集团突破“三不变”的框框。

制定投股集资办法，鼓励集团成员企业和个人投股。并成立集团财务公司，履行集团资金的筹集、计划、协调、分配、使用等功能。通过投股，一方面可以壮大集团财力，提高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可以起到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作用；通过投股，把集团建成国家、集体、个人命运的共同体，把职工与企业、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从根本上体现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体现全民

所有制的内涵。

(3) 集团要根据国家计划和集团的整体利益，提高协调和控制能力。要克服各种短期行为，以保证集团的整体利益和稳定性。

(4) 要做到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既要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又要充分调动集团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树立民主管理思想，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统一规划和分散经营相结合，以此增强企业集团的内聚力和创造力。

(5) 对集团的紧密联合层部分，要逐步实行资产、经营一体化，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集团公司”，增强集团的实力，更有力地发挥集团的辐射作用。

作者单位：清远市纺织工业总公司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上接第25页)

3. 郑文林同志也认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的某些搞法来讲，现代新儒学无疑是对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救。4. 方克立教授还介绍说：近年来海外新儒家学者甚至提出了要把西学、马列和儒家人文主义进行优化组合的新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这种观点基本上得到了与会者的共识。多数学者认为，现代新儒家只要以宽广的胸怀去对待与自己同时并存的其他学说，正视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发生和将会发生的影响，处理好同马列主义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关系，就一定会形成与马列和西学优化组合、健康互动、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局面，从而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并能作出积极的贡献。

四、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导向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现代新儒学可以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并能作出积极的贡献，但必须有健康的导向。如何导向或导向何处？1. 方立天教授提出，大陆学者要掌握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解释权和导向权，要通过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把它导向科学性，使儒学和传统文化获得创新和转化。2. 陈少明等同志认为，要把政治、文化、学术区分开来，在当代，不能把儒学重新搞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它虽然有存在的根

据，但在现代多元文化系统中只能作为一家之说，从一个侧面去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3. 郭齐勇等同志认为，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儒学都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研究现代新儒学，与其关涉面过广，不如收缩回来，把新儒学导向为学术而学术的轨道，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也是参与文化建设的表现。4. 汤一介教授认为，从心性之学开不出科学的认知系统，从“内圣”之学开不出“外王”(民主)政治，儒学在现代的发展方向是：发挥儒家传统中的怎样做人以及真善美统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良好的方面，并与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西方哲学相结合，去创建一种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相结合的新的哲学体系，这样才能发挥现代新儒学在中国现代化及其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方面的作用。最后，多数学者一致认为，要把现代新儒学导向与马列主义和外来文化协调发展的轨道，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吸取西方同时代的文化，以缩减中西文化的时代落差；另一方面要继承传统文化，以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同时，还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范英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兼论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

张 磊

历史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是重大的、无可代替的，对它的任务的任何低估或漠视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恩格斯在评论托·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书时宣称：“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蒙：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培根则在历数了自然科学和艺术的——对人的素质的提高——重大意义后，确认读史使人明智。事实如此。历史科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不同层次和领域的规律，使人们真正了然于过去，更为科学地把握现在和规划未来。此外，历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准确理解逝去时代的精神的结晶和积淀有赖于历史科学，而这种辨识力和批判力则是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精华的前提。历史科学还大有裨益于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崇高的人生观、价值取向和道德品质往往附丽于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深入人心。

对于切近当世的中国近代史而言，更是如此。这门学科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显示得益发直接和强烈。

历史研究是严肃而有益的工作。

史学工作者应当具备这种意识。

我不揣陋地阐明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并以兼论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作为验证，用心之处，正在于此。

(一)

近十余年，确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期。成果丰硕，诸家并陈。几乎在所有重大课题上都迈出了探索的步伐，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不足和缺陷，并努力加以改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同这个历史时期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相比，与现实生活的需求相较，无疑存在着差距。一些有悖于客观实际的观点和不足为训的倾向，也是无庸讳言的。应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

恰如其份地评价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研究工作，是关乎学科现状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以如此，是由于这种估计涉及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去实绩、现有水平、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发展趋向。应当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力避片面性和绝对化。笼统地否定一

切或肯定一切，都非精当的论断。对于先前的许多研究成果，不宜轻率地否定，判为“极左思潮”的产品，当作有待“彻底破除”的“旧物”。甚至妄加罪状，如指责“两半论”（即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观点的简称）“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成为“时至今日反对‘封建残余’仍然是严重而艰巨的斗争任务的思想认识根源”，等等。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作出的许多历史论断是科学的，反映了客观实际，不仅对学科的建设起过积极作用，而且产生过不容忽视的社会效能。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各个阶级的地位与作用）的论断，已为民主革命的实践所验证——在这个基本国情定性的基础上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取得了完全的实现。因之，“两半论”是不能“彻底破除”的。至于补充、丰富和发展，自是十分必要的。应当在这里着重指出的是：一种观点和理论的真伪标准决非“新”与“旧”。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才是关键所在。刻意求“新”而构想的“体系”可能是伪科学，过去作出的科学论断未见得因其“旧”而成为谬误。此类状况，近年屡见不鲜。当然，肯定一切同样是一种偏颇，它只会导致停滞和僵化，阻碍科学的发展。

毫无疑问，思想解放的过程不能中止。必须彻底清除僵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干扰，挣脱沿袭已久的错误观念的桎梏，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进一步推动近代史研究工作的发展。然而，这个进程的实现是长期和曲折的——冲决旧的积习决非易事，何况还有史实的辨正

和方法论的改进。特别是存在于后者的问题，更需要艰苦的思维功夫和敢于扬弃的开拓精神。例如，美化近代农民战争，苛求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简单化倾向等等。上述的舛误虽然有所克服，而其影响并未消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对这种后遗不可掉以轻心。但是，思想解放的内涵系指破除教条主义和传统的错误观点的束缚。只此而已，别无他义。标榜反对“迷信”，要求“总体反思”和“彻底抛弃过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见解根本否定了建国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混淆了真假马克思主义，曲解了思想解放的科学精神，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健康发展。何况40年来许多科研成果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又怎能够“彻底抛弃”呢！

要求研究工作不断开拓与创新，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研究工作离不开探索与创造，因循、重复是科学发展的障碍。但是，科研的开拓与创新是一个深入的、广泛的过程。既难一蹴而就，又排斥主观随意性。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遵循科学的方法，坚持严谨质朴的治学态度，发扬刻苦钻研的精神。任何赶时髦，逐“热点”，生造和罗列“新名词”，故作妄语以显其“高深”，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构筑毫无根基的“体系”，都是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至于以启蒙者自居，认为一切从零开始，亦即从我开始，则只能以其不自量而贻笑大方。历史人物与事件评价中的“翻烧饼风”也是不足为训的，因为科学研究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事业。从李鸿章到汪精卫都要翻案，似乎缺乏根据。关于汪精卫堕落为汉奸后的某些传闻太过荒诞不

经，令人一笑置之。把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之类的桂冠奉送给李鸿章，却是难以索解。无可置辩的事实是：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经过了两个阶段。鸦片战后的80年间，近代化大体等同于资本主义化。必须采取真正的变革或革命的手段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以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实质上即近代化——的国家。初生的、缺乏物质力量和精神准备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深重民族危机激励下勇敢地登上历史舞台，它的政治、思想代表——维新派和革命民主派演出了堪称悲壮的史剧，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但却因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而失败。于是才进入第二阶段，近代化——现代化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相结联。这条道路也不顺畅，然而却是唯一具有现实性的通途。把李鸿章捧为近代化事业的“第一人”，则是将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混淆不清的结果。他的活动——包括客观上有些积极作用的洋务活动的基本倾向是维护现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治中兴”之谓并非全无缘由。全部中国近代史昭示了一条严酷的真理——离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近代化根本无从谈起。这种翻案文章其实也并非创新，从半个多世纪前的蒋廷黻等的著作均可找到同调。

思想解放、开拓与创新是科研工作所必需，但定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基础。

(二)

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指针，乃是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优势所在。

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失掉了生机与活力，显然是错误的观点，有悖于客

观实际。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确已过时，要求作出必要的修订和补充。况且，有的观点在当时就不符合实际。否定马克思主义，或是把马克思主义奉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都是非科学的态度。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领会它的精髓和灵魂，在实践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这种科学的态度，方能正确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历史科学的本质和任务，使它必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正，只是研究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在全部研究过程——特别是分析和论述阶段——中既有赖于世界观的指导，又离不开方法论的运用。标榜无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客观主义”，实际上只能如列宁所指出的沦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俘虏。近年来的一些出版物，就是实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迄今仍是认识历史的指南和途径。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与阶级斗争，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个人），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人物评价的准则……的论述，正是开启历史门户以窥堂奥的钥匙。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意味着不加分析地排斥其它的理论。日益复杂和剧变的世界要求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的多样化。只要有助于更为深刻和广泛地认识和反映历史，古今中外的一切含有科学因素的理论全在接受之列。这种吸收只能是经过鉴别和消化而实现，生吞活剥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正如其它社会生活领域一样，历史研究从来就不可能泥古不化或全盘西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基础上，史学理

论和研究方法从封闭走向开放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一些恰如其份地借用了历史比较法、计量法……的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意。

关于“三论史学”或“新三论史学”的评估，必须认真对待。把自然科学的优秀成果引入社会科学，反映了两大科学体系的趋同，丰富和更新了理论和研究手段，扩大了研究工作的视野。但是，这种引进只能是有限度的、适合社会科学特点的，否则，必然带来消极后果。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各有自身的规律和特性。历史科学是以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为内涵，研究它的变化和发展。而系统论、控制论却是从系统的“稳定性”出发，探索系统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二者之间的差异（研究对象、目的和条件）绝对不能忽视，生搬硬套地用系统论、控制论去研究历史，决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的“深层之谜”，却会陷入窘困的境地。况且控制论乃至系统论等在近半个世纪中虽然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可观的成就，但在理论上尚未完全成熟。它们不断向毗邻科学延伸和发展，又来不及系统化和完善化。加以它们在阐发原理和方法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哲学流派的影响。可见，它们自身的特性及其不成熟性限制了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和效果。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论及控制论与社会科学时指出：“有许多东西我们只好让熟练的历史学家用不‘科学’的、叙述的方法进行研究。”实践证明，只有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制约下，自然科学的某些成果——理论和方法论才得以富有成效地用于研究一定范围中的课题。“三论史学”或“新三论史学”把引进自然科学的

成果普遍化、绝对化，只能是失败的尝试，而非新史学发展趋势的体现，尽管留下的教训值得反思。谓予不信，试看金观涛先生近年来的一些著作，如“轰动效应”不小的《兴盛与危机》等，当可了然。

（三）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发端，中国历史从中世纪进入了近代时期。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社会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是一个过渡的、畸形的社会阶段，只有经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梯才能摆脱悲惨的处境而走向光辉的未来。

“两半论”科学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否定“两半论”是缺乏根据的，尽管持新见解的论者也都承认半殖民地反映了国家的地位，但意见的分歧却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在语义的理解上，或是在实质的认识上，对于这个极其重要的基本课题，进行讨论颇有必要。

首先应当明确的前提是：事物的性质由什么来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由什么来决定？必须从哲理的高度加以阐明。

一般说来，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它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而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矛盾，其中又必有一种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同时，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也分主次。“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选集》）

根据这种科学的原理去研究中国近代

史，那么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因素就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显而易见，交织着错综复杂矛盾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乃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对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支配和制约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无疑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中国人民尚未把它们推翻之前，它们的统治在最大限度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

当然，抽象的哲理只是研究的指导方针。必须诉之于探索的实践和客观实际，才能作出科学的论断。事实证明，“两半论”的定性符合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际和特色。

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和发端，是颇为意味深长的。历史悠久的中国从中世纪转入近代时期，帷幕的开启既非社会生产力的重大突变所导致，也非波澜壮阔的革命的结果，而是由鸦片战争所拉动的。强烈的外烁作用及其促成的严峻的现实，深切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实质性变化，致使它循着独特的轨道发展，成为一种过渡的、畸形的社会形态。

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总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对于这个科学的论断，应当加以历史的理解。所谓“自己的面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而“为自己”的欲念和意图，则是一以贯之。在它处于上升时期，为了在本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确立资本主义的统治，它需要与自己相类似的“伙伴”，所以，援助为资本主义化而斗争的国

家。而对它的心目中的“野蛮”民族的征服，则是“为自己”的实践的重要补充。待到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阳光下的地盘”已被分割殆尽，加以垄断资本主义必得从殖民地附属国榨取超额利润才能生存，于是旧有的“伙伴”成为竞争的对手。至于新“伙伴”——新对手的出现，则是绝对不再允许。它只希望增加“为自己”服务的“伙计”（这些国家中的变革必须局限于此范围），即殖民地附属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确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毛泽东选集》）

尽管帝国主义的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萌发，使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但却又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通道，使中国同时沦为半殖民地。封建主义的桎梏依然存在，中国人民又被套上一副新的殖民主义枷锁。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于是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帝国主义采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人民处于灾难深重的悲惨境地，成为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虽然在总体上还保留着独立和主权的形式，但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帝国主义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对象。孙中山称自己的祖国为“次殖民地”，这种观念——虽然在科学的意义上并不精确——表述了正义的悲愤。可见，否认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对“把民族独立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完全无视于严酷的历史实际。

十分清楚，半殖民地这个语词决非“主要指国家地位”。作为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定语之一，半殖民地有其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内涵，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本质的意义。当然，半殖民地一般说来不是关于典型社会形态的典范定语。但近代中国社会自身就是一种过渡的、畸形的社会形态，所以半殖民地恰恰反映了它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特点。特殊的、非典型的社会形态，需要特殊的、非典范的定语。只有这样，才能名实相符。

半殖民地的主要内涵，包括了如下的各个方面：帝国主义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掠夺了——通过“租借”和“割让”——中国的领土和榨取了巨额的赔款；帝国主义迫使中国签定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了驻军、领事裁判权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重要通商口岸、海关和对外贸易，掌握了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交通事业，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市场，并使中国的农业服从它们的需要；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了工厂和企业（1936年，外资竟占中国资本总额的80%左右），直接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严重压挤了民族资本工业，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经由贷款给中国政府和在华开设银行（20世纪初期，在中国有着2800多家外国商行和90家外国银行），垄断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不仅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民族资本，并在财政和金融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培植了为它们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帝国主义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它

们在华统治的支柱；帝国主义供给中国政府和各派军阀以军火和顾问，支持它们统治和镇压人民；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侵略政策，力图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分子和麻醉广大群众……。毫无疑问，这幅图景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而半殖民地定语则是真实的写照，反映了旧中国的一个主要方面的本质和特色。

与半殖民地的定语相较，半封建的提法较少异议，因为这种定性概括了客观实际，并是典型社会形态的典范定语。就其基本内涵来讲，半封建系指近代中国社会结束了中世纪时期。封建末世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其地位和作用是微弱的。鸦片战争后，传统的社会开始分解，资本主义萌发起来。这种新的经济成分与相应的意识形态具有严重的意义，但根本不可能——因其自身的孱弱——取代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依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牢牢地存在着，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半”并不意味着对开。

半封建的主要内涵，包括了如下的各个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小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着优势，宛如汪洋大海（直到1949年，近代工业在整个国家的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农村土地关系并非单一化，但地主阶级所有制占有主要地位。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大都继续保存。其它产业部门——手工业、商业、金融乃至近代工业中的封建主义因素，也是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封建主义严重地体现在许多方面和环节。虽然辛亥革命导致了共和制度的建立，两次复辟也都成为短命的丑剧，但是，民国在很大程度上徒

具形式。从实质上考察，先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清帝国崩溃后，则是地主阶级和军阀官僚的统治以及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在意识形态方面，封建主义更是不可低估。作为封建文化主导的儒学虽屡遭冲击，但其地位和作用却未真正消减。甚至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40余年后的今天，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影响也未能等闲视之。

应当指出，随着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方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发生，把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竭力保存中国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封建腐物，并与其结成联盟，以阻抑任何真正的、危及它的统治的变革和革命，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清朝政府在20世纪初期成为“洋人的朝廷”，民国时期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统治者莫非列强的鹰犬。这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实例，其它领域大体类似。帝国主义充当封建主义统治的靠山，封建主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墙脚——正是这种极端反动腐朽的联盟，严重阻滞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健康的发展。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因之，科学的论断应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分解，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但它们的出发点全是“为自己”，对被侵略国的社会变化所给予的刺激作用，只不过是它们“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因半殖民地化而日益深重，并未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获得一个新世界”。如同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一文中所指出的：“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因为这“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中国人民只有摆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镣铐，彻底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才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把缺乏独立、民主和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变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不粉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的近代化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可见，夸大十分微弱的近代工业（甚至不论其社会内涵）的作用，视之为拯救和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贬低乃至诋毁革命运动，完全是谬误的、脱离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的论点。

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定语，是实至名归。

否定“两半论”的见解，是因“词”害义和未能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

（四）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整个历史阶段里，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奋斗。”（《毛泽东选集》）一切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思潮和运动，都要以独立、民主和富强为主题，尤其是爱国救亡内涵，更是不可或缺的。

为了进行卓有成效的变革和斗争，必需制订科学的纲领；而纲领的科学性，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

把握。因之，正确判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确认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和畸形的社会形态，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当然，获得这种真知并非轻而易举的。探索的过程是长期的、艰辛的，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许多仁人志士作出了贡献，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代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定性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半殖民地半封建。

在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者的连绵不绝的斗争中，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高峰的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派，但囿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取得胜利。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的激励下超前——因为它缺乏物质力量和思想准备——登上了历史舞台，企图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然而，无论是温和的、未曾逾越君主立宪制度的维新运动，还是更为激进的、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运动，都难免以悲剧告终。甚至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高峰的辛亥革命，也在终极意义上归于失败。只有在另一个新生的阶级——无产阶级自觉地投入战斗，并通过自

己的先锋队领导了民主革命，中国革命面貌才得以焕然一新，并在经历了近8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为光辉的未来开辟了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了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订了科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明确了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估量了社会各个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区分了敌、我、友关系，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无可置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的正确。而这个科学的革命纲领，正是立足于对国情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当以为实践所充分检验的科学的“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

这个根本性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林有能

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

赵立人

读了《重评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以下简称《重评》)一文,①既获收益,亦有疑问,谨提出几点看法,就正于该文作者。

(一)何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

对这个问题,《重评》提出3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其一:“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工业企业为代表),存在着三种资本形式,即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

其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大体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另一部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至于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当然不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其三:“这个官僚买办资本是不能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的。”不言而喻,中国资本主义只能以民族资本主义为唯一的代表。

笔者赞同第一种答案,其理由如次:

一、“外资企业虽然已具有资本输出的性质,但它们的投资仍然大部分是在中国国土上聚集起来的”。②

二、“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的关系。它们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共同构成了中国资本

主义经济,而不是两个自成体系的部分。

三、“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③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无视这一事实,仅承认本国资本才算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无异用小农经济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

四、对大多数发展相对较晚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外国资本在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可以很长)内占重要比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美国、俄国、日本等均是如此。然而,人们一向都认为美、俄、日等国输入的外资是该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如果唯独对在华外资持另外的看法,则不免陷于双重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

或曰,外国对华资本输出有强烈的掠夺性,与上述各国输入外资的情况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其实,凡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相对来说)的资本输出,几乎无不带有剥削、掠夺的性质,在中国的外资如此,在其他国家的亦然,只

有程度之分而无本质之别。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说：“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④日本在奴役别国的同时，又不得不受欧美金融资本的剥削。在俄国，则表现得更为典型，“外国资本每年从俄国劳动人民身上榨取了巨额的利润和利息。沙皇俄国实际上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地位。”^⑤可见这也是普遍的现象，并非到了中国才特殊起来。说到底，“在华外资剥削、掠夺中国人民”与“在华外资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事实，而并非不能相容的命题。《重评》不也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吗？

五、如果承认在华外国资本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那么本国官僚资本之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就更不成问题了。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论及。

（二）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程度及其地位。

《重评》认为，“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是十分低下的”，“如此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哪里谈得上占‘支配’或‘统治’地位呢；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又从何说起？”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不妨把解放前夕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与近代史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作一比较。

据一般估计，1949年，我国近代工矿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加上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共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3.1%；^⑥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9.6%，^⑦余下的7.3%为个体手工业。合而言之，工业、手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30.4%。

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已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业革命基本完成。186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上仅次于英国和法国而居第三位，然而，按工农业的净产值说，1859年在工农业生产的总额中，农业的比重占62.5%，工业只占37.5%。1860年，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只占16.1%。这时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⑧显然，所谓37.5%的工业净产值中也包含了工场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足见1859年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1949年的中国高不了多少。我们不要忘记，当时在美国农业中占优势的仍然是奴隶制农业，而不是资本主义农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在日本已确立起来。不过，整个说来，日本的工业发展还是相当微弱的。农业在产业部门中仍占压倒优势地位。^⑨1890年，日本的农林水产产值在各经济部门生产总值中占48.4%。工业、建筑业产值共占15.3%；^⑩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2.3%，^⑪1900年，工矿业的收入为25500万日元，农业（包括林业、水产在内）的收入为96400万日元；工矿业职工为293万人，农业劳动者为1733万人。^⑫1900年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显然还低于1949年的中国。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否“非常微弱”，发展水平是否“十分低下”？由于人们对这两个定语的具体含义理解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历史比较已清楚表明，解放前夕的旧中国已完全够资格让人们讨论它是否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从何

说起”。至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否“支配”或“统治”地位，则是更容易回答的问题。《重评》不是说“在这微弱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又始终占据着绝大的比重”吗？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在旧中国占“支配”或“统治”地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得出“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或‘统治’地位”的结论。

（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吗？

由于《重评》不同意“把官僚资本的统治笼统地解释为资本主义统治”，有必要再次运用历史比较法来澄清这个问题。

所谓中国官僚资本，一般是指旧中国“官办”或“依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企业资本，^⑩亦即依靠政权的直接干预，利用政治强制的掠夺方法形成的国家资本和特权资本。这种类型的资本，并非中国的特产。

在俄国，外国资本和有浓厚封建性的国家资本、特权资本自资本主义发展伊始即占统治地位。19世纪末，沙皇国家拥有巨大的冶金工厂和矿山，掌握着全部军事工业和92%的铁路投资。沙皇政府奉行发展国营经济的政策，补救了国内资金积累的不足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薄弱，对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俄国金融资本的巨头，往往就是沙皇政府的重要官员，并且与德、法、英等国的垄断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金融寡头与政权密切结合，沙皇家族和王公本人往往也就是俄国垄断组织的大股东。例如，赚钱最多的北高加索铁路的主要股东，就是一些王公。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比俄国更晚，国家

资本和特权资本（合而言之，就是官僚资本）所起的作用也最显著。它的产业革命，一开始就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组织、推动，而不是由自由资本主义自发地开展和实现的。明治政府创办了一批国营企业，至19世纪80年代，除保留部分（主要是军工企业）之外，大部分廉价售与“政商”，即和政府密切勾结并因此享有特权的大资本家，后来发展为操纵全国政治、经济的政阀集团。与此同时，国营经济仍继续发展，在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处于统治地位。1906年，实行了重要铁路国有化，直到1914年，国营企业仍占中心地位。离开国家资本的带动、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便寸步难行；而明治政府扶植保护的仅仅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和华族、上层士族，对小工厂主、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并不保护和扶植，而是迫使其经济地位下降以至于破产，从而沦为雇佣劳动者。这不仅使私人资本依存于国家权力，而且决定国家资本居于特殊重要地位。可以说，二次大战前的日本，不曾有过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⑪它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国家资本和财阀特权资本的发展史。与此同时，外国资本在日本也占重要地位。对外贸易长期被外国资本垄断。

综合而言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政权，突出的军事封建性，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垄断资本以及与政权关系密切的特权资本的重要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半封建农业相对立的经济基础上，对外国资本的严重依赖，对劳动人民特别残酷的压榨，都是俄、日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特

点。

这些特点表明，愈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封建性愈浓厚，官僚资本（一般情况下，还有外国资本，但也有例外，如德国，国家资本占统治地位而外国资本则否）的地位便愈重要；相应地，本国自由资本的力量也就愈弱小。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畸形状况，正是这一普遍规律的突出反映。也就是说，具体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主体不可能是民族资本，即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而只能是有强大政治后盾的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相应地，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只能是受国际垄断资本操纵、与封建地主阶级密切结合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带有浓重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色彩，是不发达的、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官僚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类型；旧中国如此，近代史上的俄国、日本（还有德国、奥匈帝国等）也是如此，当代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国”仍是如此。在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是最普遍的资本统治形式。如果“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统治”，那么近代好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只好一笔勾销了。

（四）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

《重评》认为，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界线，“使人难以理解”。笔者不揣冒昧，愿谈谈自己的理解。

社会性质的转变，必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表现出来。那么，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这两方面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呢？回答是肯定的。

先说上层建筑。辛亥革命前，统治中国的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主要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后，政权落到北洋军阀手中，其核心是以袁世凯、周学熙为代表的北洋系官僚资本集团。北洋军阀官僚无疑还有浓厚的封建性，但他们的经济活动，大致上都以资本主义经营为主，封建剥削为辅。即使象倪嗣冲、张勋这一类封建性最明显的军阀，也大量投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而北洋政府中的官僚，都投身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基本上与封建的生产关系脱离了。总之，北洋军阀官僚集团带有显著的官僚资产阶级属性。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北洋军阀政权，标志着中国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体的统治的结束和以官僚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统治的开始。之所以说“主体”，是因为清末的统治集团已含有官僚资本的成份，但居于从属地位；北洋军阀政权仍带有封建性，但也居于从属地位。这是突变与渐变、取代与继承的辩证统一。

再看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重评》说，“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随后的年代民族工业萎缩”，这一表述是不完整的。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1~1936年，尽管中国经济出现过危机和萧条，但总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扩大，本国工业资本增长一倍以上，约合年率6%，增长的主要是民族资本。两度危机、萧条之后，都再现繁荣。1936年，民

族资本发展到最高峰。民族工业的萎缩，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1937年之后，而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随后的年代”。

其次，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也不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而是早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就开始了。中华民国甫告成立，各地实业团体即如雨后春笋，工矿企业的创办盛极一时。如上海，1911年新开设的工厂只有9家，1913年增至29家。其他地方如镇江、无锡、长沙、湖北、安徽、河南等，也有类似的情况。“民国初年在我国确是出现了一个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浪潮”。^⑤

既然辛亥革命不仅仅标志着政权性质的改变（官僚资产阶级代替了封建统治者），而且标志着经济基础的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的掀起）；那么，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开始，应该是理由充足的。

诚然，由于政局不稳，内战频繁，军阀官僚的贪婪残暴较前清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后的民生较之革命前更形困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强在远东的“均势”被打破，乘势坐大的日本，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程度，中国的处境更加险恶，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社会性质没有变化。尼德兰独立战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民的生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更加痛苦。历史早已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最初带给人

民大众的，决不是福祉，而往往是比封建制度更为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波兰和匈牙利近代史上都建立过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政权。按通行的观点，这就可以作为社会性质开始转变的标志（人们习惯上都把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初步胜利后新政权的出现作为两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开始）。但结果波、匈两国的资产阶级政权都被外国侵略者的武力所摧毁，民族未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认为一个一贯贫弱的国家，在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就一定能成功地抵御强大的外敌，那是过于奢望了。何况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由于作为统治者的官僚资产阶级日益买办化，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本来就与半殖民地化紧密相连。

笔者无意在本文中全面评价辛亥革命，更无意把辛亥革命说成是一次完全“胜利”的革命。事实上，资产阶级领导下完全“胜利”的革命是罕见的，辛亥革命当然远远不够格。即使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革命者所追求的目标在革命后也没有达到，民主共和国很快就被颠覆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复出现的大资产阶级军事专制帝国和金融贵族寡头统治，其间还有为时不短的旧王朝复辟，80年后，民主共和制度才终于确立下来。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对辛亥革命过于苛求呢？实事求是地肯定它带来的社会性质变化，这就够了。

（五）中俄两国近代历史的比较。

上文已对近代中俄两国的社会特征作了比较。这里只就《重评》所作比较谈一些看法。

《重评》说：“1861年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在俄

国社会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从1860年到1900年，俄国的工业产量增加了六倍”。“而中国呢？近代历史上的中国，农民战争失败，对外战争失败，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失败，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总之，近代中国充满着失败的纪录，殖民地化日益加紧。”

这种比较是否全面，实不无可疑，因为人们同样可以说：“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具见上文）。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不足10%，提高到将近20%，工厂数由500多家增加到近4000家，增长8倍，是中国向近代化进程的一大标志’。”^①“而俄国呢？近代历史上的俄国，农民战争（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对外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1905年革命失败……。总之，近代俄国充满着失败的记录，‘沙皇俄国实际上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地位’，‘大有丧失民族独立的危险’。”^②无疑，这样的“比较”是荒谬的，但是，如果《重评》的“比较”结论能够成立，它也同样能够成立。

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对比时，《重评》强调了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一面，而回避了其落后的一面，谈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成功”的同时，却不提我们所指出的“失败”；谈及近代中国时，却又只谈“失败”，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估计过低。

所以，其“比较研究”得出这样的结

论：“俄国1861年的改革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都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都是成功的，所以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中国，在列强侵略下，资产阶级的改革、革命都失败了，不仅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殖民地化的过程。”显然这个结论是有待商榷的。

所谓“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指“资产阶级领导的改革和革命”；另一种是广义的，指“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和革命”，但其领导者不一定是资产阶级，而可以是封建地主阶级或无产阶级。《重评》所说的如果是前者，那么俄国并没有这种“成功的”“改革和革命”——1861年的改革是封建地主贵族领导的，1917年二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俄国资产阶级则从来没有扮演过改革或革命领导者的角色。而且，二月革命之后仅仅8个月，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寿终正寝了。说“二月革命……是成功的，所以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未必妥当。如果《重评》说的是后者，那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中国从此“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此，无论《重评》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是指前者还是指后者，它的结论都难以成立。

①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文。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33页，注253，人民出版社，1975年。
- ⑤⑨⑫⑰ 樊亢等：《外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下册，第254、235、235—236、208页。
- ⑥ 姜铎：《略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上海《文汇报》1986.3.11。
- ⑦ 何晓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学术月刊》1986.4。
- ⑧同⑤ 上册，第193页。
- ⑩⑭ 万峰：《日本近代史》，第166、1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⑪ 樊亢等：《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第

- 369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
- ⑬ 《毛泽东选集》第1343页，横排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
- ⑮ 丁日初：《辛亥革命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第4册，第1342页。
- ⑯ 陆仰渊：《中国近代化进程线索问题述评》，《江海学刊》1988.5。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林有能

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

罗一星

清代前期，随着岭南区域经济开发的全面发展、随着手工业城镇和商业港市的兴起、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海运体系的建立，在这个独特的经济区域里，产生出了一个完整的商品流通体系——岭南市场。本文将对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作一初步考察。

一、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总额和商品结构
市场是商品供求关系的总和。没有商品供

求，便不存在市场。商品供求是指一定时期内的生产者或售卖者以一定价格向市场供应一系列商品数量的总和、以及同一时期内消费者有购买能力的商品需求量的总和，也即商品的流通量值。因此，考察商品的流通量值，是研究市场的重要一环。但由于清代前期统计资料阙如，笔者在这里只能用间接的方法求证。

表一：鸦片战争前岭南市场主要商品量值估计①

	商品量	商品值		本省产量	商品量占产量%
		银(万两)	比重 %		
粮食	17.8亿斤	1725.898	28.7	138.87亿斤	12.8
棉花	71.3万担	674.3	11.2		
棉布	1931.12万匹	579.14	9.7		52
丝	2.63万担	391.03	6.5	1.82万担	144.5
丝织品	1.07万担	383.2	6.4	0.8万担	133.8
茶叶	64万担	1095.7	18.2		
盐	280万担	560	9.3	328万担	85.4
糖	47.8万担	125.4	2.1	50万担	95.6
铁器	132.6万担	198.46	3.3	130.1万担	101.9
缸瓦磁器	8万担	273.6	4.6	7.5万担	106.7
合计		6008.728			

表一所列10种商品,货值均在100万两以上,其它商品货值较小,故不一一罗列。所列商品值均是市场批发价格。

众所周知,一地区商品流通量值的大小,反映着该地区商品生产和消费的水平状况。从上表可见,岭南地区主要商品流通总额达6008.7万两,人均2.4两,远远超过全国人均1两的平均值。②这反映了岭南地区有较高的商品生产和消费的水平。

从表一还可看到:除棉花主要由外国进口、茶叶主要由外省进口外,商品量高于产量的商品还有4种。这是因为清代前期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各省商品毕集于广州一地之故。

商品量在广州的激增,对清代前期广东社会产生了两个深刻的影响。第一,人均2.4两的贸易额,给广东社会带来了积累大量财富的机会。清代的广东,号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③大量财富的积聚,又造成了广东消费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历史状况。高物价、高利息、高利润,带来了广东社会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的繁荣景象。第二,造就了大批商人。一般认为,人多地少是弃农经商的重要原因。其实,市场商品的增加,才是商人数量增加的直接原因。商品量的增加,需要增加货物空间转移的人力,而人力和劳务的投入,又使商品具有了时间效用、地点效用和占有效用,提高了商品本身的价值。价值的提高,意味着报酬的优厚,反过来又刺激了从商的欲望。因此清代前期在岭南市场上崛起了粤商集团。这个粤商集团,人数众多。所谓“广东富盛天下,负贩人多,”④“岭南为边隅财赋之区。……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⑤的记载,就是指此。

表一所列10种商品数值,虽然大致反映了岭南市场的流通总额,但其包括了各省通过广州出口而不在本地市场流通的商品,也包括了征课在内。因此它还不能真正代表岭南市场的商品结构。必须作一些必要的调整。现把外省出口商品量值和征课银额两项减除,调整结果见文末表二⑥

从表二可见,粮食(31.6%)、手工业品(包括布、盐、丝织品、铁器、缸瓦磁器等共33.4%)、经济作物(棉、丝、茶、糖等共35%),3大类商品所占市场比重非常接近,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这说明清代前期的岭南市场已打破了粮、布、盐三大传统商品的垄断局面。手工业商品种类的增多和经济作物商品量的迅速上升,是此时岭南市

场的重要特征。商品结构表征着市场的性质。岭南市场商品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岭南范围内地区分工的发展,反映了岭南范围内城乡之间、手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之间交换的发展。因此,这一变化,预示着岭南地区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发展趋势。

二、岭南市场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运销

长距离运销是市场扩大的重要标志。在鸦片战争前,它还是促发国内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因素。下面,我们将对岭南市场的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运销进行考察。

1. 粮食的运销

清代前期,广东境内人口的增加和商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广东成为一个严重缺粮省份,需要从境外大量输入粮食。珠江三角洲是最大缺粮区,当时满足这个巨大的粮食市场的来源地有如下3个,即广西的西米、湖南的湖米和东南亚的洋米。

广西是最主要的货源供应地。清人吴兰修曾说:“桂、柳、浔、梧诸郡,岁浮江而东下者,凡数百艘。”⑦雍正年间,广东每年“即丰收而乞糶于西省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⑧乾隆、嘉庆年间是西米东运的最盛时期,其数量必比雍正年间要多。估计此时广西稻谷每年东运量在300万石左右。因为直到清末民初,广西人口已达1000余万,自食量大大增加时,“广西米粮由梧州输出者”,仍“年达四百万担以上。”⑨

湖南是广东米谷的另一供应地。众所周知,洞庭湖流域是清代著名的稻米产区。清代前期,大批湖米溯湘江南来,在衡阳分为两道入粤。一道溯耒水达郴州,转达武水而下,在韶关入北江南来;一道继续溯湘江西去,入广西,在梧州入西江东来。均集于广、佛。此外,江西、福建也有米谷向广东输出。估计三省南运之米每年有四五十万石左右。

洋米入粤始于康熙年间。乾隆以后,由小吕宋(菲律宾)、暹罗、安南循东、西海路从虎门入口,运至广州的洋米逐渐增多。年达十几万石。到道光年间,广东官府对洋米进口免其征榷,洋米进口量大增,“岁至恒数千万石计。”⑩此后,洋米逐渐取代西米和湖米,占领了广东粮食市场。

潮汕三角洲是仅次于珠江三角洲的米粮需求市场。史称“潮汕、嘉应二府接连闽壤,耕三渔

七，必资海运接济。”^①“米所由来，多赖海舶。”^②海运通达四方，潮州府的米谷来源主要有以下四个地点：一是广州。广州地区虽缺粮，但它又是一个集散地。乾隆年间，潮民向在省城买运米谷运回接济。^③二是高、雷、廉诸郡。乾隆年间，海阳县“每藉广肇高廉及江右米商运济。”^④《澄海县志》也记载：“其自海南（非仅指琼州）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⑤三是安南、暹罗。乾隆年间，澄海县所需米谷，“向藉商民领照赴洋及高雷等处买运回澄，以资民食。”^⑥四是台湾。嘉道时人龙庭槐曾说：“惠潮仰给于台湾外夷之米。”^⑦可见潮州府海运米谷之盛。

上述诸路长距离运销的粮米，估计约有450万石左右。占上表调整后的全省商品粮的40.3%。而其中数量最大的西米，主要是与广东的手工业品如布匹、丝绸、铁器、缸瓦器皿等物相交换的，尤其值得重视。

2. 棉和布的运销

清代前期，岭南市场上流通的棉和布的货源大大增加。据褚华《木棉谱》记载，清初时在松江，“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①从外省贩来的棉和布以松江和湖广为多。“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与棉花皆为正货。”^②湖北之临利布，“南走百粤，厥利甚饶。”^③当时湖广布是循湘江南下武水而至。而松江布除走长江转入赣水过梅岭南来的老路外，清代前期还发展了海路运输。乾隆年间，澄海商船贩运黄、白糖至松江、苏州等地发卖后，即“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④清代前期，江西棉、布也大量输入广东市场，长乐县在康熙年间就半赖江西棉花供应，“仰江西者恒什五。”^⑤而江右布商在广东棉布市场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从广州进口的印度棉花，鸦片战争前平均每年为50万担；英国棉布平均每年为53万匹。数量都很大。

与此同时，广东也向境外输出布匹。清代前期，广东棉织业发展迅速。而广东气候炎热，人均需布量较少。因此，广州、佛山的布匹市场有大量土布输出广西等地。

西江是最主要的土布运输路线。从两广交界处的戎墟开始，北溯桂江到阳朔、桂林；南循容江到藤县、容县、北流、玉林；西溯浔江到桂平、折入红水河到柳州；西南溯郁江到贵县、南宁，再分往左右江到崇左、百色；无不是广东土布的市场范围。例如乾隆年间在贵县开设林宝昌铺号而发家的广东商人林大祿，（号称“林百万”）就是从贵县大批运谷米到广东，“然后从广东运回大批的手工业品、布匹、丝绸、故衣、铁农具等。”^①稍后在贵县开设正泰铺号的广东商人林廷宣，也是由贵县贩运大宗谷米下广州后，“又由广州、佛山买布匹上来。”又如乾隆年间在桂平县永和塘开铺营生的南海商人周魁国、刘懿章等人，也经营东来的“绸缎、布匹、海味、磁器”等物。^②桂平县江口墟由广东商人开的“仁兴店”，也是运米下佛山，然后从佛山运回“洋货、绉纱、大成布、大灰布等到江口。”^③此外，在玉林、容县、北流、桂平等县城，都有广东商人经营的洋纱匹头商号。史称“粤东多商，粤西多农。帛布、菽粟两相便也。”^④由此可见，布匹与米谷两大商品的大规模交流，是两广间长途贩运的重要内容。

3. 粤盐的运销

清代粤盐行销七省，“北渡大庾，东达楚闽，西溯滩流而上，由梧桂以及黔滇，水浮陆挽，亘数千里。”^①合共188埠，配盐814,510引，20,951万余斤。^②清代广东有两大运盐中心，一为省城东汇关（又称省河），一为潮州广济桥（又潮桥）。负责所有配盐的批发，由埠商负责承运。

省河总埠的运销范围很广，包括本省除潮、嘉、琼三府之外的地方；广西全境；贵州的古州；云南的广南、宝宁、开化和文山四府；湖南的临武、宜章等县；江西的南安、赣州二府。其运输路线是：溯西江而上者，沿途分入贺江、浔江、桂江达于广西全境。其入贵州者，溯浔江在桂平转入黔江，经红水河上达。或从石龙溯柳江，历清河上达。早在雍正十年（1732），广西巡抚金鉷就奏称，贵州古州有“粤西从清江转运，一水可达”之便，请改食粤盐，得到清廷批准。^③其入云南者，溯浔江，历郁江，在南宁附近转入右江，经百色，到达桂滇交界的剥隘起岸。例如乾隆十九年（1754），粤盐与滇铜开始实行交换贸易。滇省每年运滇铜10万斤，粤省每年运粤盐170万斤，在滇粤适中地点广西百色所豁之剥隘交

割。③其入湖南者，溯武水，经乐昌、坪石上达。其入江西者，溯湓水至南雄起岸，肩挑过大庾岭，到南安府城下赣江。溯湓水另一运道是到南雄与江西信丰交界的乌迳新田村，清代前期，赣闽商人均在此买盐东归，此处建有福建会馆。溯东江而上者，经河源、老隆，到达和平县东水墟起岸，肩挑入江西龙南、信丰二埠。雍正年间，广东总督鄂弥达奏言称，江西龙南、信丰二埠之盐，“皆屯粤东之和平东水地方，亦招小贩肩挑运回各县铺卖。”④

潮桥“为东路总汇。七场所产，以给二十九埠。运道达于闽汀，迄乎江赣。”⑤潮桥的运销范围包括潮、嘉二府和福建、江西各县。其入闽者，循韩江在三河坝溯汀江而上，经峰市达上杭、长汀、连城等县；其入赣者，溯梅江，在丙村附近转入石窟河，经镇平、到福建武平县下坝起岸陆运，至江西安远县上曾下水，运至会昌、瑞金等县。仅潮桥至下坝，水路就有610里。⑥

清代前期，运销上述六省的盐斤总计达90,844,900斤，⑦占广东配盐数的43.3%。可见进入长途贩运的粤盐数量是很多的。

4. 生铁和铁器的运销

清代前期广东铁矿开采业有很大发展。全省铁矿产地有31县、102处之多。⑧广西的贺县、临桂、富川、雒容、思恩五县也有不少铁矿产地。清代广东官府规定两广所属铁炉出产的生铁必须运到佛山发卖，违者与私盐同罪。所谓两广大炉煅出铁性“皆输于佛山一埠”，所谓“铁以佛山为凑”。当时生铁的运道是：粤北英、韶之铁沿北江而下，在三水沙头转入佛山涌而达；粤西之铁沿贺、浔二江转入西江，罗定、东安之铁亦沿罗定江而下西江，二者皆经思贤滘，在三水沙头转入佛山涌而达；粤东潮、嘉之铁则溯韩江、梅江过岐岭、下东江而达。

佛山铁器加工业是全国著名的行业。明代时，佛山铁器就远销东南七省。明中叶佛山人翟与珉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潮、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⑨清代佛山铁器加工业发展更盛；冶铁行业有10余个，工人不下2—3万人。产品种类和产量都比明代大大增加，销流范围也更加广阔。此时佛山铁锅已成为“鬻于江楚间，人能辨之”的名牌产品。佛山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挈运而转鬻之。”⑩佛山钟鼎也循西江销往广西各

地。至今两广城乡所保存的铁钟，均为佛山清代前期的产品。至于铁农具，亦是佛山的大宗产品，销流至远。佛山籍商人也“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四方推销。故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之誉。此时佛山铁器也大量销往外洋，雍正年间外国船只购买佛山铁锅，每船少者2千至4千斤，多者达2万斤。⑪光绪年间，佛山铁锅贩往新加坡、新旧金山等处仍年达50余万口。⑫可见销量之大。清代前期，估计进入流通的佛山冶铸产品总值在127万两以上。

如果说布、盐还主要是农村手工业产品的話，那么佛山铁器已就是城市手工业产品了。它的流通，代表了城市手工业产品与农村农副产品的交流。

5. 广糖的运销

糖是广东的特产，亦是东南沿海运输的主要货物。据《粤海关志》记载，清代前期广东沿海有黄白糖运载出口的口岸有黄冈、澄海、东陇、潮阳、后溪、奄埠、墩头、平海、神泉、汕尾、甲子、乌坎、海安、雷州、琼州等。当时除广州、澳门集中了部分黄白糖出口海外市场外，以上沿海口岸的黄白糖均由海路北运江浙、上海、天津等地。例如“琼之糖，其行至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⑬雷州白糖，亦“货至苏州、天津等处。”⑭潮州府属的潮阳县，“黄糖、白糖皆竹蔗所榨，商船装往嘉、松、苏州。易布及棉花。”⑮当时尤以澄海商船贩运糖包为盛，“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货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船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⑯贩运“广糖”的潮州八邑商人早在乾隆年间已在上海建立了潮州会馆，嘉庆年间潮商益众，遂分为三帮。其中以潮惠帮（潮阳、惠来）的“糖、菸厘最为巨款。”⑰可见海运“广糖”数量之多。

清代道光年间，广东平均每年贩往外省和出口海外的红白糖为35万担，冰糖约4万担。运销食糖量为当时各省之冠。

从以上情况看，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在清代前期有很大发展，它的网络已伸向四面八方。它生产的主要商品都不仅仅是满足本地区的需要，而是满足各地区的需要，成为一个地跨两广、面向全国、联系海外的区域市场。

其次，清代前中期的岭南市场不仅就其与海

外市场的关系而言,即使就其与国内市场的关系来说,它也是一个打破了封闭的区域市场。这种市场格局的形成,为岭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通过市场网络所进行的两广范围内手工业品与农副产品的大交流,对两广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它稳定了广东粮价,使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经济得以稳步发展,从而为这一地区手工业和商品的全面繁荣打下基础。鸦片战争前,在广州、佛山丝织业、冶铁业和陶瓷业中已有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出现,佛山的劳务市场也出现了自由雇佣的现象。第二,它增加了广西的经济收益,扩大了商品来源。西米的大量运销,有助于促进广西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广东大量手工业品的流入,特别是深入农村市场的手工业品,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刺激着他们的消费欲望。挟裹着更多的个体农民离开自然经济轨道,卷入到商品经济的漩流里来。在清代前期与广东贸易来往最多的广西东南部各县,如苍梧、平南、桂平、贵县、玉林、邕宁等,后来都成为广西商品经济最发达、物产最富庶的县份。

表二:鸦片战争前岭南市场主要商品结构表

项 目	市场贸易额 (万两)	占市场比重 (%)
粮 食	1623	31.6
棉 花	674	13.0
棉 布	540	10.5
丝	309	6.0
丝 织 品	305	6.0
茶 叶	695	13.6
盐	499	9.7
糖	125	2.4
铁 器	127	2.5
缸瓦磁器	238	4.7
合 计	5134	

① 吴承明先生曾经用间接求证的方法成功地考察了清代前期国内市场的商品量值。此表就是参考吴先生《鸦片战争前主要商品市场估计》表(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的估算方法,结合清代前期广东各种产品的产量制成。

② 参阅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

《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③⑯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④ 《四此堂稿》卷十,魏际瑞。

⑤ 嘉庆二十年彭邦畴《重修梅州试院记》。

⑥ 减除数有如下项目:粮项减去1,025,986两,按道光年间广东田赋地丁(包括桑鱼课)计。盐项减盐课61万。棉布,估计出口数一半本省,一半外省,减198,234两。丝,估计出口粤丝三之一,吴丝三之二。减819,360两。丝织品,估苏缎占一半,减1,113,056元,折银801,643两。茶,估广州加工的花薰茶占一半,减400万两。磁器,减景德磁出口值50万元。折银36万两。所有项目出口数值均见注⑧。表列项目数值万两以下均四舍五入。

⑦ 《广东文征》册五,页三二六,吴兰修:《论米舶》。

⑧ 《朱批谕旨》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引自吴承明上揭文。

⑨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41~43页,民国三十八年文化供应社印行。

⑩ 道光《南海县志》卷八,輿地略四。

⑪ 档案·录付: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初二日两广总督暂留广东巡抚朱珪奏。引自陈春声《清代乾隆年间广东的米价和米粮贸易》(中山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打印本)

⑫⑬⑭ 乾隆《潮州府志》卷四十,艺文·书·陈珪《上当事救荒书》。卷二十三,盐法。

⑮ 《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588页。

⑯⑰ 《粤东例案》(手抄本)平泉。

⑱ 嘉庆《澄海县志》卷八,埠市。

⑲ 龙庭槐:《敬学轩文集》卷一,《与嗣中丞言粤东沙坦屯田利弊书》。

⑳ 褚华:《木棉谱》,引自谢国楨《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页一一〇。

㉑ 同治《监利县志》卷八。

㉒⑳ 乾隆《澄海县志》卷十九,生业。

㉓ 康熙《长乐县志》卷六,籍产四。

㉔⑳⑳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下称《汇编》)第29~30页,第241页,第16页。

㉕ 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十二,名宦·金光祖传。

㉖⑳⑳⑳ 《两广盐法志》卷首,序,卷八,引饷四,卷十五,转运二。

- ③① 邹琳：《粤麓纪实》页四。
- ③② 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六十六，经政略九，盐法二载，桂、湘、赣、闽、黔五省为379，387引，再加滇省170万斤。
- ③③ 参阅邓开颂：《明至清前期广东铁矿产地和冶炉分布的统计》，《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82页。
- ③④ 霍与瑕：《上吴自湖翁大司马》，《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八，《霍勉斋集》一。
- ③⑤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俗志·物产。
- ③⑥ 《雍正东华录》卷一九，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三

日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折。

- ③⑦ 张之洞：《筹设炼铁厂摺》，《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五。
- ④⑧ 道光《琼州府志》卷五，舆地·物产。
- ④⑨ 嘉庆《雷州府志》卷二，地理志·土产。
- ④⑩ 《潮阳县志》卷十一，物产。
- ④⑪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26页，同治五年《潮惠会馆碑记》。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凌峰

对中国工运史的两个问题考证

卢权

一、“一九一三年广州首次举行‘五一’纪念活动”考

1921年5月1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散发了一份题为《五月一日》的宣传品（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三）中以《一九二一年“五一”纪念活动》为题，刊载了这份宣传品），里面说：“1913年的‘五一’纪念日，在中国南部的广州，由华侨工会、机器工会和一班社会主义者联合举行庆祝。……从这次起，每年广州都有‘五一’纪念的运动”。（简称甲资料，下同）

设在上海的《中国青年》杂志第77、78期合刊（1925年5月出版）发表了一篇题

为《五一纪念》（其颖）的文章，其中也说：“1913年5月1日，在广州由华侨工会、机器工会和社会主义者举行庆祝。那天其他的工会也都有派代表到会，但没有什么决议和运动。”（简称乙资料，下同）

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著文涉及此问题时，便往往以此为据，认为“中国第一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1913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①

但是，笔者查阅和研究了有关文献和资料，认为上面摘引的甲、乙两资料所谈及的时间（即1913年）是值得探讨的。就是说，1913年广州似没有、也不可能公开举行五一节纪念活动。是否有可能这两

条资料的作者（均不是在广东发表的）把时间弄错了？或者印刷过程中把其他年份错印成1913年了？

笔者的看法如下：

首先值得指出的：上述甲、乙两资料，实际上同是一条。我们可以将两条资料互相对照一下，便可发现两者的文字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此很可能是乙资料（迟发）照抄甲资料（早发）的，或者是参考了甲资料而编写的。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事情。在此以前，只不过是有些人物或报刊偶而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一鳞半爪而已。就广东地区而论，与广东直接有关的一些人物如梁启超、朱执信等，当时在他们的一些言论或著述中，曾提及过马克思及社会主义，但是并不等于他们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根本无意在中国宣传或实行科学社会主义。在孙中山的言论著述中，虽亦一再提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但亦只是一般性的涉及，并没有接受或有意宣传、实行社会主义。除此以外，仍未发现当时广东地区尚有其他较明显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物或言论活动。因此，上面甲资料说1913年广州便已有“一班社会主义者”，并且公开参加了“五一”节纪念活动，似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从广东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自从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广东落入了袁世凯势力的统治之下。袁世凯排除了胡汉民等在广东的权力，扶持龙济光等人作为其代理人控制了广东。他们施行了一系列反动政策，包括禁锢言

论，禁止人民群众集会结社，取缔进步报刊出版等等。因此甲、乙两资料说及1913年便在广州公开举行五一节纪念活动，似是不可能的。

诚然，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复、莫纪彭、郑彼岸等，曾于1912年间在广州创立过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晦鸣学舍”，旋即又组织了一个“心社”，举行过一些活动，出版了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品，也发表过“社会革命”、“破除强权”等一类言论。但是他们的组织和活动同样受到当局的取缔和迫害，后来在广州无法立足，只好避迁澳门。据一著作称：“民国三年五月，刘师复在广州所办的《民声》杂志，刊出介绍国际五一劳动节的故事。粤劳工界见而颇兴仰慕，徒以时当龙济光祸粤，压制民意最烈之际，亦不敢有所举动。”^②可见，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可能于1913年间公开在广州举行“五一”节纪念活动。

甲、乙两资料都提及华侨工会是1913年五一节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据资料记载，华侨工会全称为华侨工业联合会，成立于1917年。“民国六年，广州有华侨工业联合会的产生。但因分子复杂，办事棘手，不久就改组为中华工会”；^③“民国六年……国会议员周品三、陈鹤寿等，又在粤组有华侨工业联合会，虽非纯粹工人团体，而与工人亦甚有关。”^④如果这些史料是可靠的话，那么，1913年华侨工会尚未成立，根本谈不上组织五一节纪念活动。

以上可见，甲、乙两资料关于1913年广州便已举行过“五一”节纪念活动的说法，是值得探讨的。笔者认为：甲、乙两资料所提1913年这个时间，很可能是1918

年之误。理由是：

一、从历史背景看。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已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已开始介绍传播到中国来。如广州出版的《中华新报》就曾于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一再报道过十月革命的消息：“俄国过激派，已完全掌握俄都及莫斯科之支配权”，^⑤“俄京已为过激党占领。内阁全部阁员均被捕。”^⑥

再从广东的情况看。袁世凯于1916年6月死后不久，统治广东数年的龙济光不久也被赶走。翌年，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在广州成立。虽然此时桂系势力已左右着广东局面，但广东的政治环境已比龙济光统治年代有所改善。此时人们可以公开举行一些集会结社活动，包括五一节纪念活动等。

二、据资料记载，1918年间华侨工会和机器工会确实公开组织过庆祝五一节的纪念活动。如广州出版的1918年5月2日《中华新报》以《工人万岁》为题，报道了华侨工会发起组织五一节纪念活动的经过：“昨日为万国劳民战胜资本家纪念日。是日华侨工业联合会特为举行庆祝。门前高悬红旗，衬以绝大生花横额，中砌‘庆祝劳动圣节’六字”，“午后一时开会，各工党代表莅会者极众。军政府亦派代表与会”，“历数时之久，齐呼‘工人万岁’三声，始宣布散会。”

此外，还有不少资料介绍此事：“广东机器总会乃约同华侨工业联合会，共同发起召集，于民国七年五月一日在长堤石公祠华侨工业联合会内，首次举行庆祝世界五一劳动节大会。……到会人数达一百六十余人”。^⑦“广州民国六年有华侨工业联

合会的产生……每逢广州举行‘五一’节游行，该会往往在街上散布传单，以期唤醒群众。”^⑧

又如：（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广东劳动界诸君举行劳动圣节纪念。是日到会庆祝者极形踊跃。如机器总会、雄球丝织厂、士敏土厂、兵工厂、印字行、茶居行、理发行、广东工团、共和工党、东山铸像公司、东山瓦窑、集议所、建筑师各工程司、宏仁演说会、各报记者等一百六十余人。……历数句钟之久，始宣布散会。”^⑨

由以上资料可见，由华侨工会、机器工会等工会团体在广州联合举行的五一节纪念活动，当是确有其事的，但举行时间则是在1918年，而不是1913年。

三、不少资料（其中包括早年发表的资料）都曾着重指出说，1918年在广州举行的五一节纪念活动，乃是广东地区以至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举行的纪念活动。例如1922年5月1日长沙《大公报》发表题为《去年之五月一日》的文章，在介绍1921年5月1日长沙市举行五一纪念活动经过时说：“筹备员李彤君报告开会，略谓……嗣后欧美各国的劳工都定今天为世界劳动节。年来我们中国上海、广东、北京各处已经举行了三次。今天我们湖南是举行第一次。”湖南毗邻广东，按理，广东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湖南是比较清楚的，如果真像甲资料所说，1918年广州已公开举行过五一节纪念活动，并且“从这次起，每年广州都有五一纪念的运动”的话，湖南方面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是长沙的报纸却只称1921年前广州举行过3次纪念活动，即是指从1918年开始至1920年共举行过3次。我们

可以据此进行分析，甲资料所提广州首次举行五一节纪念活动的1913年，应是1918年之误。

又如：由吴稚晖在上海主编的《劳动》杂志第1卷第5号（1918年7月20日出版）刊载了一篇题为《广州来函》的通信，介绍了同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五一节纪念活动的情况。文章特别标出“广州第一次劳动节纪念”作为副题，文中还着重指出，“此举诚广东空前之盛事也”。如果广州已在1913年举行过五一纪念活动的話，这篇来自广州的文章是决不会称1918年才是广州首次举行的五一节纪念活动的。

再如：由马超俊主编的《中国劳工运动史》指出：“于民国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长堤石公祠华侨工业联合会内，首次举行庆祝世界五一劳动节大会”。马超俊是广东人，当年已在广东从事劳工运动，“余从事工运五十年”，^⑩对广东工运情况十分熟悉。按理，如果1913年广州确已举行过五一节纪念活动，并且从此每年都继续举行纪念活动的話，马超俊是决不会不知道的。但他同样着重肯定1918年的活动才是广州的首举。

根据上述理由，笔者认为甲、乙两资料中所谈1913年广州举行五一节纪念活动这一时间，很可能就是1918年之误。

二、对《国民党与省港大罢工》的 几点质疑

《近代史研究》（北京）1987年第5期发表了李晓勇先生所著《国民党与省港大罢工》一文（以下简称《李文》）。文章提出了“国民党是省港罢工的发动者”，“国民党是省港罢工的领导者”，“省港罢工是国共两党以国民党名义共同领导的”论点。

这是值得重视的。但笔者觉得，文章内用以说明上述论点而列举的诸事例，是否与史实相符，便值得商榷了。现举几例：

第一，《李文》说：“（6月1日）国民党中央也在广东大学召开群众大会，强烈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汪精卫发表了演说。大会通过了多项援助五卅惨案的办法。”

由于《李文》没有注明这一“史实”的出处，不知依据何在？按理，如在广州公开进行过如此重大的政治活动，广州发行的报纸一定会有所反映的。但笔者查阅了当时广州出版的一些报刊，却没有找到上述事例的痕迹。倒是广东大学学生会曾于是日召开过一个“六一”国耻纪念会，邀请了汪精卫、戴季陶等人到会作关于国耻经过的演说。事后，广州报纸曾就此作过报道说：“6月1日，为两年前日本兵舰‘伏见’号在我国无理轰击湖南长沙市民之日。广东大学学生会以国耻不能忘，特于是日下午6时在大礼堂开‘六一’国耻纪念日，并请汪精卫、戴季陶、周佛海、黄季陆、杨宙康诸先生演讲国耻真相。”^⑪

是否可能国民党中央于6月1日白天先在广东大学召开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罪行的群众大会，其领导人汪精卫等旋即于当天下午6时又赶到广东大学出席了该校学生会召开的国耻纪念会呢？这是不可能的。不知《李文》所谈是否有失实之处？

第二，《李文》说：“次日（按指6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动了广州各界声援上海反帝运动的大示威。”

这一说法显然依据不足。据资料记载，这次活动并不是国民党中央发动的，而是由共产党策划推动，通过中华全国总工

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广州市商民协会和广州市学联6大团体发起的。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5月31日晚间，中共广东区委遵照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立即召开会议，^②“决定于‘六、二’举行示威游行。”^③会议还作出以下决定：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州地委联合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主持这次活动的进行；联络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代会、省农民协会、市商民协会、学联会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六大团体作为发动单位；成立“广东工农兵商学援助上海被害同胞联合会”，以动员广大群众投入反帝运动。会后，团广州地委遵照中共广东区委的部署，还派人分头到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等十多个团体串连发动。上述筹备工作“结果俱做到。”^④

6月2日上午，中华全国总工会等6大团体联名于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号召全市各阶层群众参加示威大游行的紧急启事：“现由敝会等发起，联络本市各界，于本日正午十二时在文明路广东大学操场集合，举行示威大游行，以资援助。”^⑤当天中午，活动如期举行。大会“先由筹备会推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孙云鹏、广东省农民协会代表黄学增、广州市商民协会代表甘乃光、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周逸群、广州工人代表会代表刘公素、广州学联代表刘克平等六人组织主席团，复推黄学增为主席团主任。”^⑥黄学增随即主持大会进行。各方面来宾，其中包括国民党代表谭平山、共产党代表罗觉等，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可见，《李文》认为这次示威游行是国民党中央

“发动”的，是否有与史实不符之处？

第三，《李文》认为国民党中央曾于罢工前后两次“召集”各团体开会研究援助罢工办法。其中“一次在6月17日，召集了120个团体，汪精卫、廖仲恺通告了罢工的决定”，“会上还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并推廖仲恺为主席。”

《李文》认为6月17日的会议是国民党中央“召集”的，不知依据是什么？据笔者手头资料，这次会议同样不是国民党中央召集的，而是由共产党决定和策划，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召开的。

6月中旬，“（中共）党团决定将工农兵商学援助上海被害同胞联合会改组为广东各界对外协会。章程、宣言俱由我们提出，执委25个，亦由我们预定，以全国总工会为主席。”^⑦6月17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李森主持下，广州各界120余个团体的代表开会，通过正式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汪精卫、廖仲恺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说，但似没有关于“通告了罢工的决定”这样的内容。会后，广州报纸曾详细报道了这一情况：（会上）“公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森为主席，宣布开会理由”，“汪精卫、廖仲恺先生演说，对于上海五卅惨杀工学界案，人民应誓死力争，务达胜利云云。随由赴会各代表发言，甚为愤激。随即议决成立各界对外协会，克日成立。”^⑧

这次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共青团广州地委于会后亦就此写成报告给团中央说：“C. P.（即共产党）对于此事，曾特别组织有党团，C. Y.（即青年团）亦参加，到会代表有三百人，团体百余个。一切宣言、章程、办法、要求条件，俱由我

们先定提出，完全通过。”报告还特别提及：“当时廖仲恺及汪精卫亦亲身到会，并谓愿全力相助。惟我们不许K. P.（即国民党）中央加入执委，以政党为名而抵制。因恐加入后，领袖地位为彼所占据也。”^⑩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如果这一会议确如《李文》所说是由国民党中央“召集”的话，上面所引会议经过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不知《李文》所说的是否有失实之处？

还值得指出的，《李文》称廖仲恺在当天成立的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上当选为主席一事，是与史实不符合的。事实上，在6月17日会议通过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时，廖仲恺并没有被选为主席，而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当选为主席。后因省港罢工正式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须全力领导罢工斗争的进行，无暇继续主持各界对外协会的活动，于6月下旬提出了辞去协会主席职务。全国总工会曾为此特于报上发表启事称：“本会经已辞去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一职，诚因办理省港罢工委员会事务太忙，不能兼顾。”^⑪6月27日，对外协会为此事召开各界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辞去主席职务，改选广州工人代表会任正主席，广东省教育协会及广东省农民协会为副主席。^⑫廖仲恺作为广州工代会的代表，具体执行主席的职权。团广州地委宣传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亦谈及此事：“总工会又要办理罢工事，无暇兼顾此，遂决辞职，改选广州工代会为主席，代表为廖仲恺。但对外协会可谓仍在我们手中。”^⑬

第四，《李文》说：“国民党决定罢工后，即派干员协同总工会到香港、沙面发动罢

工。这些人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但他们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作为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带着国民党的密令去发动罢工的。”

国民党派哪些干员到香港、沙面发动罢工？哪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带着国民党的密令去发动罢工的？不知《李文》依据什么事实作出这一结论？据笔者手头材料表明，似乎情况并非如此。

6月上旬，邓中夏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商议后，在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的会议上首先提出了发动省港罢工问题。^⑭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邓中夏、孙云鹏、杨殷、杨匏安等前往香港，与已在香港的共产党人黄平、苏兆征等人一起，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整个罢工的准备工作，都是由邓中夏和苏兆征进行的。”^⑮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组织发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对沪案皆表示愿意罢工”。^⑯邓中夏乃派黄平返回广州，向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汇报发动情况，请示“罢与不罢”？^⑰广州临委“决定必罢”，^⑱同时“指定黄平、中夏、杨殷、兆征、匏安五人组织党团，为指挥机关。”^⑲与此同时，共产党大力发动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参加罢工。中共广东区委“指定（冯）菊坡、（刘）尔嵩、施卜、李森、（林）伟民、（陈）延年六人组织党团，以李森同志为书记”，^⑳以加强对组织发动罢工的领导。

在发动过程中，共产党认识到，要组织发动这场反帝斗争，仅靠自己单枪匹马是无法成功的，一定要同时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合作与支持。因此，中共党团在发动罢工到了一定阶段后，“决定派二代表随

中夏、黄平返省与革命政府商洽。”^⑧国民党“决定援助香港罢工”，^⑨因此代表们“与廖（仲恺）、胡（汉民）等接洽时，极其顺利。”^⑩罢工实现时，“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经济援助，他们很慷慨的承认而且实行了。”^⑪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香港不少工会组织的头目多是国民党员，为利于在香港发动工作的顺利进行，邓中夏、苏兆征等在发动罢工过程中，确曾用国民党和广东政府的名义进行过号召，收到良好的效果。事后，中共广东区委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却特别检讨了这一做法，说：“此亦不得已所取之手段也。”^⑫这一事实，以及前面提及的关于排斥国民党中央担任广东各界对外协会执委此事，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着正如邓中夏所批评的关于不让国民党过问罢工，否则就会失去领导权的“机械的见解”，^⑬另一方面，也正好说明了这次省港罢工乃是共产党直接发动的，似不存在《李文》所说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受国民党“派遣”，“带着国民党的密令去发动罢工的”，也不存在所谓“省港罢工是国共两党以国民党名义共同领导”这一情况。等等。

总之，笔者认为：省港大罢工是否国民党“发动”和“领导”的，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但是，如果《李文》依

据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史实”而得出了国民党“发动”和“领导”省港罢工的结论，却是一时不能令人信服的。

- ① 见卜穗文：《中国首次“五一”节纪念活动在广州举行》，载《广东党史资料》第16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
- ②④⑦⑩ 马超俊主编《中国劳工运动史》，1958年台湾出版。
- ③⑧ 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发行，1927年。
- ⑤⑥ 《中华新报》，1917年12月4、23日。
- ⑨ 《劳动》第1卷第5号，1918年7月20日。
- ⑪⑬⑭⑯⑰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2、2、3、18、30日。
- ⑱⑲⑳㉑ 见《团广州地委宣传部报告》，1925年8月26日；另据《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1925年7月）称，开会时间为6月1日。
- ㉒ 见《团广州地委宣传部报告》（第17号），1925年6月19日。
- ㉓ 见1925年7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
- ㉔ 见《团广州地委宣传部特别报告》（第6号），1925年7月6日。
- ㉕ 赖先声：《在广东革命洪流中》，载《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 ㉖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出版。
- ㉗⑲⑳㉑㉒㉓㉔ 《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1925年7月。
- ㉕㉖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作者单位：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有能

汉语各方言的关系和特点

李新魁

汉语从古到今，都有很丰富的方言存在。上古时期，黄河流域一带的氏族和部落很多，商末有一千八百国的说法。至西汉时，杨雄作《方言》记录汉代各地词语，提及秦、晋、吴、越、楚、齐等方言，起码有十四个大区域。这些方言经过几千年来的分化、归并、融合，形成了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和客方言。这些方言彼此的接近程度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它们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比较接近，有互相影响、浸透、融合的一面；有的比较疏远，有隔绝差异、各具特点的一面。各种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彼此的同异，都与使用该方言的人群的社会生活有关，与它们的历史有关。

汉语的七大方言中，还包含着次一级的方言，可以再分为片、小片和点，即还有次方言和土语等的区别。各方言之间的同异情况很复杂，很难用简单的说法加以概括。但各种大方言彼此的关系和接近程度还是可以指出来的。

一、汉语各大方言的形成和彼此的关系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区的范围最大。它包括长江流域以北的大片地区，从广西的桂林到东北的哈尔滨，有七八亿人口使用北方方言，它是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北方方言古称“官话”，现代一般仍用“官话”把北方方言的各个“区”分为北方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下江官话。

北方官话是汉语传统上使用的北方地区方言，它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汉族人民最早就定居在这个区域，春秋战国时，实行封建制度，各诸侯互相争霸，彼此互相攻灭，大国吞灭小国，不断扩展疆土，居民的流徙、混合经常发生。如前316年，秦惠王灭了蜀国之后徙秦民一万家到蜀地，后灭巴国，也使居民杂处。秦国除有汉族之外，还有许多戎族居民，但他们也都汉化，并且与晋国居民杂处。秦国地广人稀，邻国三晋则土狭人众，秦国商鞅就招募邻国居民到秦国耕种，秦晋两国居民就逐渐混

合，两地方言也逐渐接近，以致几乎合成一个大的方言区。杨雄的《方言》就常两者并提。晋国在春秋时征战很多，灭国不少，所以晋地方言有广泛的传播。春秋时，晋国与楚国因争霸而互相交战，结果也大大加强了南北方言的交流。本来，楚人的语言与诸夏相差甚远（楚国的主体民族起初以苗族为主），直至战国时孟子还说楚人为“南蛮鴟舌之人。”但在北方各诸侯国的影响下，楚人逐渐接受了华夏的语言和文字，如后来的《楚辞》基本上就是用华夏的文言写成的。总之，春秋战国时代，居住于黄河流域的夏族及外族居民发生了大混合，各诸侯国的方言大区也相继出现，古籍中关于周代方言差别的描述不少，如《左传·文公十三年》有关于晋国人士会操晋语，秦国派他出使晋国的记述。《左传·哀公十二年》记载卫侯与吴人会于郟，吴国扣留了卫侯，后来放了他，“卫侯归，效夷言”，这个夷言指的是当时的吴语。又如《孟子·滕文公下》说楚人学齐语，日莠而求之，亦不可得，等等。

春秋战国时，北方地区有晋、秦、齐、燕、赵等方言出现，南方则有楚、吴、越等方言出现。楚国的方言，随着政治势力的扩展，对吴越地区有很重大的影响。吴和越本是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起来的诸侯国“它们的统治者，虽是中原统治者的后代，但其老百姓则是东夷和百越等族。在吴、越立国时，两国的主体民族本来就比较接近，而在吴越发生战争的年代，其民族及语言的交流、融合也相当强烈。伍子胥辅吴时，吴越两国人民所操的语言已十分相近或相同，故有《吕氏春秋·知化》中说的“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俗，司俗同，

言语通”的情况出现。所以，先秦时期吴与越的方言可以合称为“吴越语。”这个吴越语在战国时期受到楚国语强烈的影响，但它们之间虽然接近，毕竟仍有不同。这个吴越语就是后代吴语的基础，而楚语则是后代湘语的基础。

北方的秦、晋、燕、赵等方言，在发展中也逐渐趋于一致，彼此融合，形成后来的北方方言。在秦汉以后的发展中，北方方言还时有向其他地域传播的机会，如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汉语大规模地传入吴语地区，大大改变了吴语本身的语言结构。大量的中原汉语的词语和语音、语法特点融入吴语当中，吴语已非周秦时代的吴语。另外，由于中原汉语的传播，使扬州及建业等地从操吴语而逐渐变为操北方话。所以晋人葛洪《抱朴子·外篇·讥惑》有讥笑吴人学习北语的评价。马融《国学概论》也有“中原古语，至晋时已输入江东”的说法。后代的传播则更多更广。

由于北方方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向各地传播，造成了北方官话流传极广的局面。因此，北方方言还有北方官话、西南官话、西北官话和下江官话的划分。

北方官话概括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方言。这个北方官话区是汉语共同语流行的中心地区。河南从东周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方言成为“成周国语”的代表，是先秦时期各国诸侯朝聘会盟时所使用的“雅言”。在后代共同语不断扩展、传播的过程中，北方其他方言区逐渐与之接近，其影响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形成了广大的北方方言区，它本身也成为历史上许多朝代汉语共同语的语音代表。

西南官话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这些地区本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带，汉人的大规模移入，主要发生于近代。明人沐英平定云贵地区，北方话才大规模传播开去。至于西北官话，其形成的历史年代当然较早，秦语是它原有的方言基础。宋人笔记中多次提及“秦语”及“西语”，而且早在唐代，长安一带的方言颇具特色，一些韵书（如《韵英》）已把秦音作为描述和研究对象。但是在近代，仍有大量的外地居民移入。如明代中叶，大批的湖广居民迁至秦岭、大巴山一带，使当地方言增加了一些新的外来的成分。这些不同因素的混合，使秦地方言形成了后代的“西北官话”。

下江官话又称为江淮方言，流行于安徽、江苏等地。这些地区本属楚语或吴语区域，但在晋代以后，中原汉语传入建业（南京），南宋时宋室南渡，又把汴洛方言带至杭州，这就使这一带的方言也变为使用北方话，北方方言区也扩展至江南一带。

吴语是秦代以前出现的方言，它的流行区域和语言结构本身历经变动。它受楚语很大的影响，在汉魏晋时期，吴语已经成为一支很重要的方言。三国时孙权活动于江东一带，用的已是吴语。晋室南渡，大将军王导也学习吴语以联络吴人。汉魏乐府中，吴歌已是一种重要的民歌。但因吴地居民的流徙较大，吴语不断与中原汉语融合，其语词及语音特点有很大的变化。南北朝以后，吴语的发展才略呈较为稳定的局面。

吴语流行于吴、越地区。古代的福建和广东东部本属百越的“闽越”部分，这个

地区长期统属于吴越，吴语不断向南推移、传播。后代出现的闽方言，实际上就是吴语南移分化出来的。当然，闽方言也受到北方地区汉语强烈的影响，吸收了许多中原汉语的语言成分，但其方言基础应是吴语。现代闽语的语词有很多与吴语相一致就是证明。当然，由于自周代以来楚方言在南方有广泛的传播，不管是吴语还是闽语，又都受楚方言强烈的影响。

楚语本流行于河南南部、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春秋战国时已形成一支重要的楚方言。《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当时已有“楚言”的流行。战国时，楚方言已很出名，常与夏语并称。“音分楚夏”成为一般的惯用语。楚语形成之后，不断向四面传播，除向东传入江东地区，影响吴语之外，更重要的是向南传播，其范围远及湖南、江西和广东。广东本属南越，为少数民族地区，本无汉族居民，当然也就没有汉语方言。后来广东受楚人统治，楚方言也随之流入广东。后来出现、形成的粤方言，就是楚语南移的结果。

粤方言的形成，过去一般认为是秦始皇派兵戍守五岭，北方军队带来中原汉语在广东传播的结果。但笔者以为，秦军南来，传播北方汉语，可能对粤方言的分化、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楚方言长期不断的流传。现在粤方言中保存许多与楚语相同的语词和其他语言特点，都说明它们两者的密切关系。楚语传入粤地以后，再加上中原汉语的传播，使粤方言在不同时间层次接受了来自汉语多方面的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形成一支

强固的粤方言。

因此，可以这样说：吴语南移的结果，造成了闽方言的分化；楚语南移的结果，造成了粤方言的分化。

楚语除向外地扩展之外，本身也不断巩固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方言，而且对文学语言产生重大的影响。除“楚辞”表现了这一点之外。汉代的“楚歌”也颇具特色，刘邦、项羽都是善于唱楚歌的人物，“四面楚歌”成为有名的典故。楚歌对中国汉魏时期出现的乐府有很重要的影响。荆楚地区使用的“西曲”与江南使用的“吴歌”都是著名的民歌，都保存和反映了楚、吴方言的某些特点。

楚语的流传沿续成了后代的湘方言。湖北本地也属楚方言区，但因地处冲要，为中国南北来往必经之地，人口的流动很大，该地区使用的方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以致楚语被北方的方言所代替。湖北大部分地区使用西南官话，只有湖北东部有二十多个县至今仍保存“楚语”的流行，这个楚语已与湘语不很相同。湘方言可以说是古代楚语的一个支系，它流行于湖南的中心地带。杨雄《方言》中常常提及“南楚江湖”，这说明该方言也有长远的历史。现代的湘方言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有新派与老派湘语的区别，前者以长沙、株洲为表代，后者以双峰、衡阳为代表，流行于沅水、湘水地区。显然，这个老派的湘语，更多地保存楚语本身的语言特点。

江西省本也是楚语流行的地区，但因它地处楚、吴、闽三个方言区的交会处，而且为中国南北地区的通道之一，历代重要的人口变动，许多都经由江西进入福建、

广东一带。它本身的人口迁徙也很突出，因此，它的方言变动也比较大。现代流行于江西的赣方言，没有太突出的个性，既有同于北方方言的一面，又有同于客家方言和吴方言的一面，都是这种历史状况造成的。

客家方言是古代移民群体使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方言。“客”是客户的意思，它相对于土著的“主户”而言。客家的先民本居住于中原地区，后因历代战乱及天灾先后多次向南方迁徙。他们的南迁主要发生于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东晋的“永嘉之乱”，许多中原居民迁至福建、广东，一部分人则迁居至长江流域；唐代黄巢起义时，中原地区又发生离乱，本来居住在河南、安徽一带以及东晋时南迁至湖北、湖南、江西的客家先民又再进一步向南迁徙，远的进入福建广东的东部地区及粤北，近的进入江西中部和南部。进入广东的，先在韶州一带定居。唐代广东各州人口较之隋朝增加了三十倍，而增加最多的是韶州，这与唐时开凿了大庾岭新路和武水的逐渐利用，便于人群进入粤北地区有关。到了宋代，大量的客家先民又从福建的西部和江西的南部进入粤东和粤北地区。宋时，广东的户口有“主户”和“客户”之分。据北宋《元丰九域志》的记载，客户在当时广东各地的户数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广州地区，主户为64796户，而客户则有78465户，其他各地也多是如此。客户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客家的先民。到了宋末，蒙古人攻打宋室，有许多江西、福建的居民又进入广东，主要入居兴宁、梅县一带。他们所用的方言，本是中原汉语，由于他们首先迁至长江流域，

与湖北、湖南、江西一带的方言相处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接受了这些地区方言的影响，产生了与原来北方方言的差异；宋代，他们又向南迁移，脱离了湖北、江西等地的方言，在南宋以后，又按着本身的语音规律发展，产生了与这些方言的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客方言比较接近于赣方言，也比较与北方方言靠近。

元明以后，广东地区的客家人又进一步迁移到四川、台湾、广西、湖南及广东的西部地区，这就加强了客家方言在各地的传播，使客方言的流传范围增至九省之多。

就各种方言之间的关系来说，北方方言区是汉语传统的发源地，后代各地方言的分化、发展都与它有关，它是各种方言的源头。在形成广大的北方方言之后，由于彼此交往极多，人口变动大，语言的融合频繁、快速，所以各地方言的一致性越来越多。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所说的“四海同音”的现象越来越显著，其发展也最快。近几百年来，由于以北方口语为基础的近代白话作品的传播，北方话区在词语、语法方面影响更大。

楚语是华夏化最早的一支方言。它的基础来自黄河流域的诸夏语言。在它形成之后，向东扩展，对吴越地区产生强大的影响。吴语的形成与它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在战国时期向南推移，促使粤方言的分化和形成。楚语在本土的发展成了后代的湘语。

吴语出现之后，再向南传播，又变成了闽语。闽语可以说是汉代以前的吴语。它反映的上古汉语的特点很多，可以说是中原汉语在这种方言中的间接表现。

赣方言和客方言是较晚近的年代由中原汉语移植过来的方言，它们均与北方方言较为接近。所以清代学者陈澧说：“客音多合（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中原音韵》反映的是宋元之际中原地区共同语音状况。）当然，客家方言的主要部分处于广东东部，它与粤方言、闽方言在地域上犬牙交错，彼此的影响也不少。其中也接受了粤、闽方言的一些词语。由于客家人居于山区，与当地原住的畲族居民杂处，它对畲语又产生影响，致使粤东的畲语完全接受了它的语音系统。赣方言因为位于江西，与楚、吴以至粤、客都有接触，彼此也有一些影响。

二、各方言的语音特点

现代汉语各种方言都有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但其语音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古代汉语语音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当然，由于某些方言的发展更快，变动更强烈，即使是本来很有关系的方言，也可能呈现出越来越疏远的一面。但从总体来说，关系密切的方言，其语言特点的相近之处就越多。

各个方言使用的词语和语法规律由于受到汉语书面共同语的影响很多，除口语中所使用的某些特殊的语词外，大多接受了共同的书面语词。因此，各方言在词语和语法上的差异就不如语音方面显著。当然，词语方面也多有方言的特色。南方方言在词语方面的共同特点是保留古代词语比较多，而吴、粤、闽等方言由于处于海岸线附近，与国外、外族交往较多，在近代时期，也分别从英语、印尼马来语等借用了一些外来语词。

下面着重谈谈各方言在语音方面的异

同情况及主要特点。

(一) 声母方面

1. 有无全浊音声母：吴语保存有d、b、g、dz、dz、v、z、ʃ等。湘语在变化，老派（以双峰、衡阳为代表）有，新派（以长沙、株洲为代表）则失去，读为不送气清音。北方方言、粤方言、客方言、闽方言、赣方言都失去全浊音，但变清音的情况不同。北方话的平声字变送气，仄声字变不送气。粤语平、上（如“似、舅、伴、淡”等）送气，去（包括浊上变去者）、入不送气。闽南方言读书音与北方话大体相同，但说话音多读为不送气。赣客方言则平仄都读送气。

2. 知照组声母是否读tʂ等：北方方言绝大多数地区有tʂ-ts-tʂ三组的对立，知照组读tʂ组。西南官话大部分没有，只四川的西南角、东北角和云南有ts-tʂ之分。西北官话（如西安、兰州）将知照组字读为pf（如“猪”）、pf'（如“除”）、f（如“书”）。其他吴、粤、赣、闽、客都没有tʂ组声母（客家少数地区有，如兴宁、大埔，且可与i相拼）。

3. 日母字的读音：北方方言多读为z，东北读l，山东读零声母或l，湖北读为v，西北官话读v，客方言读ŋ，闽语读n或z，粤语读j，各地的读音颇多参差。

4. 是否n-l不分：北方方言大多数地区分清n、l。西南官话除云南外，都混而不分。下江官话也两者混同。粤方言有些地区混，有些不混。闽方言少数有混读现象。湘、赣方言在洪音之前相混，细音不混。

有些地方将l读近于d（如广州郊区）。

5. 唇音声母的读法：闽方言无轻唇

音。客方言有些轻唇音字读为重唇（如“缝、冯、坟、符、肥”等），粤方言也有少数字读重唇。微母字粤方言读m，与明母无别；客方言读V。

6. 舌、齿音字的读音：闽南方言多数字舌头音（端组）与舌上音（知组）没有区别。客方言此一现象亦存在而较少。粤方言中台山以西一带把心母读为边擦音ɸ。台山方言的端母失去读为ʔ，透母字读为h。粤语吴川、化州一带以至广西一部分地区把精组字读为t。赣方言的临川话t与l有混读现象（如“临”tim）。一些章组字闽南方言读为k等（如“技、指、齿”），湖南涟源方言也有此现象。

7. 鼻音字的读音：粤方言许多地区（如广州郊区）以及山西文水、湖南某些地方将m、n、ŋ读为mb、nd、ng，闽南方言读为b、d、g。粤、闽、客m、n、ŋ一般可自由成音节。

8. k组声母的读音：北方方言大部分地区，k组在i前腭化为tɕ组。吴、湘、赣也有此现象，粤、闽、客则没有。k组声母多数发生腭化的地区ts组也腭化为tɕ组，吴方言则tsi与toi有分。溪母字粤方言变为h或f。

见组中的疑母ŋ，大多数方言已消失，闽方言保存着，四川官话也有。客方言读为n。粤方言在细音前消失，洪音前保存。

中古的晓母字西南官话（如四川）湘方言、客方言、以及粤方言一些地区都混为f。匣母字有一些字闽南方言保存读k（如“侯、猴、厚、糊、行、寒”等）。

(二) 韵母方面

1. 有无长短音的区别：粤方言有ai v的区别。

2. 单、复元音之间的转化：北方方言中的多元音韵母，吴方言有单音化的倾向，ai、ei、au、ou变为a、e、ɔ、ɤ。兰州也有这种现象。相反，粤方言则有将一些单元音化为多元音的倾向，如i-ei，u-ou，y-θy等。

3. 有无撮口呼韵母：北方方言有撮口呼韵母y、ye、yan等。西南官话的云贵地区没有，下江官话多数也没有。闽南、客家没有。吴方言有，湘方言则很多。湖北省东部的楚语还有圆唇舌尖后元音ʉ。粤方言有撮口呼，而且圆唇元音十分丰富。

4. ən-ən、in-in的分混：在长江流域大多数方言中都混而不分，西南、西北、下江三种官话以及赣、客都混在一起（多数为n尾）。

5. 有无鼻化韵：西北官话、西南官话的云南、桂北和下江官话、吴、湘、闽南方言都有鼻化韵，湘、闽特别多。

6. 韵尾的存废：有的方言韵尾很丰富，如粤方言，有七种，其中有y尾。粤、客、闽南话基本上保存-m、-n、-ŋ三种鼻音韵尾。大多数方言中，-m尾已消失，只有-n、-ŋ两种鼻音韵尾。吴语和闽东（福州）只有一种-ŋ尾。中古的入声-p、-t、-k韵尾在粤、客、闽南都较好保存

着。赣语只有-t、-k韵尾。山西话、吴语、福州话只有-ʔ韵尾。闽南除-t、-k、-p尾外，也有-ʔ韵尾。一些方言有入声而没有入声韵尾。

（三）声调方面

1. 声调类别的多寡：北方方言区由于丧失入声，而且上、去不分阴阳，所以调类较少，一般只有阴平、阳平、上、去四个声调，有的地方只有三调。东部和南部汉语方言声调类别较多。下江官话多有六七个调（皖南六个，南通七个）。鄂东的楚语有六个调。吴语一般也有六七个调。赣、客一般是六个调。闽南、闽东多达七八个调（四声各分阴阳两类）。粤方言则多至九调（或十调、十一调）。

2. 入声存亡与否：北方方言地区绝大部分失去入声。河北、安徽、湖北以及贵州部分地区有入声而不收塞尾。山西及吴语区入声收-ʔ尾。四川西部岷江流域和川南一带有入声，川东、川北、川中则没有。鄂东的楚语及湘语也有入声。闽、客有入声，且多分为阴、阳两类，粤语则多至三四类。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在语法研究中运用一点数学

沈开木

数学是从量方面反映客观关系的规律性的科学。语言符号同语言符号的客观关系有客观的规律性，而且存在一定的量的关系，所以语言的语法研究中可以运用数学。但数学的内容十分广泛，而参加组合的语言符号本身难以量化，所以在语法研究中运用数学，只能运用一点点。

在语法研究中运用一点数学，有如下好处。

一、帮助转换生成语法的建立。

转换生成语法是继承结构派语言学的层次分析法(有所改进)，又加上数学的观点而产生的。转换生成语法中所使用的增加、合并、删除和变换，就是在运用数学运算规则。例如： $a^2 - b^2$ 可以等于 $a^2 - ab + ab - b^2$ ，中间两项就是增加； $(a - b)^2 = a^2 - ab - ab + b^2 = a^2 - 2ab + b^2$ ，其中 $-ab$ 、 $-ab$ 成为 $-2ab$ ，就是合并； $(a - b)(a + b) = a^2 - ab + ab - b^2 = a^2 - b^2$ ，中间等式的 $-ab$ 跟 $+ab$ 抵消，就是删除；

$\frac{1}{2} = 0.5 = 50\%$ ，就是变换。

二、指导认识语法现象，使研究深入。

语法研究，向来有哲学指导、逻辑指导和语言学指导。这些指导都是很必要的，而且行之有效。但是，如果得到数学

的指导，语法研究会更深入。例如：人们在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的指导下，从大量语言事实中归纳出：副词“也”字表示“同样”，修饰动词、形容词，作状语。我们从下列现象：①“你去，我也去。”②“我看戏，也写戏。”发现“也”字可以“指向”前面的实质性成分（如：例①的主语），也可以指向后面的实质性成分（如：例②的宾语）。于是，数学中组合的知识指导我们去弄清：（一）“也”字是不是可以指向任何一个实质性成分？（二）“也”字能不能同时“指向”两个或更多个实质性成分？根据数学指导，我们又有重点地搜集、补充了一些语言材料，并且发现了当一个句子有几个实质性成分时，“也”字可以只指向一个实质性成分，产生几个伴随句（伴随句不出现时成为潜在义，因而可以产生几个潜在义），也可以同时“指向”两个或更多个实质性成分，从而使我们发现了“也”字产生潜在义的规律，发现了现代汉语歧义的新品种，并且“提供了一种新的语境歧义分析‘法。’”（邵敬敏，评《语法研究和探索（二）》《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后来，我们在研究“不”字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时候，又碰到类似的问题。数学中组合的知识又一次指导我们认识语言现象，顺利地解决

问题：“一个‘不’字句有几个实质性成分（‘不’字除外）就可以作一项变换（获取一个中心），产生n个前提。例如：(75)‘他不赞扬新选出的局领导’。这里除‘不’字外有n=6个实质性成分，作一项变换，就可以产生n=6个前提。”变换了“他”，便成为“别人赞扬新选出的局领导。”又逐个变换“赞扬”、“新”、“选出”、“局”、“领导”，便成为“他批评选出的局领导”、“他赞扬上次选出的局领导”……“也可以作两项变换，得到 $C_2^2=15$ 个前提。”⑤“还可以作三项变换、四项变换、……n-1项变换，得到 C_2^3 、 C_2^4 、 C_2^5 、…… C_2^{n-1} 个前提。”（拙文《“不”字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中国语文》1984年第6期）

三、使问题得到全面的揭示。

有不少语言事实，凭直觉很难揭示得全面，只有运用数学，才能揭示得全面。例如：“哥哥、姐姐的同学、朋友”，可以由哪些组合方式叠合而成？哪些组合方式可以由哪些方式因素相加而成？这就不是凭直觉可以全面揭示的。我们运用数学中组合的知识，把每个结构成分看作一个组，“哥哥、姐姐”是一个组，“同学、朋友”是另一个组。组内含两个以上名词的看作多词项。由于组合时每组都得有词项参加，所以可以用 $C_2^1 \cdot C_2^1$ 来算出有4种组合方式。① $C_2^1 \cdot C_2^1$ ，② $C_2^2 \cdot C_2^2$ ，③ $C_2^1 \cdot C_2^2$ ，④ $C_2^2 \cdot C_2^1$ 。其中①可以由 $C_2^1 \cdot C_2^1=4$ 个方式因素组成：① $C_2^1 \cdot C_2^1$ ——哥哥的同学，② $C_2^1 \cdot C_2^1$ ——哥哥的朋友，③ $C_2^1 \cdot C_2^2$ ——姐姐的同学，④ $C_2^2 \cdot C_2^1$ ——姐姐的朋友。这四个方式因素相加=哥哥的同学+哥哥的朋友+姐姐的同学+姐姐的朋友，删去相同的词项，便成为第

一种组合方式。②可以由 $C_2^1 \cdot C_2^2=2$ 个方式因素组成：① $C_2^1 \cdot C_2^2$ ——哥哥的同学、朋友，② $C_2^2 \cdot C_2^1$ ——姐姐的同学、朋友。这两个方式因素相加=哥哥的同学、朋友+姐姐的同学、朋友，删去相同的词项，便成为第二种组合方式。③可以由② $C_2^1 \cdot C_2^2$ ——哥哥姐姐的同学，④ $C_2^2 \cdot C_2^1$ ——哥哥姐姐的朋友两个方式因素相加而成。

研究组合方式（包括构成组合方式因素），可以揭示方式性的多义。例如：上例就可以有四种方式性的多义（①、②本是同义异构，为了便于引进语用，权且看作多义）。也可以结合语用，揭示名词的所指物的个数。例如：① $C_2^1 \cdot C_2^1$ ，“同学、朋友”至少有四个，而④ $C_2^2 \cdot C_2^2$ ，“同学、朋友”至少有两个。更可以揭示某些组合方式所含的含混性。如上例，可以有① $C_2^1 \cdot C_2^1$ 的意思，也可以有② $C_2^1 \cdot C_2^2$ 、③ $C_2^2 \cdot C_2^1$ 、④ $C_2^2 \cdot C_2^2$ 的意思。这是很含混的。

四、便于计算。

对上文所举的“他不赞扬新选出的局领导。”有6个实质性成分，可以产生 $6 + C_2^2 + C_2^3 + C_2^4 + C_2^5 = 6 + 15 + 20 + 15 + 6 = 62$ 个前提。上文所举的“哥哥、姐姐的同学、朋友”有 $C_2^1 \cdot C_2^1 = 4$ 种组合方式， $C_2^1 \cdot C_2^2$ 这种组合方式有 $C_2^1 \cdot C_2^2 = 4$ 个方式因素，都是数学用于计算的实例。

五、可作论据，便于说理。

由于我们的语法学属于描写语法，描写时不说理；要说理，又不很容易。用数学作论据，便容易一些了。例如：“语段结构的层次性在语段‘非洲语言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清楚。”这个语言片段可以有两个意思：非洲的语言研究，非洲语言的研究。

……这种情况用数学式表现更为明显。比如：

$$6 + 4 \times 8 = 38$$

它符合运算先乘除后加减的运算规则。至于

$$(6 + 4) \times 8 = 80$$

则是由括号显示了它的层次。可见，任何一个复杂的语言片段，它的结构组织都是有层次的。”（吴竞存、侯学超《现代汉语句法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82年1—2页）本例是用数学作类比论证的论据。

又如：“①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转折）②但终于没有进学，|||（并列）③又不会营生，|（因果）④于是愈过愈穷，||（递进）⑤弄到将要讨饭了。”（1986年的初中语文第五册，144页。）初中课本对①②③三个分句的分析，不符合分配率。

这分配率是从数学引进的。数学里 $a(b+c) = ab+ac$ 就是运用分配率进行运算的。（其区别只在于，语义可以相加而不能相乘，此处是运算形式的类比。）词组〔亲爱的〕〔父亲和母亲〕=〔亲爱的父亲〕和〔亲爱的母亲〕的理解，也是运用分配率。与此相似，〔①〕（转折）〔②（并列）③〕应该等于〔①（转折）②〕（并列）〔①（转折）③〕。可是〔①（转折）②〕“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成立，而〔①（转折）③〕“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又）不会营生”不能成话。（要使它成话，应把①改为“孔乙己（虽）读过书”）可见不符合分配率。不符合分配率，便不符合逻辑（因为分配率是根据逻辑建立起来的）；这样把原文可以理解的东西分析成不可理解的

东西，便是分析不正确。

“其实①②③三个分句应当分析为〔①（转折）②〕（并列）〔③〕。”（拙文《关于几个多重复句的分析》、《汉语学习》1987年第6期）本例也是用为直接论据。

六、为揭示联合关系可以含有同位的语法性质提供一种佐助。

联合关系跟同位关系是两种不同的语法关系，但是联合关系可以含有同位关系的语法性质，这点是不容易发现的。我们是在用数学揭示名词多组多词项参加组合所形成的多义时发现的：

李明、张伟的同学、同事

有 $C_2^2 \cdot C_2^2 = 4$ 种组合方式：① $C_2^1 \cdot C_2^1$ ，② $C_2^1 \cdot C_2^2$ ，③ $C_2^2 \cdot C_2^1$ ，④ $C_2^2 \cdot C_2^2$ 。其中②和④的“同学、同事”，可以一个人是同学或同事，另一个人是同学兼同事。这时，联合关系（并列关系）的“同学、同事”便含有同位关系的语法性质。

进一步，我们便得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原来联合关系乃是符号同符号的关系，即语法的形式的关系，而同位关系乃是人同符号的关系，即语用关系。所以联合的语法关系可以在语用上表达一定的同位的关系。

七、为深入研究一些词语的用法提供一种佐助。

大家知道：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对八百词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细致。例如：

“分别”，〔副〕2、分头、各自、不共同，不一起。a) 一个主体对几个象。“为了弄清问题，他分别向老王、老李和老张作了调查。”b) 几个主体对一个对象。“会长和秘书长分别接见了

他。”……c)数目相同的主体和客体一个对一个。“老周和老陈分别当了主任和副主任。”

“一起”，〔名〕同一个处所。……〔副〕表示在同一个地点或合到一处。前边常有“同、跟、和”组成的介词短语。〔一同〕同副词‘一起’，多用于书面。一起：一块儿，用法相同。‘一起’常用于书面，‘一块儿’只用于口语。

为了方便，我们在这里把“一同”、“一块儿”看作“一起”的等价物。我们把“分别”、“一起”置于我们用数学揭示的名词多组多词项所形成的多义的基础上来考察。

(一)在多组多词项参加组合所形成的短语里，如果语义制约排除了多义，那么“分别”、“一起”具有强调分开进行或一块儿进行的作用。例如：

电冰箱、彩电(分别)增产了10%和15%。

我马上把书和杂志(一起)送去。
“(增产了)10%和15%”的语义已经表明：只能按排列顺序作对应，10%属于“电冰箱”，15%属于“彩电”。这时，语义制约已排除了多义。“马上……送去”的语义已经表明“书和杂志”是一起送去的，这时，语义制约也排除了多义。所以加上“分别”或“一起”都只起强调的作用。

(二)如果语义的制约没有能够排除多义，那么“分别”表示分开进行，“一起”表示一块儿进行，特别是表示第一组名词各项一块儿进行。它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排除多义。例如：

父亲、母亲会见亲戚、朋友。
有 $C_2^1 \cdot C_2^1 = 4$ 种组合方式：① $C_2^1 \cdot C_2^1$ ，由

$C_2^1 \cdot C_2^1 = 4$ 个方式因素相加而成：①父亲会见亲戚+②父亲会见朋友+③母亲会见亲戚+④母亲会见朋友；② $C_2^1 \cdot C_2^1$ ，由 $C_2^1 \cdot C_2^1 = 2$ 个方式因素相加而成：①父亲会见亲戚、朋友+②母亲会见亲戚、朋友；③ $C_2^2 \cdot C_2^1$ ，由 $C_2^2 \cdot C_2^1 = 2$ 个方式因素相加而成：①父亲、母亲会见亲戚+②父亲、母亲会见朋友；④ $C_2^2 \cdot C_2^2 = 1$ 个方式因素，〔父亲、母亲〕会见〔亲戚、朋友〕。用“分别”可以肯定①，排除③、④，但不能完全排除②。这是因为② $C_2^1 \cdot C_2^1$ ①父亲会见亲戚、朋友+②母亲会见亲戚朋友中第2组(C_2^1)还包含两个词项，表明“亲戚、朋友”是一块儿被“父亲”、“母亲”分别会见的。既然是一块儿被分别会见，所加进去的“分别”就不能排除② $C_2^1 \cdot C_2^1$ ，多义指数便还有2，便是不能完全排除多义。用“一起”，可以肯定④，排除①、②，但不能排除③ $C_2^2 \cdot C_2^1$ ，因为③的第2组 C_2^1 是分别进行的。当表达有特别需要的时候，“父亲、母亲(一起)会见亲戚、朋友”上面还可以再加上“分别”，成为“父亲、母亲(一起)(分别)会见亲戚、朋友”。这样一来，多义指数便还有2，便是不能完全排除多义。

我们再考察“分别”起作用的基础。“分别”加进① $C_2^1 \cdot C_2^1$ 里去，① $C_2^1 \cdot C_2^1$ 便成为它起作用的基础，它是一对一。“分别”加进② $C_2^1 \cdot C_2^1$ 里去，它是一对二。“分别”加进③ $C_2^2 \cdot C_2^1$ 里去，它是二对一。

综上所述，可知：“分别”、“一起”都有强调作用，也都有肯定一种、排除另一种的作用，但可能不能完全排除多义，“分别”起作用的基础，也可以不是一对一。

这样，对这两个词的用法的研究，便前进一步了。

在语法中运用一点数学，可能还有不少好处。笔者限于所见，未能尽举。但从所列这八种来说，已足见在语法研究中运用一点数学的好处了。

注：“C”是集合的意思。 C_m^n 的下标表示一个集合所含的全部元素（实质性成分、词项）的个数，上标表示每次组

合时取用的元素的个数。 $C_a^a \cdot C_b^b$ 的上标a、b分别表示取用的是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 C_m^n 的计算公式是

$$C_m^n = \frac{m!}{n!(m-n)!}。 “!”是阶乘。$$

例如： $4! = 4 \times 3 \times 2 \times 1$ 。当 $m = n$ 时，集合代数规定 $m - n = 1$ 。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中国古典风格学的形成及特色

吴承学

在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文学风格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源远流长，丰富精微，且自成体系，与西方风格学相比，颇具理论个性。可以说，中国文学风格学还是一座尚待深入挖掘的宝山。本文试图对其形成过程作些考察并由此讨论其理论特色。

中国古代的风格批评起源很早，在先秦诸子和经籍史传中已有大量对于文学艺

术风格的批评材料，而且古代的文学艺术批评从一开始就以风格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但早期的风格批评尚缺乏系统性；而且早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主要是民间的集体创作，所以在批评上人们往往只强调风格与时代和地域的关系，尤其强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政教状况对于文艺风格的决定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就是从各地的社会状况和艺术风格的关系上来评论的。早期的风格批评，几乎集中在时代风格和地域风格之上，至于创作主

体的个性对风格的决定作用，人们尚没有明确地意识到。^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当时的文艺创作中，艺术的创作个性尚未崛起，虽有极个别的诗人已具有创作个性，但还没有引起批评家对个性的充分发现和重视。当然早期的文学批评也重视创作主体，但重视的是人品道德而不是个性。

到了魏晋这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中国古代风格学才算真正形成。与西方风格学相比，中国古代风格学的形成和兴盛有非常奇特的历史原因。如果说西方风格学起源于修辞学的话，中国古代风格学则是在魏晋时代人物品评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一种完全非文学性的社会活动，导致了一场美学上的变革，这在世界的文学批评中，恐怕也是很罕见的。

汉代以察举取士，选拔人材，人物品评已成为风气。但魏晋的人物品评却由政治、道德的目的，变为对人物的才性与风神的鉴赏。由于儒教的衰落，人们更能突破传统教化的框框，更为注重考核人物的精神和才性。“才性之辨”就是当时清谈的重要论题。^②魏晋的人物品评有其特点，这就是由人的形象风姿入手品评其神韵。魏初刘劭的《人物志》就“主于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四库提要》）此书以“九征”即人的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来观人，“由形所显，观心所蕴”，以人物的形象作为品评的对象，于是人物品鉴就由实用转而趋向审美。

在《世说新语》中，人物品鉴艺术化倾向更是显而易见了，它对人物的品鉴已高于对人物风姿的描写之中：

世目李元礼颯颯如劲松下风。

王戎云：太尉神态高彻，如瑶林琼树，

自然是风尘外物。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赏誉》）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愧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人物描写和政治上或伦理上的实用目的并无关系。这些人物引起人们喜爱的主要并不是他们的道德品质，而是其风姿神韵；而这种人物品评当时之所以能耸动天下，甚至今日仍令人回味无穷，则主要因为其品评的艺术化。

文学艺术与人物品鉴双向地互相影响。一方面是人物品鉴的艺术化，从而增加了其感染力和形象性；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则在方法、形式方面吸取了人物品鉴的精髓，所以显得玄远和简要。从形式上看当时的文学批评和人物品鉴几乎完全相同。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具有把艺术形式拟人化的传统，批评家喜欢把艺术和人体视为“异质同构”，往往以人体结构来比拟艺术结构。刘勰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这里所言的“神明”“骨髓”“肌肤”“声气”“心肾”“筋骨”等，显而易见是借人体概念来比拟艺术的。至于文学批评上如形神、风骨、筋力、神韵等一系列美学概念，都是从人物品鉴移植到文学批评之中的，从而赋予了

艺术形式结构以人的生命。风格学上重要的概念：“体”，望而可知是把艺术形态和结构的总貌用人体来表述的。既然人体与文体是相似甚至相通，文学批评借用人物品鉴的方式便是十分自然的。

魏晋人物品鉴对于文学风格批评的影响大致有二。一、魏晋的人物品鉴，以超实用的审美观念，观照人物的风神个性之美，重精神而略皮相，推及文学批评，则着眼点从作品的伦理教化内容转向文学的个性精神，从而自觉地把风格美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如《诗品》对作品风格的把握已达到妙入精微的境界。如评以清刚、沈郁、繁密、自然、温丽、凄怆、清捷、华净、逸荡、美贻、妍冶、峻切、省净、绮密、紧健等等，假如把这些评语和先前惯用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温柔敦厚”、“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之类相比，差异是不难体味出来的。它的着眼点已超越文学艺术的教化德性而关注艺术的审美风神。这标志着古典风格学的重大进展。^③

其次，人物品评不但要求评鹭切当，还需要富有创造性的匠心独运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这种形象、凝炼、优美的语言形式本身便是足供玩味的艺术品。受其影响，中国古代风格批评，也喜欢以具象化和高度概括的手法，摹写和揭示作品的神采风韵。具象的批评使风格变得具体可感；而概括化的批评则一语中的，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无论是概括化还是具象化的批评，大多是用最简约玄远的语言对作品风格作整体性的把握，很少有详尽的理性分析。这种看起来直观直感的批评，绝不是信口开河，它离不开批评者的

反复吟咏、悉心体味，凝聚着批评者独特的感受和想象。如鲍照评颜延之和谢灵运诗：“谢公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南史》）钟嵘评范云、丘迟诗：“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品》卷中）这种品评准确、凝炼、形象、生动，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

二

把古代文学风格学的形成，完全归结于人物品评的影响，这显然过于片面和轻率。古代文学风格学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魏晋南北朝的批评家和作家都发现了艺术的某种特质，并且有意识地追求它——这就是文的“气”和“体”。如果说人物品评从外部给风格学提供了形式和方法；文的“气”“体”的发现，则是从艺术的内部促进人们对艺术风格本质的理解。

文气的发现是中国风格学发展的一大关键。在中国古代，“气”是个极重要的哲学观念。古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人也是由气构成的。《管子·心术下》：“气者，身之充也。”汉代人进而认为人的品质性格的美恶是由禀受的气所决定的。文学批评上的气论，渊源很早。在先秦已有人论及辞与气的关系。如《论语·泰伯》篇曾子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据朱熹解释，辞气就是“言语声气。”（《四书集注》）《孟子·公孙丑》云：“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但孟子所言的气主要是论道德修养的，和文学尚没有直接关系。

以气论文，始于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倡“文以气为主”之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

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在批评具体作家时，曹丕提出“徐干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典论·论文》）“公干有逸气”。（《与吴质书》）曹丕所言的“气”包含二方面意义。对于作者而言，“气”指其气质才性；就作品而言，则是艺术的风貌。“文以气为主”，指文章之气；“气之清浊有体”指作者的禀赋才性。人的内在的气，外发则为文气。文气是内蕴外化的整体表现，有风格的含义。如“齐气”指舒缓的文风，“体气高妙”指超越常人的高妙风格。“逸气”指奔逸的风格。曹丕认为人的禀赋才性有清浊之分，故为文有高下。清浊之气即禀于自然，文章的文气也取决于天赋，“不可力强而致。”

“文以气为主”之说，第一次把文气即作品的个性提高到最重要的地位，这标志着文学的个性风格论的形成。但在曹丕那里，文气的含义尚有些含混，到了刘勰则擘肌分理，明确地标明了决定作品风格的四要素即才、气、学、习。《体性》篇云：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涌，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曹丕认为作家的气决定了作品的风格特点，而气又是天生的，这就显得有些片面。刘勰所言的才、气、学、习四者则可

以分为两类。才与气属先天的禀赋；学与习属后天的修养。作家的才气固然有先天条件的高下之分，但后天的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影响其先天条件。刘勰既重视才与气，又强调学与习。在刘勰的风格论中，才、气、学、习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作者的创作个性。正因为有了千差万别的创作个性，才形成云谲波诡的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在古人用以称谓风格的众多概念中，资格最老又被普遍接受的，就是“体”。“体”原是人的首、身、手、足的总称。《说文》“体，总十二属也。”段玉裁认为十二属即顶、面、颐、肩、脊、尻、肱、擘、手、股、胫、足。（《说文解字注》）《释名·释形体》曰：“体，第也，骨肉毛血，表里大小相次第也。”可见“体”是人全身的总称。文学批评用于表示风格含义的“体”字，正来源于人体的概念。汉代班固已使用“体”来指艺术风格。《汉书·地理志》云：“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崕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这种“舒缓之体”也即后来曹丕所说的“齐气”，是一种典型的地域风格。魏晋南北朝批评也多从“体”立论。刘勰把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八体是八类风格。钟嵘《诗品》基本上是从文体上品评作家作品的。他评诗注重风格渊源，如评《古诗》“其体源于国风”，是指其风格来源于《国风》，而不单指其内容或文词的。又如评王粲“其源出于李陵”，评张协“其源出于王粲”，评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都是指其作品总的体貌风格的渊源所自。钟嵘评论具体作家，大多着眼于“体”，如评陆机“举体华

美”，张协“文体华净”，魏文帝“颇有仲宣之体则”，张华“其体华艳”。其它人也非常重视从作家作品的总的体貌来立论。如《宋书·谢灵运传论》评论汉魏文学的发展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把当时文章分为三体。至于创作上有意识地仿效前代名家诗歌的风格也是南朝文人的风气。南朝诗歌有拟古一体，专摹前人诗风。如鲍照有《学刘公干体》五首，《学陶彭泽体》一首。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更是广泛模拟古人名作的风格，故自序称“今作三十首，效其文体”。拟古诗从创作上看价值不一定很高，但从风格学发展的角度看，却有很大意义。它标志着作家对风格观念的自觉。因为模拟古人之体的前提是对风格的准确把握，所以首先必须具有高超的风格鉴赏力，然后才可能模仿。

“体”字最切近现代意义的风格一词。“体”有各种含义。它可以指文体风格，如《文心雕龙·铭箴》：“铭兼褒贬，故体贵弘润。”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诗与文体迥然不类，文尚典实，诗尚清空。”这里的“体”指的是各种文体由于表现对象、表现方式的不同，在总体上呈现出来的不同风貌，即文体风格。“体”也可指作家的艺术风格。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这里的“体”指的是由于作家创作个性不同而呈现的不同的艺术风格。“体”也可用于指时代风格。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这是指各个时代的

文学风格。④

三

以上我们回顾了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鉴和文学批评中“体”、“气”的发现，对中国文学风格学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人物品鉴的方式和人们对“体”“气”本质的观念，对于中国文学风格学的理论特色的形成有何影响呢？

首先，对“体”“气”的本质的理解影响了风格批评方法。“体”和“气”是整体性的，一般地说，它们不是具体地指艺术的某一部分，而是就全部艺术因素的总体而言的。《文心雕龙·附会》：“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可见“体制”（同“体”）是综合了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内容和形式因素的总和，就象人的“体”是由全身各部分所组成的。“气”和“体”一样是指整体的，但“气”比起“体”更为虚化，更是浑然不可分。这种风格整体性的观念影响了古代风格批评，使之大都采用直观神悟的方式，注重把握对象的整体生命，保全对象的气足神完，较少有周密细致的剖析。我们不妨引用一些例子：

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文心雕龙·通变》）

（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

是气象不同。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

这种批评是一种整体性的把握，而对构成风格的因素很少作理性的分析。严羽以“雄浑悲壮”为盛唐诗风下断语，遂成千古定案。他并不全面分析这种风格产生的原因，诸如盛唐的政治、文化、经济对于盛唐诗风的影响。但谁也不能否认以“雄浑悲壮”论盛唐诗是对其本质和总体的准确把握。相比而言，西方的风格批评显然比较注重风格的分析。如古罗马朗吉弩斯《论崇高》就力图找出崇高风格的因素。他以为构成崇高风格有五种因素，即“掌握伟大思想的能力”，“强烈深厚的热情”，“修词格的妥当运用”，“高尚的文词”和“把前四种联系成为整体的”“庄严而生动的布局”。《论崇高》一书就是按照这五种崇高因素的顺序来讨论的。西方传统的风格学和修辞学有不解之缘，它是在古代修辞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自然十分注重对于语言运用和表现技巧的研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于风格学（stylistis）下了简明扼要的定义“对于表达风格的语言手段（如修辞格和句法模式）的研究。”^⑥与中国风格学的直观神悟，注重整体而比，西方风格学对于语言形式的分析显然细密得多。当然不可把这种差异推向极端。因为中国古代风格学并不是完全抛弃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尤其明清评点之学兴盛之后，对于语言、技法的分析还是相当细致的。而桐城文派倡言的“因声求气”之说，从作品的“格律、声色”来求其“神理、气味”，更是开拓了风格分

析的一大途径。

其次，在古人看来，“体”与“气”的本质特点还在于其个体的表现性。文气的发现也就是个性的发现。曹丕认为气是天生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见气是一个独特的个性，不可复制。而“体”也是难以摹拟，不可重复的，所谓人各有体，就是强调“体”的独创性。体与气是内在个性的表现，刘勰认为“体”是由“性”决定的，“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宋濂说：“诗，心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⑦我们要注意到，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格（体、气）是一种表现形态，而这种表现形态是由作家的人格、修养、学识和个性等因素决定的。“文如其人”这个命题在中国古代包含了两方面涵义：一是创作个性决定了艺术风格；一是人品决定了文品。这个命题十分复杂，它不是纯艺术问题，它已交汇了美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所以古人论“文气”，往往综合着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可以说，中国古代风格批评特别注重艺术的内在品格，强调作家创作主体包括艺术个性与道德人格，而相对忽略外在的形式。刘熙载《艺概·文概》：“诗格，一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不肖也；一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贫富贵贱也。”这就是说，文学的内在“品格”较之外在“格式”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起源甚早，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才真正形成体系。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物品鉴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人们发现的艺术的特质“体”与“气”。人物品鉴和

“体”“气”的发现还影响了风格批评的方式，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形成了注重整体把握，直观神悟；注重艺术的内在品格，强调创作主体，而相对忽略外在形式的理论特点。

- ① 参见拙作《江山之助》一文。载《文学评论》90年2期。
- ② 参见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释《体性篇》才性说”。

- ③ 参见拙作《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历史发展》。载《文学遗产》90年1期。
- ④ 参见王运熙先生《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一文。收入《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一书。齐鲁出版社出版。
- ⑤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卷三。
- ⑥ 《宋文宪全集》卷十六，《林伯恭诗集序》。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论宫体诗的“出位之思”

李希跃

“出位之思”是宫体诗所追求的美学效果之一。尽管诗与画号称姊妹艺术，如宋张舜民所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①古希腊时代的西蒙底斯也有类似的说法：“画是静默的诗，诗是语言的画。”^②然而实际上诗画各有特点和特长，要达到彼此交融的效果，还是有许多限制的，陆机就说过：“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③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要用语言文字描绘物象，限制很多。如果试图跳出文字本位以达到传达图象的目的，这就是钱锺书所说的“出位之思”：

材料固有的性质，一方面可资利用，给表现以便宜，而同时也发生障碍，予表现以限制。于是艺术家总想超过

这种限制，不受材料的束缚，强使材料去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譬如画的媒介材料是颜色和线条，可以表示具体迹象；大画家偏不刻画迹象而用画来“写意”。诗的媒介材料是文字，可以抒情达意；大诗人偏不专事“言志”，而要诗兼图画的作用，给读者以色相。诗跟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这种“出位之思”，当然不限于中国艺术。若照近代心析学派的说法，艺术家的挑选某种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根本是“出位”的心理补偿。^④

这种现象，也有人称之为“艺术换位”。^⑤为什么宫体诗会出现这种奇特的“出位之思”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当时文学追求形似的结果。写实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最早的《诗经》就已具有这种写实精神，但自觉地把写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目标来追求，且为这种追求寻找到哲学依据，却是魏晋时期的事情。在魏晋清谈的“言意之辨”论题中，人们开始注意到言、象、意的关系。如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言为象之代表，象为意之代表。因此，“立象”就成为达意的重要手段。这种观念，对六朝文学思想影响很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综述这一时代文风时曾谈到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潮，乃是“文贵形似”。钟嵘在《诗品》中则进一步提出了“巧构形似之言”之说。当然，他们所论均系对山水诗而发，然而只要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脉络有所了解，则不难发现，写实精神是贯穿始终的。山水诗的出现，是玄学盛行之后的产物。要描绘大自然的崇山峻岭、云乡水桥、霞影泉声、修竹茂林，诗歌精确描绘客观景物的技巧必然会受到重视。从“形似之言”的发展线索来看，谢灵运的山水诗多长篇，取景纯从大处落墨，尺幅之中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花卉云石统摄于一体；至鲍照，其诗视角有所缩小，对山水不再作全景式的摄取，而只着力于择取山水之一石一木、一波一浪刻意描绘，且已开始从山水旁及珠帘妆奁、丝竹管乐以及人物神态。至谢朓诸人的创作，把山水的题材由谢灵运的奇山异水、

高山大川移至寻常景致、园亭殿阁，把对大片江山的描绘转为身旁琐物的刻画，使生活周遭的环境、物品、人物皆可入诗。取景的角度愈来愈小，但描写的对象则愈来愈广，从山水而云石，由茂林而花卉，直至镜台、灯烛，至宫体更涉及到人体的各个细部及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广泛的描写对象与特写式的形象呈现，既为诗人提供了创作的锻炼，也使追求纤毫毕现的写实技巧得以提高。在宫体诗人笔下，写实精神得到发扬光大，描写手法真正称得上是繁富细腻、曲尽幽微，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诗歌语言的质性。正如柯林伍德所云：

材料不是被动的承受艺术家的活动，任艺术家处理。由于它本身具有自然美，因此只适于特定的处理方式；这个顽强性，虽是劣等艺术家的障碍，却是杰出艺术家的灵感源泉。⑥

宫体诗作者不愿向媒介的这种“顽强性”屈服。“形似”就艺术的类性而言，应该是绘画的属性，然而在艺术精神觉醒时代的诗人偏偏要向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试作挑战，结果反而将语言的潜在特质表现出来了。他们使得中国诗歌语言系统不但具有音乐性，而且又附以绘画性，可知诗歌追求“形似”的结果，便是导致诗歌语言走向“诗中有画”的绘画性。由于汉字属表意文字，开始多为象征字，线画之间即能组合成图。刘勰《文心雕龙·炼字篇》就说过练字不但要练意，更要练形。可见汉字原本就具有图画性。其次，中国诗歌讲究句子的对衬排列，除在视觉上予人形式的美感之外，在意象与意象之间，诗句与诗句之间，以至文字与文字之间的

空隙也产生一种特殊的美感，这是一种由空间所带来的想象的美感。正如国画中所虚留的空白所形成的流动暗泛的效果一样，各种感觉在其中交相灌注，各种意象在里面游移悬宕，构成丰富的意蕴。这种意象组合的空间感，与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有共通之处，而较足以表现自然物象之间空间美与对称美的，则是宫体诗人大量采用的高度内敛凝聚的五言诗体式。再次，中国诗歌语法简炼活泼，在组合语句时，乃可以有颠倒错综的种种伸缩变化的弹性，且主语与动词谓语常可省略，使物象的客观性得以强调，有些诗句甚至纯粹就是客观景物的罗列，可以在极简短的句子中表现出极丰富的造型材料。上述这些语言上的潜力，在“形似”的潮流中被充分地激发出来，可见，“诗中有画”实是“形似之言”的一大贡献。

第二，由于尚美精神的泛滥，对形式美的追求在诗歌中受到高度重视。六朝是一个崇尚美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各种各样形式美的时代。西亚传入的新文化不仅带来了佛教，还带进许多中国人未曾体验过的事物。音乐上所谓的胡乐，带来了新的音乐表现形式；绘画雕刻上也传入中亚以及更远的印度风格。流风相尚，人们在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中无不流露出强烈的嗜美心理，而对人体之美的重视更属空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曹操有“床头捉刀”的轶事；言尚玄远的玄学家许允有娶丑妇不肯入房的笑谈；志大才高的文学家阮籍有醉卧沽酒美妇垆侧之举动。从《世说新语·容止篇》的记载可知，六朝人刻意美化形体，他们衣竞华丽、傅粉施朱。昂藏七尺男子，亦多效女子之涂脂抹粉。与以前不同，六

朝所崇尚的是一种女性化的阴柔之美，社会上极端崇拜的美男子，大都是脂粉味十足的小白脸，故时人多形容美男子为“玉人”、“连璧”、“琳琅珠玉”。宫体诗的产生，从审美意识和社会思潮来说，正是时人极端崇尚女性美的一种表现。这种纯粹的审美态度及其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影响到文学创作，即产生了唯美一派。在六朝，以诸葛亮卧龙之姿，人或怪其“文采不艳”；^⑦以王充博辩之才，人则病其“属辞比义不尽美”^⑧。在这种文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宫体诗，便特别讲求技巧与形式之美，其创作追求韵律铿锵，对偶精工、设色秾丽、词采葱蒨，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术文学”。^⑨它不但在文学表达之技巧上出神入化，也使中国文字的形、音、义三者之美得以充分展现。因此，当讲究形似的文学思想与追求摹态逼真的写实技巧相合，再以人中最宜于艺术的女性为题材时，^⑩便使得文学的“美术性”表现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第三，绘画艺术的影响。六朝的绘画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出现了顾恺之这样的大画家。从现存资料来看，中国绘画的发展，在六朝时期，是以人物画为主流，真正的山水画还处在萌芽阶段，现在几幅传称顾恺之画的古摹本，山水的成分还很少，只有《洛神赋图》中描绘的山水树石背景较多一些，但仍以人物描写为主。人物画在汉代就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六朝画家于此更有突出的贡献。从《世说新语·巧技》与《颜氏家训·杂艺》的记载，可知当时的人物画技法已颇为高超，尤其是在形似方面几可乱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人们在品评人物与观察物色时，往

往联想到重视鲜明具体形象的绘画艺术，而用“如画”来概括对象予自己的感受。“如画”这一术语，到了文人手中成为美的代称，而将描写对象视为绘画艺术来品评，这也是六朝人审美的一个特征。如左思《娇女诗》：“其姊字惠芳，面目粲如画。”王僧儒《至牛渚忆魏少英》：“枫林暖似画，河岸净如扫。”庾肩吾《和太子重云殿受戒》：“连阁翻如画，图云更似真。”傅绎《杂曲》：“一娇一态本难逢，如画似花定相似。”文人普遍采用的“如画”所代表的美，实际上指的是形象鲜明，这也是当时文人由于受绘画艺术的影响而对文学作品提出的一个新的美学要求。事实上绘画与文学在重视形象的鲜明性具体性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因此，二者在理论上也常相互影响。谢赫《古画品录》论画的六法中有“应物象形”之说，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则有“写物图貌”之论。对绘画艺术的体悟，深深地影响着诗人对诗的艺术性的追求。绘画艺术所特有的描写的客观性与叙述的空间性的特色，当时也被诗歌借用过来。诗人们也懂得借着意象来创造瞬间的停滞状态；结构上善于经营位置；炼材上善于捕捉形象与创造形象；语言上精于对物象的声光色态的摄取融合。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打破依时间进行阅读的习惯，从而创造一个空间逻辑的叙述结构。因此，诗与画的融合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事实上也已证明这一点。总而言之，在六朝，绘画的成就无疑深深地影响到文学界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当时文人们常以诗画类比，正暗示着某种不安与欲求。

最后，从宫体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宫体诗人特殊的美感观照，正是要追求一种

静态的图画效果。象《美人晨妆》《美女篇》一类宫体诗，其中的女性形象不具任何道德、伦理、精神的负荷，只是作为一种自足的感官之美的客观存在，完全是以其外在之美而具有独立的价值。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之艺术》中说：“正如画家的作品，诗人的作品也一样；有的作品较耐看，可就近玩味其细节，有的则较宜远观；有的作品喜欢身处黑暗的角落，有的则想让人在强光下看到它，因为它不怕批评家吹毛求疵；有的只能取悦一次而已，有的却是历久弥新，愈看愈有味。”宫体诗所追求的，显然是“愈看愈有味”，这样才能符合其有别于其他性饥渴者的精神需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宫体诗人特殊的美感态度，也清楚了宫体诗的艺术追求——图画式的美感造型。

二

从上述四个方面，我们阐述了宫体诗的“出位之思”形成的原因，可知这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乃是文学发展演进的总体趋势与群体作家的艺术追求相结合所出现的必然现象。那么，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宫体诗人是怎样创造出这一独特的艺术效果的呢？粗略说来，其主要的艺术技巧有：

刻画入微 由于宫体诗题材狭窄，因而其目光极为专注，观察十分细致，且描写的对象又多为其极为熟悉的宫中女子，写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再说写实技巧发展到宫体诗盛行时已颇为熟悉繁富，因此在对物象的精雕细刻上很有功力。譬如沈约的《少年新婚为之咏》一诗，题为咏少年新婚，洋洋三十四句，实则除末段八句

外，全篇都在写“丰容好姿颜”的“山阴柳家女”。从她的鬓发、眉黛、红唇、腰肢、足趾、肌肤、到花钗、罗襦、薄衫、绣带、裙裾、锦履、乃至画扇、青铜镜、合浦珠等，在姿容、服饰、器用各方面逐一细细描绘、层层刻画，又以古代美人赵飞燕、秦罗敷相比拟，真可谓描写详尽、写实入微，使一个佳丽的形象鲜明地浮现于读者面前。这种客观而写实的技法，正是《文心雕龙》及《诗品》所称的“巧言切状”和“巧构形似之言”。再如简文帝的《美女篇》，写美女的形态情韵，贴切密附，堪称绝妙。清黄子龙《野鸿诗的》云：“简文纤细不必言，而雕绘处亦人所不及”，此诗可作力证。由于诗中只着眼于女性的感官美以及感觉性的想象与暗示，所以呈现出来的只是一幅刻画入微的静态的美人图。总的来说，宫体诗“功在密附”、“巧言切状”、“曲写毫介”，⑩与“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⑪的审美趣味是一致的，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设色敷彩 现实世界是个彩色的世界，要如实地再现这个世界，自然离不开色彩。谢赫《古画品录》中论画的六法之第四法，便是“随类赋彩”，可见“赋彩”是真实地描绘物象的必要手段之一。在诗歌创作中，为了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也常常使用色彩来渲染，以增强其形象的鲜明性及观赏价值。在唯美一派的宫体诗人眼中，更是把辞藻华丽、“铺锦列绣”、“采藻满眼”视为创作的第一要义。例如简文帝的《倡妇怨情十二韵》一诗，就仿如一幅色彩艳丽的工笔图画。诗中直接刺激视觉的颜色就有“红”、“黄”、“玉”、“朱”，用于形容美妇的服饰、寝具、颜貌。此外，还有许多从

字面上可以联想出色彩的物象：“绮窗”、“画阁”、“锦帐”、“玳瑁”、“鸳鸯”、“夜雪”、“严霜”。全诗色彩繁富，可谓烂如舒锦，炳若锦绣。予人一种极浓丽极明艳的感觉，读之就象在观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宫体诗中此类“雕缛满眼”、“浓彩缤纷”的诗句俯拾即是，鲜明的色彩自然成了宫体诗具有图画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宫体诗在追求真切地描写客观物象的同时，还充分地利用和加强人的生理感觉，以引发主观经验的联想与想象，如视觉：“月光侵暑后，霜明落晓前。”（庾肩吾《应令冬晓》）听觉：“回月临窗度，吟虫绕砌鸣。”（简文帝《秋闺夜思》）嗅觉：“草短犹通屣，梅香渐著人。”（徐君倩《初春携内人行戏》）触觉：“粉光胜玉靥，衫薄拟蝉轻。”（简文帝《美女篇》）还有运动的感知：“语笑能娇美，行步绝逶迤。”（王纶《车中见美人》）多重感觉的组合，刺激了人们对描摹对象的形象性联想。在语法结构上，早期的五言诗多数在一句中只用一个动词，但在宫体诗中一句用两个动词的已较为常见，如：“入行看履进，转面望鬓空。”（简文帝《咏舞》）“开函脱宝钏，向镜理纨巾。”（简文帝《拟落日窗中坐》）甚至还有一句之中用三个动词的。这样的句子，相当精炼生动，极富艺术张力，使短短的一句诗，即具有多层的含意及多重意象，为意境的构成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综上所述，由于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效应，宫体诗的“出位之思”得以实现，宫体诗人这种艺术探索 and 追求，得到了后人的肯定和发扬光大。唐代诗人王维能达到“诗中有画”⑫的艺术境界，也并非一蹴而就的。在诗中追求画意，成了后世许多诗

人的艺术追求，这种追求也使语言的造型能力大为提高，从文学发展的线索来看，宫体诗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另一方面，宫体诗所刻画塑造出来的美人图，对绘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涌现出来的新画种——仕女图，实际上就是宫体诗的形象图解和再现。

- ① 见《画史集》卷一《跋百之诗画》
- ② 转引自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中《中国画与诗的融合》一文
- ③ 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引
- ④ 见《中国诗与中国画》，载叶圣陶编《中华文

- 化复兴月刊》页168—169，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 ⑤ 参饶宗颐《词与画：论艺术的换位问题》载《故宫季刊》八卷三期，页9—15
 - ⑥ 见《艺术哲学大纲》，（台）周浩中译
 - ⑦ 见陈寿《上诸葛氏集表》
 - ⑧ 见葛洪《抱朴子·喻蔽篇》
 - ⑨ 参王国维《静庵文集》
 - ⑩ 参朱自清《子恺画集跋》
 - ⑪ 见《文心雕龙·物色》
 - ⑫ 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 ⑬ 见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作者单位：广东法制报社

责任编辑：刘斯翰

读《赋话六种》札记

何新文

赋话与诗话、词话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赋在历代不大受到重视，评论赋的赋话也缺乏认真的研究整理，有关文献资料颇多散佚，学者深以为憾。香港大学何沛雄先生历年来致力于汉魏六朝赋的研究，著述丰富，成绩斐然。仅笔者所知，近十几年来，除发表论文外，还著有《汉魏六朝赋家论略》和《汉魏六朝赋论集》两部专著，并编订了《赋话六种》和李调元《雨村赋话》。何先生正在多方搜辑旧文，有编纂《赋话丛编》之志。《赋话六种》收录清王芑孙《读赋后言》、魏谦升《赋品》、刘熙载《赋概》、浦铎

《复小斋赋话》，予以整理校点，并加上饶宗颐先生的《选堂赋话》，与何氏本人的《读赋零拾》，共凡六种，经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问世（本文所据为1982年12月香港第1版之《赋话六种》增订本）。此书对所收四种清人赋话都作了标点，并在卷首《编者序》中简介了它们的内容、特点及作者事迹。这不仅为读者阅读清人赋话提供了方便，而且对于促进海内外古代赋学的学术研究也很有意义。但是，由于资料不足等原因，此书还存在一些缺点，编者对某些赋话著作存佚情况的介绍不够确切，特别是标点方面的讹误更多。本文拟就《赋话六种》所

反映出的这两方面的问题稍加归纳，并列举若干例证予以考辨说明，以期引起阅读使用者的注意，或许也可供编者进一步修订时之参考。

以下所论，分为两个部分，均先引《赋话六种》原文，注明原书页码，再加笔者按语于后。

一

本书《编者序》，简述了几种清人赋话的流传存佚及所收赋话著作的有关情况。惜因掌握的文献有限，有时误将今存之书断为不传，有时又将赋话著者的时代或字、号弄错，这就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例如：

1. “赋之有话，殆始于李调元之作，厥后则有王芑孙之《读赋卮言》，林联桂之《见星庐赋话》，魏谦升之《赋品》，孙奎之《赋苑卮言》，刘熙载之《赋概》，浦铕之《复小斋赋话》等，……今林、孙二氏之书，已不可复睹”。（页3）

按：孙奎《赋苑卮言》今存。笔者所见为清道光十六年书有堂刊本，为其孙孙长纪所校刊。此本封二题署“春晖堂赋话，南通州孙斗泉著”，正文首页则题为“春晖园赋苑卮言，通州孙奎著”。卷首有嘉庆庚午（1810）年十月“受业胡长龄”序文一篇，略记孙奎生平事迹及此书成书过程。全书编为上、下二卷。上卷多为历代史传及杂著中有关作赋之人、作赋之事的记载及论述；下卷则言作赋方法、要旨，间或录入古人作赋逸闻。关于孙奎生平的史料很少。据胡长龄序文及清梁悦馨、季念诒等所修《通州直隶州志·文苑传》，知孙奎字敦五，号斗泉，南通州（今江苏南通市）人。少工词赋，为诗不界唐宋，又不遁入竟陵派。乾隆中两应召试，均列二等。曾教诸生为诗赋。至嘉庆初年已经老病，但犹谈艺如往，卒于嘉庆十一年（1806）。这本《赋苑卮言》，即其生前论赋之口谈笔录，卒后由孙长纪校刊行世。又，林联桂《见星庐赋话》、《清史稿·艺文志》“诗文评类”著录为“十卷”，现亦有流传者。清吴宣崇所辑《高凉耆旧遗集》（光绪18年刊本）中收有《见星庐赋话》十卷。可见，说“林、孙二氏之书已不可复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此外，这段论述，将魏谦升置于孙奎之前，将浦铕置于魏、孙甚至刘熙载之后，也似不妥。孙奎为清乾隆、嘉庆时人，魏谦升却生于嘉庆初年，刘熙载又晚于魏谦升。至于浦铕的生活年代，则主要在乾隆间，比孙、魏、刘诸人均早（详

下文）。

2. “浦铕，字柳愚，晚清嘉善人。……选刻《唐宋律赋》编辑《历代赋话》正续集，惟所著各书均不传，独《复小斋赋话》，收入《携李遗书》，幸未泯灭。”（页5，《编者序》语）

按：据清光绪十八年刊本江峰青等所修《嘉善县志》卷二十四之《人物志》及浦铕《历代赋话后序》等有关序跋所载：“浦铕，字光卿，号柳愚”。其生活年代主要在清代中叶之乾隆（1736—1795）时期，而大致与袁枚（1716—1797）同时，并与之交往。他“年八十五卒”，推其卒年，当在乾隆末世或嘉庆初年。何先生以为“字柳愚”，“晚清”人，大概是因清光绪初年孙福清《复小斋赋话跋》等材料推测之误。

《嘉善县志》著录，浦铕的著述计有《百一集》、《柳愚诗存》、《羊城集》、《西征集》、《唐宋律赋笺注》、《历代赋话》、《复小斋赋话》等多种，可惜散佚颇多。但今存者除《复小斋赋话》以外，还有《历代赋话》一书。笔者所见《历代赋话》，是清乾隆五十三年复小斋刻本，线装六册。全书共二十八卷，包括正集、续集两部分。正集十四卷，以“作赋之人”为纲，辑录《史记》至《明史》这二十二部正史内赋作者传记中与作赋有关的内容，可以说是一部历代赋家生平、创作史料的汇集。续集十四卷则以“言赋”为主，博采正史而外各类书籍所载历代赋论资料及诸家绪论等。书内载有乾隆五十三年袁枚“袁序”、五十二年孙士毅“孙序”、五十三年杨宗岱“杨序”，以及二十九年浦铕“自序”和五十三年写的“后序”。书后附载《复小斋赋话》上、下二卷。《历代赋话》资料丰富，编排也比较科学，又有所考订和论说，它对于治古代赋史、赋论者都极有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可知《复小斋赋话》最初于乾隆五十三年与《历代赋话》一并刻印行世。至光绪初年，浦铕同邑人孙福清才又单行校刊，且收入所辑《携李遗书》中。所以，今传《复小斋赋话》，除光绪间刊本外，还有更早之《历代赋话》所附乾隆间复小斋刻本，而并非因“收入《携李遗书》”才“幸未泯灭”。又，《西谛书目》卷四“诗文评类”著录：“《历代赋话》十四卷，续集十四卷。《复小斋赋话》二卷。清浦铕辑，清乾隆刊本”，亦可作为这一事实的傍证。

二

此书在标点方面的错误，大致有这样几种情

形；或因对赋作者名、字、号等不明，而使之与赋篇题名相联不分；或将赋篇题名分解作人名；或因未读懂原文而误断；或将赋话著者的评语与所引用的文字混为一体，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编者所校点的浦铎《复小斋赋话》之中，兹举其要者辨析如下：

1. “欧阳行《周詹秋月赋》”。（页54）

按：唐代赋家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有赋传世，《历代赋汇》录其《秋月赋》等。浦铎在评其《秋月赋》时，将其名、字连称，而《赋话六种》编者未察，故有此人名与赋名联属不分之误。此句当作：“欧阳行周詹《秋月赋》”。

这类讹误较多，如“袁楠玉《龟杖赋》”，“黄忠端《公省曾钱赋》”（页71）。按元代文学家袁楠，字伯长，有《玉龟杖赋》等多篇赋作。明嘉靖间赋家黄省曾，字勉之，所作有《射病赋》、《钱赋》等。这两句当作：“袁楠《玉龟杖赋》”，“黄忠端公省曾《钱赋》”。

又如：宋范忠文镇少时，“赋《长啸》，却胡骑”（页57），当作“赋《长啸却胡骑》”；“明裕陵赐叔父《襄王岘山、汉水》二赋，岘山则以戒，汉水则以美”（页61），当作“明裕陵赐叔父襄王《岘山》、《汉水》二赋，《岘山》则以戒，《汉水》则以美”；“明王梅恭《祀圜丘赋》”（页65），当作“明王梅《恭祀圜丘赋》”；“潘黄门安《石榴赋》”（页81），当作“潘黄门《安石榴赋》”；“唐吕令问府廷《双石榴赋》”（页82），当作“唐吕令问《府廷双石榴赋》”；“独孤授放《驯象赋》”，“谢观吴坂《马赋》”（页83），当作“独孤授《放驯象赋》”，“谢观《吴坂马赋》”；“宋薛士隆唐《风赋》”（页85），当作“宋薛士隆《唐风赋》”。“王禹《玉瑚琏赋》”、“庐州士子嘲吴涛赋”、“林叔躬嘲张义赋”、“滕达道盗犬赋”（92页）诸句并误，当改正为：“王禹玉《瑚琏赋》”，“庐州士子《嘲吴涛赋》”（按“涛”，原误为“涛”），“林叔躬《嘲张义赋》”，“滕达道《盗犬赋》”。此外，该页还将杨升庵《艺林伐山》误为“杨升庵《艺林》，伐山”，将济南《师友谈记》误为“《济南师友谈记》”，如此等等。

2. “黄滔、戴安道《碎琴赋》”（页74）；“王辅文《缀珠为烛赋》，……又元宗《幸西凉府观灯赋》……”（页75）。

按：唐黄滔（字文江）有《戴安道碎琴赋》一篇，敷演东晋文学家戴逵（字安道）碎琴的故

事。不知此书编者何以竟将原赋题名中“戴安道”三字误为与唐黄滔同作一赋的作者？又，唐王棨（字辅之，一作辅文）所作《玄宗幸西凉府观灯赋》，也因编者未查原赋，而将作者易为唐玄宗了。

3. “宋真宗读蔡齐《置器赋》，有安天下意，曰：‘此宰相器也。’王沂公曾作《有物混成赋》，识者知其决为宰相。范文正公《金在溶赋》，轩鉴干将一联，将相器业，文武全才，具见于此。乃知遗山文章，宁复见为人，而以潘黄门《闲居赋》实之，犹一偏之见也。”（页59）

按：《复小斋赋话》这段论述，以范仲淹诸人赋作表达了他们治政安天下的真实意愿为依据，从而批评元好问（自号遗山山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观点为一偏之见。这里明显引用了元遗山《论诗三十首》中诗句，但校点者似乎并未看出，乃至将遗山原句一分为二，造成意义上的含混不明。此段文字最后几句当断为：“乃知遗山‘文章宁复见为人’，而以潘黄门《闲居赋》实之，犹一偏之见也。”

4. “吴子华《浙产也小赋》，在辅文、文江伯仲之间，惜仅存《古瓦研》一赋矣。”（页68）

按：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与王棨（辅文）、黄滔（文江）等同为晚唐著名律赋家。今存《沃焦山赋》、《古瓦砚赋》均是短小篇章。浦铎所谓“浙产也”，是说吴融是浙江人；“小赋”二字应属下句。五字并非赋篇名称。这段文字的正确标点当是：“吴子华，楚产也，小赋在辅文、文江伯仲之间，惜仅存《古瓦研》一赋矣。”

5. “丰城剑，唐人皆直赋其事，独宋陆放翁谓应晋之南迁，盖为壮武，不能进贤，俛仰群枉之间，卒罹糶败而发要。是翻案文字。”（页73）

按：西晋张华因伐吴有功，晋武帝时封广武县侯，后又进封为壮武郡公。但最终因拒绝参与赵王伦和孙秀的篡权阴谋被杀，未得善终。因此，前人常以所谓“丰城剑气”之说附会其事。陆游《丰城剑赋》则发表新见，认为“若吴亡而气犹见，其应晋之南迁”，“使华开大公进众贤，……则身名可以俱泰”，并批评张华负重名，位大吏，而“俛仰群枉之间”。何氏未检陆赋原文，大概也未辨“壮武”是张华官爵，故标点时不能区别陆赋原句与浦铎评语，又将“盖为壮武不能进贤”句误分为二，将末句“要”字误读入上句，从而使读者

难得其解。此段当读为：“《丰城剑》，唐人皆直赋其事，独宋陆放翁谓‘应晋之南迁’。盖为壮武不能进贤，‘俛仰群枉之间’，卒罹擗败而发。要是翻案文字。”

6. 或问于余曰：“今所传《广平》、《梅花》赋真乎？伪乎？”余曰：“必伪也。”曰：“曷辨？”曰：“《广平赋》，唯皮裘美犹见之，故效之为《桃花赋》。史绳祖《学斋咕毕》，周公谨《癸辛杂志》，俱云不传。周又云：‘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观其文，猥陋全不成语，不善作伪者也。’或曰：‘今所传焉，知其即为江右所刊乎？’余曰：‘即非亦伪，此易辨尔。李忠定《梅花赋》序《广平赋》，今阙不传，予因极思以为之赋，补《广平》之阙云。忠定赋：‘发青枝于宿枿，未绿叶而先葩。……’此十六句，今所传《广平赋》皆有之，是以知其伪也。”元人朱元荐《忆庾岭梅花赋序》云：“广平见梅花于榛莽中，尚喟然赋之，则亦以为真矣。”余谓宜删去《广平》伪作……。（页81）

按：此段标点甚为混乱。其一是以人名作赋名，考唐开元时宰相宋璟曾封广平郡公，故世称宋广平，曾为《梅花赋》。此段误“广平”为赋名，与《梅花赋》相提并论；其二是未查检浦铎所引资料原文（如宋李纲《梅花赋序》、元朱元荐《忆庾岭梅花赋序》等），不能分辨浦氏评语与所引他文；其三是句读错乱。现在，试将此段文字重新标点如下：

或问于余曰：“今所传广平《梅花赋》，真乎？伪乎？”余曰：“必伪也。”曰：“曷辨？”曰：“广平赋，唯皮裘美犹见之，故效之为《桃花赋》。史绳祖《学斋咕毕》、周公谨《癸辛杂志》，俱云不传。周又云：‘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观其文猥陋，全不成语。’不善作伪者也。”或曰：“今所传，焉知其即为江右所刊乎？”余曰：“即非亦伪，此易辨尔。李忠定《梅花赋序》：‘广平赋今阙不传，予因极思以为之赋，补广平之阙云。’忠定赋：‘发青枝于宿枿，未绿叶而先葩。……’此十六句，今所传广平赋皆有之。以是知其伪也。”元人朱元荐《忆庾岭梅花赋序》云：“广平见梅花于榛莽中，尚喟然赋之”，则亦以为真矣。余谓宜删去广平伪作……。

7. “范文正《王者无外》，尧舜率天下以仁，天骥呈才赋》，对联中皆用‘之’‘者’字”。（页84）

按：范仲淹有《王者无外赋》、《尧舜率天下以仁赋》、《天骥呈才赋》。这里将三篇赋误为一篇。

8. “予读傅长虞《叩头虫赋》，以其谦卑自牧，无往不利，心窃鄙之。及读明人称之《象赋》，乃谓士之进退，必以礼义，枉己辱身，颇伤志操。洋洋洒洒，几九百言，实获我心矣。”（页85）

按：晋傅咸《叩头虫赋》有“谦卑以自牧”、“吉无不利”之句。明人张之象又为《叩头虫赋》，反其意以讽当世之士，其赋序曰：“余乃谓士之进退，必有礼义而得之。……枉己辱身，颇伤志操”。故知此处“明人张之《象赋》”乃是“明人张之象赋”之误。

9. 鲁望作《蚕赋》、《后虱赋》，皆有激而言，不当作翻案文字观。按《虱赋》：“玉溪止讥其臭齿，笠泽更赏其恒德。激而赋之，则蚕亦为祸，虱亦为德矣。”岂真恶人所好，好人所恶哉？明人顾大韶又《后虱赋》，不作可也。（页85）

按：李商隐（号玉溪生）始为《虱赋》，言其“回臭而多，跖香而绝”；后陆龟蒙（字鲁望，因自编《笠泽丛书》，或称其为笠泽）作《后虱赋》，称虱“不为物迁，是有恒德”。又有《蚕赋》一篇，不言蚕有功于世，反斥其有祸于民。浦铎综合诸赋内容，并略借明顾大韶（字仲恭）《又后虱赋序》中文句，而评议曰：“《虱赋》，玉溪（指李商隐）止讥其臭齿，笠泽（指陆龟蒙）更赏其恒德。激而赋之，则蚕亦为祸，虱亦为德矣。”何氏似未识此，误将浦铎评议李商隐、陆龟蒙诸赋之语当成李商隐《虱赋》原文，的确是太疏忽了。故此段“按《虱赋》”下之冒号当易为逗号，“玉溪”五句所加引号应删，“又《后虱赋》”应改成“《又后虱赋》”。

除本文上述外，此书的断句、标点及文字校勘都还有一些疏失，有的也可能是手民之误，这里不再赘述。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启动市场与企业对策

——广东真空设备厂的实践与思考

王建明

持续近两年的市场疲软，是对企业的一次严峻考验。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使企业走上一条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路子，是每个企业面临的课题。广东真空设备厂近年来及时地把握国家微调政策启动市场的时机，以提高产品质量和促销为中心，在强化基础管理、提高企业素质上做了一系列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90年3月份以来，开始扭转亏损，此后发展势头一直看好。1990年底统计，全年产品销售收入1083.21万元，总产值1071.3万元，实现利润72.51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25326元，分别比1989年增长了10.06%、26.35%、15.64%和33.82%。广东真空设备厂启动市场的对策主要是：

一、强化营销管理，搞活营销。

根据市场普遍不景气且竞争激烈，拓展市场较困难的特点，做到及时调整充实销售队伍，强化营销管理。一是继续完善了销售部门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较合理地确定和完善了本年度的销售承包方案，落实责、权、利，把销售人员的收入，与产品销售数量、销售额、资金回笼等指标直接挂钩，并实施不同档次的奖金分配办

法，从而调动了全体销售人员的工作积极性。1990年，共与国内外用户签订供货合同额为1563万元，已取得销售收入1083.21万元，占销售承包目标值的108.32%。二是加强产品宣传促销攻势。根据各个时期市场销售形势，采取了以广告宣传与新闻报导相结合的形式，加强企业形象宣传和产品广告促销工作，提高了我厂及真空产品的知名度。三是积极参加各种产品展销会、博览会，以多种形式推销产品。仅1990年11月的肇庆真空技术咨询暨产品订货会，订货成交额达300多万元。

二、以优质产品加优质服务赢取用户。

产品质量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由于我厂坚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了企业全过程的质量保证体系，运用质量管理的思想、方法和工具，开展了产品的升级创优工作，从而实现了产品的质量升级。1990年，我厂的“电器QC小组”、“管理部门QC小组”、“研究所QC小组”被县经委、县质量管理协会分别授予QC成果一、二、三等奖。与此同时，继有6个产品分别荣获国优、部优和省优称号后，我厂又有2X—1型旋片式真空

泵经复查保持了省优称号, 2X—8型真空泵荣获省优称号。另外, 我厂除对真空泵产品台套收购、铸件收购实行优质优价以外, 又对真空镀膜设备实行了按质论价的台套收购政策,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90年真空泵、真空镀膜机的一等品率为84.6%, 比前年提高了12.1%, 真空镀膜机的一等品率达76.2%。企业的优质产品产值为201.81万元, 占企业总产值的18.8%。由于产品质量优良, 因而深受用户欢迎。然而, 令用户更受欢迎的是我厂的优质服务。由于我们坚持做好用户技术培训工作, 负责上门为用户安装调试和维修设备, 还定期征询用户的意见, 从而改进和提高了我厂的服务质量。1990年7月份, 我厂技术服务人员到山西省, 为某制镜厂安装一台DC—700型玻璃镀前处理机时, 该厂提出要购买我厂生产的DDM—2000型真空镀膜机和DC—1600型玻璃镀前处理机各一台, 而把已购的DC—700型玻璃镀前机退掉。我厂同意用户退货和提供其需要的两台设备, 并要求技术人员就地推销这台DC—700型玻璃镀前机。技术人员就用可以先拆箱装机试用的推销办法, 使当地某工艺美术厂非常满意地购下了这台设备。我厂还以“生产厂家”和“用户”的双重身份, 先后为17家委托单位验收了28台设备。由于我厂服务质量好且到家, 赢得了国内外广大用户的欢迎, 从而拓宽了产品的销售渠道。1990年, 我厂共销售了真空泵2114台, 其中出口503台, 售出真空应用类及配套设备125台(套), 出口真空镀膜机3台, 其中有两台是目前国内出口机型最大的真空镀膜机。现在, 我厂已被全国真空行业一致公认为“真空镀膜机产销量最多的

厂家”。

三、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生产布局。

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是提高产品对市场的适应性, 增强企业应变力的一种有效途径。我厂从如下三个方面抓好了产品结构的调整工作, 使企业基本上实现产销平衡和增产增收。

1. 及时调整生产计划, 适应市场需求。根据上年的市场销售状况, 我厂预测并编制了以生产真空泵和小型真空镀膜机为主的年度生产计划与滚动计划。然而, 从一、二月份的销售情况分析, 真空泵的销量并不理想。随着国务院实施微调政策启动市场以来, 用户对我厂生产的大型真空镀膜机及其配套设备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针对市场需求变化, 我厂做到随机应变, 及时修订了生产计划, 并重新调整了生产布局, 重点放在大型真空镀膜机及其配套设备的生产上。同时加强生产组织管理, 缩短产品交货期和做好订货会期间样机的准备工作, 使大型真空镀膜机的生产周期, 从原来的120天降至75天, 满足用户的迫切需求, 也使企业提前了一个月完成了全年的经济指标。

2. 改进产品结构, 提高产品适应性。我厂根据用户需要和市场需求变化, 一方面, 用罗茨真空抽气系统取代原来的抽气机组, 提高了设备的工作效率和镀膜质量。另一方面, 改进了现有DC系列玻璃镀前处理机、DL—2300型镀后低温烘炉, 以及市场适销的一批产品的结构与性能, 提高了产品的适应性, 增加了产品的销售数量。

3. 开发适销新产品, 扩展产品应用领域。我厂根据市场的要求情况, 避免了大、

洋、全的设计,按照我国的国情国力,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从“效率、实用、可靠”这三个原则出发,先后研制开发了ZZ—2200型、ZZ—2200B型、ZZX—J670型真空镀膜机、JT—1000T型磁控溅射真空镀膜机、单级直联真空泵、真空灌油机、胶带分切机等8个新产品。特别是经过改进推出的ZZ—2200型真空镀膜机,由于生产效率比同类机型提高了40%以上,成为了一种拳头产品。现已售出该机11台,销售额达162.8万元。

四、抓好企业基础管理工作,提高企业素质。

企业能否持续保持生产势头,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根本的途径是不断提高企业素质,抓好基础管理。我厂在积

极调整产品结构与生产布局,搞活营销,增强应变力的同时,还结合了“省级先进企业”复查工作,开展了一系列的企业整改和基础管理工作。1990年11月,经广东省机械工业厅企业升级复查组复查确认,我厂的升级复查工作,已达到《真空设备行业企业升级省级企业考核指标标准》的要求,继续保持了“广东省省级先进企业”的光荣称号。同时,我厂还抓紧开展“安全性评价”、“定置管理”、“现场管理”“会计达标升级”、“统计基础规范化”、“企业档案管理升级”、“消耗定额管理”等一系列工作,使企业生产、经营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素质水平有明显提高,生产经营的后劲得到了加强。

(上接第120页)

其次,在基本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经济学家中,在某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也存在差异。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卓炯的答案是社会分工,自称“社会分工派”。而其他经济学家则认为不够充分,王珏、雍文远等分别提出联合劳动的两重性、全民所有制中的集体所有制因素是除社会分工外的不可或缺的原因。再如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范畴的看法,他们的距离更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也是服务于改革的。经济学家们对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各有侧重。卓炯曾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

并主张扩大股份制的试验;于光远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结构的论述十分深刻;王珏、雍文远等全面阐述了各自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

由于经济学家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因而在思想观点上就必然会存在差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只有在争鸣中、在比较中才能被揭示。因此,在理论争鸣中,我们倡导不同的流派共同发展。《流派》一书为读者提供了系统简明的材料,既能为一般读者了解不同流派的概貌提供帮助,也有助于研究人员进一步的探索。

作者单位: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英隆

读《法国所藏甲骨录》

陈炜湛

1956年9月，饶宗颐先生游巴黎，得观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策努斯奇博物院、归默博物院所藏甲骨文，剔去伪品，摹录以归，著为《巴黎所见甲骨录》（以下简称《巴黎》），于同年12月在香港出版。海内学术界遂知法国亦藏有我殷虚遗物。但饶氏所录仅有26片，且系摹本，读者尚不能了解法国藏甲全貌，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84年8月，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胡厚宣先生发表了题为《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一文，全面记述海内外公私藏家收藏甲骨文的情况，其中谈到：“法国收藏甲骨的，有四个单位，54片：法国国家图书馆28片，归默博物馆13片，策努斯奇博物馆9片，巴黎大学中国学院4片；一个私人收藏家10片：甘茂道10片；公私合计64片。”^①所记甲骨较饶书所录增一倍。但胡先生此文主要是数字的统计，不及具体内容。读者仍难知其详。

在《巴黎》问世三十年之后，由利氏学社雷焕章编著的《法国所藏甲骨录》（以下简称《法录》）一巨册于1985年12月在中国台北出版，在台北、巴黎、香港三地同时发行。《法录》的出版当然不会降低《巴黎》的存在价值，但确可弥补后者之不足或缺陷，因为它首次全面、完整地公布了

法国所藏的甲骨文，为中外学术界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研究资料。

本书所录甲骨共59片，为四个公家单位、两位私人收藏家所收藏：1. 巴黎大学中国学术研究院（即饶书所称中国学院）13片；2. 季梅（即饶书所称归默）博物院8片；3. 池努奇（即饶书所称策努斯奇）博物院10片；4. 雅克博先生1片；5. 戴迪野先生1片；6. 法国国立图书馆26片。与胡氏所录颇多出入。其中中国学术研究院实藏15片，二片伪刻，乃得13片；国立图书馆实藏28片，一片无字，一片伪刻，故收录26片。

59片甲骨中，除饶氏摹录的26片（中国学术研究院13片；季梅博物院4片；池努奇博物院9片）外，均为首次发表。每片甲骨，皆以照片与摹本两种形式著录，而且甲骨背面不论有字与否一概附列其照片，以资研究。

就已发表过的26片甲骨看，以《法录》与《巴黎》相校，可证饶氏当年对照实物用毛笔所作摹本总体而言是相当精审可信的，只是偶有疏忽。如《巴黎》8（《法录》B4）左下角遗摹“不玄龟”及序数字“二”，易日之“易”照片作，饶摹作，显误。《巴黎》24无背面，据《法录》S14，则知其

背面尚有“戈入二百”之记载。诚如编著者所云：“当岛邦男归并这类‘（某人）入’之刻辞时，并未发现有‘戈入……’之文例，本刻辞显示了‘戈’与商王关系友好，因此相当重要。”（见该书释文，第151页。）

在首次发表的33片甲骨中，有一部分是残碎小片（如S 44—59这十六片即属此类），仅存一至三字，于甲骨缀合或有其价值，就刻辞本身内容而言则似价值不大；但这首次发表的甲骨，有不少确实堪称精品，学术价值很高。兹就笔者所见，参以编者所述，略举数例，以飨读者同道。

例一，《法录》B 17。此为季梅博物院藏品，饶氏当年所未见，是最近从博物院的仓库中发现的。这是块相当大的牛肩胛骨，其刻辞与《前编》7.28.1同文，皆残，可据以互补。据《前编》可知此片之贞人为大，乃祖庚时所卜；据此片，《前编》有两条卜辞得以补足：

□□卜，大贞：来丁亥禡，丁，三十羌卯？

□□卜，大贞：朏丧，小羽冬（终）？八月。

例二，《法录》S 18。此亦季梅博物院所藏，龟腹甲，饶氏未见，是第三期（廩辛）贞人卬的贞旬卜辞，计有十八条，完整者十二条，有一条附记月名，曰：“癸巳卜，卬贞：旬亡祸？在六月。”此为贞人卬卜旬最多的一次记录。十八条贞旬卜辞，以一月三旬计，前后历时六个月，始终由一人负责贞问。这样的例子，在已刊的第三期卜辞中实属少见。据介绍，此甲在该院仓库中发现时，已碎为十四小块，幸得齐斯田·戴迪野先生悉心缀合，恢复原貌。

例三，《法录》B32。此为牛右胛骨后

骨缘之一块，乃武丁刻辞，是巴黎私人收藏家雅克博先生的藏品。这是关于从望乘抑从沚臤及供牛事的占卜，虽较常见，但此片系简省式，仍较重要。其辞如下：

王勿从望乘？

贞：乎供帚（妇）牛？

王亥沚臤从？

从望乘？

令望乘？

例四，《法录》S33。此为武丁时之龟腹甲，巴黎古物鉴定家戴迪野先生所藏，与《甲编》166同文，辞曰：“贞：致其囚？”作为人名的致，前此仅《甲编》一见，该片拓本作致，中有一斜笔，屈万里氏认为此斜笔并非原有，而是刮痕。今得戴氏藏甲，该字无中间一横，证明屈氏判断正确。

例五，《法录》S34。此系国立图书馆藏甲，有辞称：“今辛……亦二宰。”“亦二宰”之语卜辞罕见（类此者仅得一例，即《粹》1000“大食其亦用九牛”），至为可贵。

例六，《法录》S43。此亦国立图书馆藏甲，辞曰：“癸卯卜，出贞：令鸣氏（致）多方……七〔月〕。”以鸣为人名，多见于武丁卜辞，如《续存》1·616，《董室·人名》70，《京津》2220诸片言“乎鸣从戊”，《前编》5·46·5称“令鸣累方”等即是。《法录》此片有贞人出，可知为祖庚卜辞。据此，《金璋》590“贞令鸣氏多方□”，殆亦祖庚时物。此外，《前编》5·46·4及《金璋》732亦有人名“鸣”，与此当系同一人。

作为一部著录并考释甲骨文的专著，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以中、英、法三种文字著录并考释甲骨文，于各国读者极为方便。这在甲骨学史上实属首创。已往的著作，编著者很少能为他国读者着想，也

很少能为自己的著作传播至其他各国着想，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或有其力而无此心。能用两种文字撰写的，已属罕见，就笔者所见，仅许进雄先生《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1979年3月，艺文印书馆出版）一书而已。《法录》编纂者考虑到：“在甲骨学界，中英文是最重要的沟通媒介，但由于本著录甲骨实物的收藏地在巴黎，故亦加上法文考释。”（见该书《序》）诚为卓识，值得称道。

本书对甲骨的介绍、考释，颇为详尽。在每一家藏品的释文之前，均有“藏片来源”一节文字，尽可能描述有关甲骨的流传情况。对于来历不明的甲骨，编者直言不讳。如对季梅博物院收藏的第三部分甲骨（四块，即B15, B17, S18, S19），介绍说：“这四块甲骨来源不详，它们送进博物院时未作任何记录，因此究竟属博物院自购或为他人赠送，不得而知。”至于释文部分，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刻辞之意义”，也尽可能详尽。虽说“过分艰深之学术性注解，不予列入”，但对有争议的考释，“本著录除表示立场外，并说明理由。”而且，在考释具体甲骨之前，编著者还首先就甲骨文中佳、亩或夷、其、出或又、卜、鼎（贞）这些常用字加以考释。这些考释，集中反映了七十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对甲骨文字的见解，虽然在中国学者看来未必正确，未必能接受，但毕竟“可为学者们提供另一沟通之机会”，很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法录》一书很有特色，值得称道之处很多，它无疑是对甲骨学的一个贡献。诚然，遗憾或缺陷也是有的。本书的照片虽较精良，颇便观赏，但从研究的

角度看，终不如拓本清晰易辨。所附摹本，与原刻风貌气韵有较大距离，尚逊于《巴黎》。而且，本书著录的照片及摹本均经放大，这在编者是一番好意，于读者却造成了研究的不便，至少是容易引起错觉，不利于缀合。这也许是编者所始料不及的。

其次，本书考释甲骨文字，多属就字论字、据形释义，很少顾及甲骨文字与后世文字的历史联系，很少顾及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已有成果。这样，就难免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而不自知。如本书根据吉德炜、高岛谦一、舒莱等人之说，力主卜辞之命辞非疑问句，极力反对卜辞之“贞”有“卜问”义。其理由是：“秦汉前之典籍无以贞表‘卜问’之用法，金文也难找到贞字可做上述之用法者。”看来作者很重视书证。准此以求，则考释其他字，说某字具有某种用法，理应在“秦汉前之典籍”及金文中找到这种用法以相印证才是。可是，本书对若干甲骨文字的考释，并未遵守这一准则。如说“卜”与“贞（鼎）”：“‘卜’即表示以火占时连续的形式动作，‘鼎’则代表祖先或神明之前所举行的整个祭仪。……则‘某贞’，或可释为某主礼占仪，而序辞中之‘甲子王卜贞’，则意为：‘甲子日王以火占卜，并主礼占仪。’”试问秦汉前的典籍及金文中能找到这样的用法吗？又如说“其”：“甲骨文中，囟表一内装祭品之容器。囟由原先表示祭物之意转变成因该祭仪而引起的祖先或神明之介入。”“其字增强了‘惋惜’之意味。”显然，其字的“容器”用法，增强“惋惜”意味的用法在秦汉前的典籍里也是找不到的。类此者尚多，不枚举。

在解释卜辞方面，本书对有关参考资料均能详细核对，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然亦偶有疏漏，例如：（1）对S23，著录与编译部分释作“穀鼎/于禾黍受年”，英文译为：“At 禾, for the millet, one will receive a (good) harvest.”释文部分遗释“受”字，又谓“卜辞内容是关于黍之收成。”按此辞当读为“穀贞：于禾黍，受年？”“黍”为系动词，此类用法卜辞屡见。义为从事耕种黍类作物的农业生产，编者似视为名词，失之。（2）本书第124页，引《甲编》1180：“王其省田鼎”，认为“‘鼎’似指田猎地名”，“如同在提到‘王省田’之其他文例一样，狩猎地名通常在‘田’字之前或之后。而本刻辞之‘鼎’字正接在‘田’字之后，故极可能指狩猎地名。”按此说似是而非。卜辞“王省田”的文例并不复杂，仅作“王省某（地名）田”或王衷某（地名）田省”。地名均在田字之前而无在其后者。“鼎”若是地名，应当说“王其省鼎田”，此为通例。按诸原片，“省”、“鼎”下均有缺文，虽“田鼎”相连，“鼎”亦未必是地名。屈万里氏《甲编》考释谓“鼎字于此，未详何义”，较为谨慎。

据介绍，《法录》乃利氏学社整个发表计划之第一部分，编著者的另一部书《比、荷、西德、瑞士所藏甲骨录》（Collection of Oracular Inscriptions in Belgium,

Holland, West Germany, Switzerland)亦已编定，这将对甲骨学的又一贡献。我们热切地期待早日读到此书，以便全面了解西欧各国收藏的甲骨。相信中国读者必将象欢迎《法录》一样欢迎这部著作并认真拜读的。

附《巴黎》与《法录》对照表（S代表甲，B代表骨）

巴 黎	法 录	巴 黎	法 录
1	S 5	14	S 23
2	S 1	15	B 27
3	S 7	16	B 25
4	S 12	17	B 29
5	B 9	18	B 31
6	B 6	19	B 24
7	B 2	20	B 30
8	B 4	21	B 28
9	B 3	22	B 26
10	B 8	23	S 16
11	B 11	24	S 14
12	B 10	25	B 21
13	B 13	26	B 20

① 此文刊于《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当代中国商品经济理论流派》评介

孙泽军

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商品经济理论流派》，是一本带有资料性和争鸣性的工具书。此书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当前商品经济理论的几种不同观点，反映了我国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如，“卓炯的商品经济思想”（杨永华）、“孙冶方的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冒天启）、“骆耕漠的非商品经济论”（韩孟）、“我对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些看法”（于光远）、“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王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十个理论问题”（雍文远、袁恩楨）。每个部分长短不一，平均5万字左右。应该说，也达到了编者的目的：“向读者简明地介绍了当代中国商品经济理论流派的概貌，使人们能够系统而全面地了解他们各自的观点，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

商品经济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所遇到的一大难题，它困扰着当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实际上也肯定和总结了我国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包含着我国经济学家长期探索的心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曾进行了步履艰辛的探索。在60年代，卓炯、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等同志对商品经济的研究争鸣，就形成了“宽派”、“窄派”之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形成一个新的高潮。王珏、雍文远等同志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核心范畴、运行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不断研

究、争鸣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的观点逐步系统化，从而在学术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

这些理论流派的存在，不仅体现了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而且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改革经济学，而商品经济理论则是改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市场取向的改革，要求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深度。这样，公有制和市场的关系，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也正是商品经济理论所要研究的。对商品经济的研究，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面貌，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貌一新。

《流派》一书是专门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著作，经济学家的观点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思想，大体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商品经济？在《流派》一书中，孙冶方的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与骆耕漠的非商品经济论，两者虽有很大不同，但在回答社会主义经济内部本质上是否商品经济的问题上，都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孙冶方虽然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脱离的前提下论证了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调节作用，批评了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外因论，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却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骆耕漠是我国经济学界“非商品经济论”的代表。他认为，按着各种经济力量的对比，并用前后一贯的科学术语去表述，可以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称为非商品货币经济。他们的看法与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去甚远。

（下转第115页）

中山今日不夜城





Guangdong Provincial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Zhongshan Branch
Zhongshan Municipal Trade Development
General Corporation

本公司是多元化、多功能的綜合性對外經濟貿易公司，經營糧油食品、土畜產品、輕工工藝產品、紡織品、五金礦產、化工原料、醫藥原料、儀器儀表、機械設備、電子產品及各種原輔材料、零件部件等進出口業務。

本公司以合資、聯營等方式興辦了中山洗衣機廠、中山滌綸絲廠、中山絲織印染廠、中山崇高玩具廠、中山鋁材廠有限公司、中山市福田電子元件有限公司、中山中雅日用制品廠有限公司、中港客運聯營有限公司及中山港快速進港公路等大型企業和項目。

熱忱歡迎國內外各界人士同我們建立廣泛聯系，發展進出口貿易，合資合作興辦企業；同時，接受國內外委托代理進出口及轉口貿易業務。

地址 Address：廣東省中山市石岐中山路方基涌大街三號
3 Fang Jirong Da Jie Zhongshan Road,
Zhong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電話 Tel：823284 823285 電掛 Cable：9901
傳真 Fax：821194 郵政編碼 Post Code：528400

總經理：梅庭槐

廣東省對外經濟發展公司
中山市貿易發展總公司
中山市分公司